

# 宇鲁一生的奋斗足迹

西藏原政治犯宇鲁仁波切自传

颀尔宗·德丹 等译

藏人行政中央外交部中文处出版发行

2019

印数：2019年11月 初版：1000 本：

电子版：请登录藏人行政中央官方中文网站

西藏之页： [www.xizang-zhiye.org](http://www.xizang-zhiye.org)

Printed at Narthang Press

Published by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DIIR)

China Desk

Central Tibetan Administration

Dharamshala -176215 H.P.

India Email: [chinadesk@tibet.net](mailto:chinadesk@tibet.net)

ISBN: 9-789380-091921



## 译序

西藏著名原政治犯宇鲁仁波切自传，《宇鲁一生的奋斗足迹》这本书是作者宇鲁仁波切本人亲自撰写他非凡的人生经历，以秘密途径历经艰险託人从西藏境内带到印度，转交流亡藏人组织有关负责人，并由9103运动组织负责整理出版藏文版，最后由藏人行政中央外交部中文处翻译出版中文版。其旨在向中国大陆广大华人为主的中文界介绍西藏问题，尤其是西藏境内政治犯的悲惨处境，以及他（她）们在狱中继续同当局做斗争的英勇事迹，让外界从全方位多层次了解真实的西藏。

可以这么说，西藏是二十一世纪地球上的最后一个殖民地，也是最新的殖民地。二十世纪中叶拉美殖民地纷纷获得独立，截至2002年，世界上共有120个殖民地相继独立。然而，西藏却开始陷入他国殖民统治之下，且越陷越深。殖民者还为了取得它的长期性和合法性统治地位，不断向外界竭力鼓吹“百万农奴获得解放，人民当家做主”；“西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等等。但是，在这些美好措辞焕发的舞台幕后，有多少人了解

深藏在面具下殖民者的真实面目？有多少人了解歌舞升平中真实的西藏？

本书便是了解真实的西藏及其统治者的一个重要窗口，它向广大读者明了而生动，既不失真切又笼统地介绍了西藏政治犯的命运和坎坷经历。正如本书作者，如何从一个天真的农村儿童成为仁波切，又如何从一位颇有修行功底的仁波切成为中共的特级“罪犯”，一生坎坷曲折且充满传奇与辉煌。这里作者以个人的亲身经历，注重反映了中共如何残酷镇压西藏人民，对西藏民族实行的一系列毁灭性政策，以及野蛮对待西藏政治犯等事实。

无疑，宇鲁仁波切是当代西藏仁波切和所有政治犯的缩影，由此可以了解西藏政治犯的真实处境，以及他们为什么要选择反抗的真正原因，并从侧面真实生动地展示了中共入侵西藏前的社会状况，及入侵后西藏人民处于何等惊心动魄和恐怖艰难的动盪时局和变迁过程。同时也暴露出面具下中共的真实面目。

本来这里还想替作者对监狱里那些“本是同根生，何以自相剖”的变节分子进行一番有力鞭打，以净

化他们肮脏的灵魂。对此，西藏著名原政治犯达那·晋美桑布在他大半生监狱生活的描述中也同样提到，对这些民族败类深恶痛绝。更令人费解的是在自由国度我们周围也固然存在，不讲公理只讲权力，不认对与错只认名和利；假公济私，徇私枉法，丧尽底线，污染灵魂的齷齪却实在不少，进而使藏人内部走向四分五裂。对此想要做一番良知的呼唤，可是后来经过三思，还是选择了顺其自然，随遇而安，正如《菩萨行论》寂天菩萨所言：“顽者如虚空，岂能尽制彼？若熄此瞋心，则同灭众敌。”最后，因受内心的道德驱使，这里只强调两句“轻霜冻死单根草，狂风难毁万木林”。无论何时，身处何境，团结是西藏境内外同胞争取民族自由的首要条件和根本保证，是重中之重。

藉此直抒，《宇鲁一生的奋斗足迹》这本书也如同主人公的坎坷人生，几经周折，现在终于出版，同广大读者见面了。大师在天有知！晚辈无愧于心！

这里对参与本书的翻译和校正工作中，驻台湾代表达瓦次仁、秘书长索南多吉，以及该机构工作人员卓玛女士等，一同表示衷心感谢！通过上述人士辛勤付出的基础上，本人利用大量时间和精力，对原有用意译法

做出的译稿，针对原文藏文进行反复修改，尽力缩短了原文与译文在表达上的距离，并对本书后一部分章节做了全面补译。

由於本人各方水平有限，再加时间仓促，本书在翻译过程中难免存在遗漏和不当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藏人行政中央外交部中文处 颀尔宗·德丹

2019年11月7日

## 目录

- 一、生母拉吉之子被认定为伊黎转世；  
十三世达赖喇嘛赐书改名称宇鲁..... 1
- 二、争取拉让巴学位后立宗密乘格西；  
岗岭康珠仁波切为保国投笔从戎..... 8
- 三、对密乘僧侣分发护身符；  
焚烧中共兵营僧伽舍生 ..... 16
- 四、觉奥佛祖足前还戒律；  
誓死保卫小昭绕慕齐..... 21
- 五、含泪依依告别多年僧友；  
札果萨与妹夫邂逅相遇 ..... 28
- 六、极力伪装蒙古人却露奸细马脚； ..... 33  
大张旗鼓批斗声搅乱幽静牧场..... 33
- 七、重罪犯人押送札基狱；  
增建监狱河谷垦农田..... 41
- 八、搬沉重野樱木至香巴唐；  
为赅续批斗带到仁庆岭..... 47
- 九、增产节约运动又开始；  
宇鲁思想污染被肃清..... 57
- 十、反共同盟之密泄露当局；  
七位同胞之躯埋葬沙滩..... 65

十一、审评途中各种灾祸接二连三； 积极分子陷入欺诈泥潭之中 .....	78
十二、吾被列为第三“宝瓶”成员； 一首祝寿偈颂出自衣兜 .....	86
十三、身患重疾则成修行助缘； 黄色板车引发重大争议 .....	94
十四、猛烈洪水肆虐满院； 监墙一节节被倒塌 .....	100
十五、无能反驳找瑕疵； 精彩评论动人心 .....	104
十六、以猪油灼治手上裂口； 纸条包石头扔监墙外 .....	111
十七、释放消息传遍整座监狱； 扰乱囚心一时陷入疑惑 .....	116
十八、获就业权当建筑工； 对甘丹寺供斋僧茶 .....	123
十九、维护古老文化立大论讲修院； 历经劫难深知西藏文物价值 .....	131
二十、复制外宣藏事公文； 一代新人再添希望 .....	140
二十一、被捕后宣布罪过； 开庭判有期徒刑 .....	153

二十二、札基监狱增设第五队；	
办公楼前石板被血染 .....	159
二十三、三名老囚有幸获假释；	
拜礼佛祖又见到生母 .....	175
二十四、意欲为全球民众造福；	
该关注弱勢藏人处境 .....	184
二十五、极拥戴达赖喇嘛宗旨；	
立字据禁止供奉‘道结’ .....	190
附加一 依据佛典词语；	
提防弊端恶习 .....	196
附加二 对患难之交留遗书；	
竟坐化四日便圆寂 .....	198



## 一、生母拉吉之子被认定为伊黎转世； 十三世达赖喇嘛赐书改名称宇鲁

这里由宇鲁·图登多典本人将撰写自己的人生经历。我的家乡是卫藏达孜县甘丹雪赖<sup>1</sup>朱茜村，本人于一九二六年藏历木牛年六月十日生，生母称拉吉。当我还在母亲腹中时，父亲顿珠桑布已经离开了人世。母亲说我出生那天住在朱茜村的一位精通佛法的蒙古族甘丹寺僧人一格西平苏措巴帶著哈达等礼品专程前来贺喜，他望著襁褓中的婴儿连称：“这个小孩面相庄严，今天又是星期一，祝福长寿！故，取名达瓦次仁吧”。格西还送了加持品。

当时，甘丹卓尼康村的第四世伊黎仁波切圆寂已有几年了，卓尼康村请求甘丹寺附近的拉莫仓巴护法神，为寻找伊黎仁波切的转世灵童，降神仓巴护法，护法神谕为：“唵！转世灵童已降生在甘丹寺附近东南方……”

---

1 雪赖：拉萨谷上游延伸村落。

卓尼<sup>2</sup>康村<sup>3</sup>的喇嘛格西们依据藏传佛教寻觅转世灵童的仪轨和护法神谕，为灵童举行了庄重的诵经消灾祈福法事及必要程序后，开始对甘丹寺附近东南方向的男童一一进行了缜密核查，结果选定我和一名年龄与我相仿的巴郎雪村阿爸尼班的儿子。众多孩童中据说只有我们最具伊黎转世灵童特征，但我们之间究竟哪一个才是转世灵童，令负责确认的喇嘛格西们左右为难颇伤脑筋，最终决定再度求助拉莫仓巴护法，以法眼确定到底谁是伊黎转世灵童，结果仓巴护法指出：“唵！朱茜拉吉的聪睿之子是伊黎转世灵童。”

随即康村特别派能干的代表到我家，我的灵童身份确定后，康村代表带著敬献的新衣、哈达等礼品到我家祝贺，已找到正确无误之伊黎转世灵童。同时，也把我接到甘丹寺，并安排晋见第九十一任甘丹赤巴洛桑坚参仁波切，甘丹赤巴仁波切亲自为我剃度，赐法名为洛桑格列。从此，我成了公认的第五世伊黎仁波切，我的人生命运也由此发生了重大转变。

然而，不久社会上起了一场伊黎转世灵童问题的

---

2 今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县。卓尼寺1295年受萨迦法王八思巴之命建立，后改宗格鲁派。该寺以印刷木刻板藏经广为著称。

3 依僧人来源地划分的僧侣团体，若干康村共同组成一个札仓，色拉寺有三十个康村，哲蚌寺有八十一个，甘丹寺有二十六个。

风波，起因为西藏安多卓尼寺就伊黎仁波切转世问题请示第九世班禅喇嘛曲吉尼玛，班禅曲吉尼玛对现任策门林寺住持认定为安多卓尼寺第四世伊黎仁波切转世。这样，一时出现了两位转世，安多卓尼寺的灵童有班禅喇嘛的复函凭据，而我这个由卓尼康村确认的灵童，曾一度因身份遭人质疑，而乏人问津地被抛置一边。

处境如此剧变的情况下，也因此，我的舅舅卸任经师顿珠确桑答应在甘丹寺收留我为徒，从此我打算跟随舅舅学习经典，准备当一名普通僧人。就在此时，一位博学多才的甘丹东山寺格西建议，卓尼康村对我的身份问题鸣发不平之声，尤其负责确认灵童的资深格西们认为，洛桑格列这一孩童实乃当初由甘丹东山卓尼康村确认为伊黎仁波切的转世，并举行坐床仪式，而且严格按照传统仪轨，并根据各种征兆和护法神谕确定的真身灵童。然而，现在这件事却变得牛头不对马嘴，这样否定，岂不是违背常理，亵渎神灵？他们认为应该把前后缘由向十三世达赖喇嘛做个详细呈报。并且要请示这位孩童是否有法缘，若有应该到哪个寺院出家，以求定夺。这一提议得到多数人的同意，甘丹寺便专门派人到拉萨向十三世达赖喇嘛禀报此事。

很快第十三世达赖喇嘛作出了明确复函：“经谨慎验证表明如下，洛桑格列无可置疑为甘丹卓尼寺伊黎仁波切转世灵童。该转世灵童继续留在甘丹寺，不宜挪居他处。”而且第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亲笔复函中，特别把藏文“伊黎”更正为“宇鲁”，且作了说明，并赐书：“为消灾避祸，广开福田善门，唵颂《贤劫经》和洗礼仪轨百遍。”这封请示复函经快马传递驿差递交甘丹赤巴府邸后，札仓及康村深为欣悦，并决定以宇鲁仁波切的身份在甘丹寺为我安排了住处。从此管家和梭本<sup>4</sup>也一同留任在寺院，以及专侍，有时还召唤母亲前来照顾我健康成长，从读写等方面开始引导培养我。

随即，在札仓的安排下以宇鲁仁波切的身份觐见了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图丹嘉措尊者。当时尊者在诺布林卡夏宫接见我，并且亲切而风趣地说：“我给你取了个‘宇鲁桂贝幸康’<sup>5</sup>的名字。”尊者并亲自主持我的出家仪式，赐法名为图登多典。

之前由班禅喇嘛确定的伊黎仁波切的转世灵童，后来被第十三世达赖喇嘛确认为策门林寺洛桑丹巴见参仁波切的转世灵童，同时从安多卓尼寺迎接到拉萨入色拉

---

4 膳食堪布/司膳。

5 藏语，度母刹土。

寺。因此，安多卓尼寺无需再渲染上世班禅喇嘛认证的伊黎仁波切了。

一九三一年我满七周岁时，札仓意欲申办寺院祖古（仁波切）名号，但由于康村的主事出于供养所需的经济开支而担心，认为有了札仓祖古的尊号就行了，所以暂时没有申办寺院祖古尊号。但进入札仓僧团后，平时参加法会时应给每个僧众供养茶食和现金一钱五分的惯例开销，这如同所有转世仁波切一样由康村照常支应。

在札仓内我的座位排在寺院祖古的下一位，由此当年举行桑普夏季法会时，为了庆贺我开始学法相（佛教哲学），还特别对法相班学员要供养茶食和藏币，并拜普康僧人格敦格桑为经师，开始传授基础功课，之后逐渐升级到因明学课程。同时，管家和司膳等都由寺院来承担。那时因为康村条件差，僧侣生活没有保障，常常会出现断粮停灶的情况。我跟自己的前世管家洛桑列久一起生活，我们僧舍的经济不佳，曾多次到其他康村僧舍去讨饭。

一九三八年，十三岁时，札仓让我到班上旁听，同时管家由平措赤列担任，生活条件改善了许多，同时

学习方面也一直不断升级，为了以真知断除对论典的疑惑，同其他转世仁波切一样，在僧众前举行起座对辩<sup>6</sup>，也同时向札仓等进行财物布施。一九三九年，十四岁那年，又举行了不了义起座对辩，班上所需之供养等理所当然一一进行。同年，在甘丹寺怙主帕旺卡仁波切处接受了完整的《菩提道次第论》传授。

事实上一名仁波切的成长和培养过程很不容易，能否成为一位名符其实的仁波切就要看他本人能否吃苦耐劳来决定。当升到一定的班级时，年迈的管家和拉章管事们因相继去世，同时，这对我的管束和教育也产生极大影响，因此慢慢与一些不求上进的人为伍，开始染指赌博浪荡等堕落恶习。如此荒废两三年时光后引起了札仓的关注，札仓召集康村管事，训斥他们对仁波切管教不严，并要求今后杜绝不良习气，安排和督促生活学习事宜。康村不敢怠慢，及时安排新管家洛追塔庆负责管理我的日常生活，从此又如同从前一样有规律的生活开始了。当然，这对自己改邪归正、步入正道起了关键性作用。

不用说康村，甚至札仓都如此在意观照我的原因是，因为他们非常尊重历代宇鲁仁波切，仁波切对札仓

<sup>6</sup> 各大寺院在集成千僧侣的法会上，二人起座离席，当众一问一答，辩论佛教相法的一种考试制度。

各方面也留下了辉煌业绩，所以，他们不希望我这个五世宇鲁毁掉历代前辈们艰辛树立的名誉声望。我的启蒙恩师根敦格桑经师去世后，再拜嵩曲格西遁世士巴旦达瓦，以自己的能力系统修学《中观论》、《现观庄严论》及《俱舍论》等大论。因资质大大不如年幼时敏锐，每次参悟要义时需要费极大功夫。

一九四五年，二十岁那年，在色拉寺杰札仓的前任住持伦珠尊追大师足前接受比丘戒，翌年，我在甘丹寺称之为惯例举行的僧众向“偌羌巴”<sup>7</sup>仪式上，这也是每一个上师和格西入座前的入门仪式，我在僧团大众前背颂了大威德金刚《生圆次第论》。

一九四七年，三大寺在大昭寺举行的大愿法会上，本人有幸为准备立宗措让巴和拉然巴格西学位前行做准备，在甘丹寺的夏季法会期间，为期三天立宗多让巴格西，以及甘丹北山寺秋季辩经法会辩经场立宗对辩达半日之久，并按本班级惯例进行了供养布施，如此为争取拉然巴格西学位做了前期所有准备。总之，那时立宗争取拉然巴格西情况如何，请看下一章。

---

7 通晓佛经的博士。

## 二、争取拉让巴学位后立宗密乘格西； 岗岭康珠仁波切为保国投笔从戎

橘黄色树叶被秋风沙沙吹落，夜空闪烁点点寒星的漫长寒夜里，总是梦牵魂绕的心愿，在二十三岁那年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一九四八年藏历五月二十六日开始在诺布林卡举行了为期五天的拉然巴格西的辩经考试，面对哲蚌洛色林学院的著名大学士白玛坚参等十五位大学识格西的亲自面试，起初心里总是万分惶恐，对自己的那点学识没有信心，深怕给札仓、甚至给甘丹寺丢脸，之后慢慢鼓起勇气打消怯场心理，靠各位恩师多年辛勤疏导和自己勤奋钻研所积累的知识，尽自己所能地应对了十五位大学士的轮盘考问，最终总算勉强过关了。

为庆祝通过拉然巴格西考试，在藏历十一月初举行的命名格西的发誓良缘，我向甘丹札仓的所有仁波切供养膳品外，还按规定给每位僧众供施了茶食及银钱二两半，供养圣尊三宝五吉祥贡品，对最殊胜佛像供养了八十五枚银元打造的镶金银桶一对，和同等银量造就的

镶金米盘一对，净重四十两的银勺一对，外加火镀金等合计供奉价值达藏银五千多两及喜庆哈达两条。

翌年，藏历一月十五日，三大寺及上下密院的上万僧众云集的大愿法会上得到对五部大论进行游学辩经立宗的机缘。能得到如此无上良机不仅是前世积德的回报，更是依所有恩师在今世的教育恩德和自己勤奋所得的结果。当年的大愿法会顺利结束后，又对墨竹仁庆林寺和思布卡甲寺的僧众供施了茶食等惯例布施，并且此年住在仁庆林寺认真补习了本尊大威德和瑜伽母密乘。一九五一年藏历一月二日，二十五岁那年以拉然巴格西资格正式入住善知识格西云集的雪域高等学府上密院。

在上密院期间从堪仁波切洛桑云丹处聆受了《正法註疏——四家合注》和《胜乐显密》以及唐萨巴编著的《大威德生圆次第论》等。参加秦达定期法会时利用空间时间细心掌握《密乘我生论》以便熟悉上密院的教义，也巴<sup>8</sup>法会期间与上密院的普通僧人一起熟练密乐威三圣主坛城及法器供品等绘制使用技巧，虔心接受两位专业大师的督导考核。抱著今后充当监寺的心愿严守著寺院的清规戒律。

---

8 拉萨东北一山寺名，系松赞岗布妃蒙萨赤江命工修建。

之前考取拉然巴格西时为供施而欠下寺院和札仓的二百多章多<sup>9</sup>，之后在上密院期间的三年多里，依靠到村庄主持法事和各法会的供养，还有管家嘉措云丹做木工争来的工钱，点点滴滴精心积攒才一一还清了借款。

一九五三年秋，受过密法戒律的所有拉然巴格西到诺布林卡辩经考试的通知，该通知由堪布传达给了我们。那天在诺布林卡由甘丹赤巴及东山和北山寺两大学院法主，亲自对来自三大寺的十七位拉然巴格西进行了密乘考核审评，经过七天的考核，对十七位拉然巴格西评判了密乘格西学位。那次获得拉然巴格西学位的第一名是来自甘丹寺精通显密二宗的拉然巴格西洛桑班旦，第二名是博学多才的来自色拉寺拉然巴格西仓追，第三名是色拉寺的拉然巴格西洛桑色葛。在逐一评审中我荣幸地获得了第十四名。这一殊荣对我来讲是此生最大的荣誉，是平生勤学成果的最大肯定，特赋拙诗一首以抒情怀——

村野幼童称之转世佛  
身着赤黄袈裟虽壮观

---

9 西藏货币，一章多等於藏银五十两。

然在精通大论智者处

今生获此善果更欢心

世事无常，乾坤无固，到西元一九五六年时西藏这一与世无争的国度，开始日益加剧了中国共产党的武力统治，直接对西藏的政治地位及藏传佛教，甚至所有藏人的生命财产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威胁。身为百万藏人中受过教育的一分子，保国护教理所当然是无可推卸的责任。十三世达赖喇嘛尊者在水猴年对西藏民族发出的红色预警已经逐渐成真，在这危急存亡时刻，我们必须及时召集各寺格西堪布和民众中的有识之士，立即对时局做出预测和对策，为保西藏的独立地位应该尽快向与中共对峙的各国发出援救呼吁。但这只是我等少数人的想法，事实情况远不如我们想像得那么简单，中共无孔不入的渗透、收买，令甘丹颇章<sup>10</sup>官僚队伍的不少人早已成了他们的喽啰，这种里外勾结，各取所需的勾当早已成了公开的秘密。此外仅因内部一些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的小矛盾或个人的一些历史恩怨摩擦，只知借外敌之手以求达到各自目的，全把国家民族利益抛到九霄云外的大有人在。事实上当时甘丹颇章里精忠为国为民族的忠义之士已经不多了，但也不是无人，只是在强势境外实力过於弱小而难以发挥作用罢了。加上多年来疏

10 西藏政府。

於防范对中共的侵略野心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最终导致了如此令人寒心的局面。在这种关乎国家民族及藏传佛教生死攸关的重大历史性危难关头，力挽狂澜的沉重担子落在了当时年仅十几岁的十四世达赖喇嘛肩上。但溃坝之后再想阻止洪水为时已晚矣，仅甘丹颇章的许多官员的所作所为就是难逃此劫的鲜明征兆。从某种角度讲，导致如此结局的根本原因是历代埋下的祸因，最终兑现现在我们这一代人头上，是因果报应。

一九五七年遵照达赖喇嘛的旨意从上下密院挑选的二十名僧人，分别在扎伊巴和热振两寺举行了祈求十三位护法、法王、白度母等，共为期五个月的祈福法会，这期间所有费用均从达赖喇嘛私人金库支付。召集这一法会是为了祈求护法神灵保佑西藏的政教事业，所幸当时自己为民族事业尽过一份薄微薄之力。此外，当年在诺布林卡参加了近五个多月的祈求十怖威和伏魔金刚的祈福法会。

按惯例争取密乘学位时，就要能解释宗喀巴大师的《密宗道次第广论》和龙树的《五次第论》以及印藏各密宗大师的密法註疏和密宗四部<sup>11</sup>，特别是贡噶顿

---

11 事部、行部、瑜伽部及无上瑜伽部。

珠的《次第论二疏灯》要通论背诵，然后靠记忆讲解。因此，我把一九五八年轮值去扎伊巴寺参加一年佛事活动的行程申请准假后，回甘丹寺开始了闭关修行。在甘丹期间遇见了我以前的师兄，现在是甘丹东山寺大学士洛桑丹增，他当时表情异常严肃地对我说：“那些汉人刚到来时倒和和气气，可现在已经傲气冲天目无旁人了，我们现在虽受嘉瓦仁波切<sup>12</sup>的恩惠，日子还算过得不错，但对西藏的政教前途不能没有忧患意识，像现在这样糊里糊涂地混日子，不久肯定会被汉人像包包子一样包起来后会吃掉的。眼下由安朱仓贡布札西带领的曲西岗朱<sup>13</sup>义勇军正在招兵买马扩充实力，已经到了发动僧俗全民把中共驱出雪域的时刻了。”尽管我在闭关期间也时常担忧拉萨的时局状态，但对他所说的话没有太注意，我说，我们没有抵抗能力，如果徒手冒然反抗不会有什么效果的。他说：“这你就不用担心。”当时，他要去参加义勇军的事，一个字都没有向我透露。

事后，一九五八年藏历十一月二十九日晚，听说他与甘丹寺的一百多位僧人组成一个僧团军，英勇参加西藏南部的抗共卫国战役，顿时对他们产生了由衷的敬

---

12 藏人对达赖喇嘛的尊称。

13 四水六岗卫教义勇军。

佩，还因未能与他们一起并肩战斗深觉遗憾。一天，我对卓尼康村的僧人贡布谈了自己的想法。“甘丹寺的百名僧团已经参加了‘曲西岗朱’义勇军，可我已经约定了第二年年初要去扎伊巴寺考密乘学位和供施活动的行程，所以暂时还无法脱身。待扎伊巴寺的活动结束后，即刻处理掉所有财物，将去参加‘曲西岗朱’义勇军了。”他一听马上道：“如果你真的要去，我也决不含糊，一定跟你一起去。”就这样，我们还约定了出发的时间。

本以为中共不可能轻易推翻西藏政权，他们还没有那么大的实力，等扎伊巴之行结束后再去参加义勇军应该还来得及。因这个想法，延误了我当年及时参加抗共卫国战役的机会，至今回想起来依然感到后悔不已。

当年藏历十二月，甘丹南院康村的四位僧人满怀信心地前来找我，向我请求护身符和加持物给他们，可是，我既没有护身符更没有加持物，唯有一尊本尊威德母佛像，是我准备参加义勇军时要随身佩戴的圣物。我知道他们是要去参加义勇军的，而我除了叫他们多向本尊祈求外，没有什么东西给他们，在表达歉意的同时勉

励他们团结一致，以智慧与勇敢面对敌人，千万不要抢劫伤害百姓，我们吃斋念佛从戎护国这一切都是为了老百姓；我还对他们说，听说上次参加义勇军的甘丹寺百名僧人中，帕若康村的僧人巴跋欧珠是汉人的奸细，要他们多加留意。他们说早已知道此事，而且我们寺院的几个僧人和喇嘛中的古秀巴苏听说也是汉人的奸细，让我多加小心。

一九五八年藏历十二月，逢轮值担任上密院密宗法师，主持伏魔铁堡和驱鬼避邪等法事。当时的时局已经到了紧要关头，大有随时发生动乱的迹象，那天我到松仁波切洛桑尊追处，告诉他战事迫在眉睫，仁波切应该避难到印度，凭仁波切的渊博学识，以后肯定能为西藏的政教自由事业发挥巨大作用，这里有汉人内鬼已经不安全；但仁波切反问我知不知道本寺的一些僧人近期去纠缠古秀巴苏的事情？我以曾听到的南院僧人的话作了回答。仁波切满脸不信任地连连摇头说：“我绝不相信古秀巴苏会做出这等事来。”

获取密乘学位部分论辩仪式全部完成后，为道场上的密乘发誓做好了一切准备，并为来年担任上密院的监寺特地准备了服饰，心想到时密法教规严格按贡噶顿珠的戒律仪轨做到漂漂亮亮，不幸的是时隔几天，共军对西藏首都拉萨残酷的武力镇压已经开始了。

### 三、对密乘僧侣分发护身符； 焚烧中共兵营僧伽舍生

藏汉冲突一触即发的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五日一藏历二月一日早上，我正赶往拉萨巴廓街时，很多人正急著赶往诺布林卡，并一传十、十传百地说，汉人以邀请嘉瓦仁波切（达赖喇嘛）到中共司令部观看演出为名，将要劫持他。我当时不大相信这种说法，不相信汉人会轻易向嘉瓦仁波切动手，只认为是危言耸听、庸人自扰。可就在当天晚上整个巴廓街挤满了人，激愤的人群一边游行示威，一边高喊口号发放传单，其气势令人震撼，还把堪琼索南坚赞（嘉措）<sup>14</sup>的尸首拖到马路当街示众。看到此情此景，既感到恐怖又对汉人的行径义愤填膺。

许多来自四面八方的人，用牲口驮著补给装备纷纷自愿去守卫诺布林卡，他们义无反顾的举动感染了所有藏人。为表示拥护，我大声赞扬了他们的壮举，高声

---

14 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帕巴拉·格列朗杰的胞兄。据说此人投靠中共，受其驱使，出卖民族利益而被民众处死。

祝愿事随人愿，旗开得胜！

往日祥和的圣地拉萨，此刻到处弥漫著令人坐卧不安的紧张气氛，此时此刻自己本想做一点什么，可除了多年所学的一点佛学知识外，什么也没有，忽觉自己如此渺小无力。第二天一大早，就跑到绕慕齐寺<sup>15</sup>想找一把顺手的利剑，但都被其他僧侣取光了。当时在拉萨雪印刷厂举行的会议，以及到诺布林卡传旨院没有适合人选前去参加，自己便可以担任札仓代表。因而特意向上密院木雅康村的主事洛桑札西提出了我的这一想法，可他对我的积极表现除了表示感谢之外，并没有给我安排任何具体任务。

上密院的密宗僧侣按惯例在觉摩隆<sup>16</sup>召集法会的时间在即，我建议所有主事者鉴於随时可能爆发战争，大批僧侣不宜在觉摩隆寺聚集，今年应改在绕慕齐大院内举行，最后他们听取了我的建议。藏历元月三日的早会刚完毕，我被叫去协助打开宝箱，取出圣物制作护身符后分发给僧众，我欣然前往。打开宝箱后，里面装著特别保存的历代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以及上百个高僧大

---

15 拉萨小昭寺。

16 在拉萨以西堆隆德庆县境内一地名。

德的袈裟和加持过的圣物，这些都是好几代密宗僧侣精心保存的罕见珍贵圣物，我们把这些圣物剪碎后，做了许多小袋，上面添加封记后逐一分给了僧众。

我在甘丹寺的好邻居嘉措云丹从寺院来找我，他说要去守卫诺布林卡，我为他准备食品等所需物品，送走他后，我准备了一套俗装，又给策门林寺的主事阿旺西绕捎话，请他借一支枪给我用，他回话说拿枪守住绕慕齐还不如去守策门林，绕慕齐一旦发生枪战会危及到释迦牟尼佛像。后来他借我一支崭新的七九步枪和六十多发子弹，我们准备守卫在绕慕齐和策门林两地之间，虽然，我等僧人对战事和武器一窍不通，但我们对这一带的地形却瞭如指掌，可以进退自如地打击来犯之敌，此刻我们都做好了守卫寺院迎战共军的准备。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九日凌晨三点左右，沉浸在万籁俱寂酣睡中的人们突然被震耳的炮声从梦中惊醒，藏汉武力冲突正式开始了。我急忙穿上衣服从房顶向远处望去，看见布达拉宫和共军司令部之间像流星穿梭般的弹头划破空气的呼啸声和爆炸声久久不绝於耳，且变得越来越激烈。我发现拉萨城上空布满了嫋嫋繚烟，当初还高兴地以为是我们得胜后煨桑的繚烟呢。赶快下楼换

上俗装，叫老僧图登旺久做早餐等我，拿著枪便去了绕慕齐。

到绕慕齐后对内库管家嘉措表明我们来这里的僧人都是来保卫寺院的，寺院里如果有别人典当的枪枝赶紧拿出来发给大家，他很沮丧地摇摇头说连个刺刀都没有。我听说色拉和哲蚌从政府枪械库借了枪枝弹药，便问他绕慕齐为什么没有去借几支？他说密宗院的秘书跟他昨天特意跑到传旨院和拉萨雪印刷厂申请拨发自卫武器的要求，但他们说大总管亲自交待，不能分发武器给上下密院，这是噶夏政府的命令。他俩又找上大总管，可他发誓说不准给上下密院分发武器，这是达赖喇嘛的旨意，实在爱莫能助。

当晚，上密院僧人彭布阿旺和塔拉戎巴的阿培益西急急忙忙前来找我说：“绕慕齐前的那座中共兵营应该想办法马上除掉，要不然汉人会从那个地方袭击绕慕齐，这座机关对我们威胁太大了。”我叫他们先不要擅自行动，我们在此执行守卫任务，以及采取反击行动。如果要对该兵营采取行动，一定要向上密院堪仁波切洛桑班丹和主事喇嘛仓追仁波切汇报。于是立即派人联络汇报的同时，我们迅速准备了放火用的燃料，如：煤油、棉布、喷射燃料的水枪等，一切准备妥当后，我与

他们两人以及普康次格为主的众多僧人，带著工具悄悄摸向汉人的那座机关。

原计划是待我们接近目标，趁敌人没有防备时突然下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这座机关烧成灰烬，可是一到那里才发现敌人的防护墙太高，从外面用水枪泼洒煤油根本无法触及兵营库房，好多油白白浪费在空地上。无奈之下采取了挖墙打洞的办法，也不知道是不是惊动了里面的敌人，他们是否已经做好了反击准备，当从打开的洞口一个个冲向院内时，突然从对面黑黢黢的窗口传来一阵枪响，冲在最前面的彭布阿旺和阿培益西等当即倒地一命呜呼了。看来汉人早已做好准备正在等著我们往枪口冲呢，尤其对方一阵阵猛烈扫射简直令人心惊胆颤。由於对方火力强大，我们既无法去抢救伤员，从正面也无法使用水枪实施放火计划了，无奈之下，我和塔朱、普康次格等人避开正面火力趁夜色绕到了侧面窗口前，砸开窗口把准备好的燃料统统扔到里面，点上火后迅速离开。撤回途中看见那座兵营上空冒起了滚滚浓烟。后来听上密院的江智其穆说，开枪打死彭布阿旺等人的凶手是拉萨贵族札聂尼拉的老婆。还说，他当时看得十分清楚，就是她没错。

不久，汉藏之间的战争全面爆发，我等几位上下密院的僧人在绕慕齐佛祖前庄严立誓，与汉人血战到底。

#### 四、觉奥佛祖足前还戒律； 誓死保卫小昭绕慕齐

我们从战场撤离时队伍人数减少了许多，此次行动我们虽然付出了惨重代价，但火烧兵营的计划也成功了。回到绕慕齐正在就餐时，上密院的管事洛桑罗布匆匆跑来，惊奇地看著我说：“你还活著啊，这太好了，我听说你已经死在兵营大院里，有人还为你祭奠到大昭寺供金灯去了呢！以后由你和格西江智两人负责管理绕慕齐的日常事务，有什么问题可以跟嘉热堪琼反映，他一直都在经理室。”

绕慕齐的大院里聚集了上百名要参加义勇军的僧人，其中格西江巴达瓦说，我们不能这样乱哄哄没有规律，应该要立刻行动起来有组织地共同反抗共军。经他们同意后，我作了简单的动员和部署，我说现在已经到了抗击共军的关键时刻了，人人要奋不顾身地承担保卫寺院的任务，并把每十人组织成一个班，每班各选了一名班长，带枪的有七人，他们分别安插在各班里，对总共一百二十名僧人都安排了守护绕慕齐各个要道的具体

任务。还给老僧们安排了后勤工作。在这非常时期每个人为表达对西藏政教事业的赤诚之心，由甘丹雅热格西且增曲培主持下，我们三个不同教派的僧众和密乘僧侣在绕慕齐佛祖足前庄严地立下誓言。

中午时分内库管家接到派人去领武器的通知，我带领二十人也同前去领武器的拉萨市民一起出发了。大道已被共军的火力封锁的无法通过，我们与民众一起迂迴从东林卡穿越时，共军的火力突然朝向我们，瞬间东林卡的路径也被密集的火力封锁了。后来经民众建议，守卫大昭寺的藏军警卫营在无量佛殿屋顶上架起了两门追击炮。他们瞄准共军的碉堡进行炮击，炮弹准确无误地落到共军碉堡，顿时摧毁了敌人火力点。然后又炮击了有大量共军的人民医院，直到六箱炮弹全部打完时天也快黑了。

当晚听到达赖喇嘛尊者已经离开拉萨的消息，顿时心情一下子沉重了许多，但对外丝毫没有透露这个消息，怕僧众听到这消息会失去战斗信心，而更加强了对防守和后勤工作的巡视监督。二十日早晨调来藏军一个连，以共同守护绕慕齐，我对那个军官说，这两天免不了将与中共军队展开一场硬战，我们在此守卫绕慕齐的

僧众一定会协助你们坚决抗击共军，但大多数人没有武器，请你把战争中伤亡藏军的武器及时配发给我们。他感动地点著头说一定照办。当晚九点多共军从四面八方开始袭击绕慕齐，阁楼四周的玻璃都被打碎了，我们跟藏军同心协力顽强地展开了坚守战，战斗中五六名藏军和几名僧人不幸牺牲。那位军官把伤亡藏军的武器交给了我，我再分给了各班。

在绕慕齐经理室由嘉热堪琼和孜仲札巴雅杰、孜仲西念贤千、喇嘛居巴仲益，加上我共五人召开了一个临时会议。在会上嘉热堪琼说：“这两天的阴沉天气，对我们很有利，是天助我们。如果天气放晴了他们会从空中攻击我们，那时我们将处于极其被动地位。现在有些民众要去袭击人民医院，我们要配合他们的行动。”在座的各位都同意了他的决定。孜仲札巴雅杰给了我一挺机枪和一把冲锋枪。就这样，我们准备到人民医院放手跟共军大干一场。此次行动本来要组成一个精干的小分队，但在江智其穆的带动下，僧众都接二连三地提出了参战要求，最后想去的都去了。当时的人民医院虚有其名，除了共军的几个伤兵之外并没有其他病人，而且伤兵也早已转移他处，完全成了共军的兵营。僧众高呼著“反侵略国”的口号，奔向人民医院的途中，忽然，

藏军指挥部吹军号提醒藏人，拉萨兹苏塘方向有大批共军进军。这个消息令城内各处正在战斗的藏军和僧俗都感到惊慌失措，陷入进退两难境地。

我和几个人爬到嘉热庄园<sup>17</sup>的屋顶向坝兴塘方向望去，看见身著土黄色军装的共军像决了堤的洪水般向市中心涌过来了。我和洛桑丹增还有三个藏军瞄准共军进军方向进行射击，由於相距甚远看不清效果。我把借来的七九步枪的六十多发子弹全部打光后，又从藏兵手中要来一支英式步枪和诸多子弹继续把守阵地。共军重点对绕慕齐南阁楼和嘉热庄园进行了猛烈炮击，我们被迫撤退到内院，大院内外到处都是尸体，很多僧人也受了伤。这时共军的装甲车开到绕慕齐吉堆札仓的大门口，随后用大炮开路冲进了内院，我们完全被打散了，我立刻把枪藏在门神的塑像背后躺进尸体堆里，一个士兵对每具尸体逐一踢了几脚。共军又前前后后、里里外外搜寻一阵后才离开了，但他们没有发现我。

等共军离开后，我又端起枪做好随时还击的准备，并迅速从德萨与甘丹卡萨穿越时，迎面跑来了很多藏人，突然又从四面八方响起了激烈的枪声，如同下冰

---

17 今为拉萨气象站。

雹般的子弹又栽倒了一大群人，弹头落在墙壁和边沟里溅起了一阵水花和尘埃，同时从绕慕齐冒出了一阵阵浓烟，可能是共军放火烧了绕慕齐寺院。我因无法守住寺院而痛心不已，但力量如此悬殊的情况下只有徒唤无奈。凭著熟悉的地形，我迅速跑到策门林，可是策门林大院里同样到处是尸体，於是又跑到了格林厦，此处相对安静多了。这里有一个从哲贡寺来的卜卦师，他对我卜了个度母卦，说“暂逢凶，后化吉”。“暂逢凶”是有目共睹的事情用不著卜卦，我想听到的是下一步该怎么办，但这个问题卜卦师也永远无法回答。

此时此刻整个拉萨淹没在枪炮声中，不久共军对安朱仓<sup>18</sup>进行了猛烈轰炸，瞬间把整个房屋炸成了废墟，莫说是里面的人，连四周邻居也炸死了不少，幸免於难的人都四处逃散了。我不想龟缩在角落里，大昭寺有很多藏军和义勇军，我想与他们一同抗击共军。那时共军杀红了眼，不管是不是抵抗军，只要是藏人准会开枪。所以，从正门根本无法通行，只有走后门，但此刻后门也已关闭，而且大昭寺里的人，以及四周房顶上的很多藏人大声喊：“同胞们不要再抵抗了，再打下去我们的大昭寺和布达拉宫会遭到汉人的轰炸，赶紧投降

吧，我们已经投降了！”我的天哪，连军人都说已经“投降”了。顿时这对我继续战斗的信心打击不小。天黑后想通过吉卜岗秘密出城，但共军已经布下了巡逻岗哨，来到曼卓桥也已经过不去了，桥头到处是人的尸体和驮物品的毛驴死尸。共军在阿沛的房屋上修筑碉堡，封锁了曼卓桥及其四周通道。我返回下密院时遇到了桑丹等人，还有一名德朱拉章的马车夫，车夫知道我们的身份后，满脸悲伤地说共军把德朱仁波切和贡如堪追押到奔旭寺去了。当时在奔旭寺关押了许多藏军、义勇军、喇嘛僧官等。

此时，我们只有出城另寻他路才能保命，但通道几乎都被封锁了。当我们穿越米日后的柳树林准备秘密出城时，共军的探照灯来回地监视著柳树林周围的动静，此处也有很多尸体，可能是出逃者被发现后打死的。我们从林墙角小心翼翼地避开探照灯，爬行穿越了封锁带，当夜迅速翻越弥琼山来到了山上的寺院，在这里遇到了一起参加焚烧共军兵营的普康孜卡和塔朱，他俩各自带有长短枪两支。弥琼寺的尼姑们热情地招待我们，他们虽然没有打开院门，但从上房窗口递给我们足够的热茶热饭，还有被褥，说被褥想要的话可以带走。第二天来到了久母斯山背面的宽广草地上，不远处一只

孑然独行的野狼缓缓穿越草原，我们对共军的愤恨迁怒到那只野狼身上，称共军与野狼同属一类，便开枪把牠打死了，感觉除了一口恶气。

翻过卡多山头后正歇息时，上密院的洛桑坚参罗布也从拉萨逃出赶上了我们，见他没有带武器，我便把自己的一只英式步枪和六发子弹送给了他。我感觉自己的腿部隐隐作痛，因为在那场焚烧兵营的激战中弹片伤了腿部，此前没在意，但现在昼夜不停急速爬山后，伤口开始发作。这样，我无法跟他们继续翻山越岭长途跋涉寻找义勇军，分手之际我鼓励他们一定要参加义勇军，为民族尽一份力量。我们在山头分手后各自向目的地出发了，我的目的地是彭布老家，我想暂时回老家养伤，日后再作打算。

## 五、含泪依依告别多年僧友； 札果萨与妹夫邂逅相遇

血红的晚霞染红了西山顶，彭波山村上空弥漫着炊烟，彷彿它与战火无关。昼夜如野狼般地冒著冷冽寒风忍饥挨痛，这才来到了可以鸟瞰谷中村庄的这座山头。当即顺著积雪的山坡连滚带爬地走向村子，直到半夜时分才来到了一家叫彭波觉布德吉康萨的农家。这里已聚积很多正在借宿歇息的溃散藏军和义勇军，我在这家稍事休息吃了一点糌粑和热茶，然后直奔座落在觉布的密宗寺庄园。到密宗寺庄园时，院子里外也是溃散而来的藏军和义勇军，他们有些人正商议著逃难去印度的话题。第二天去印度的人果然出发了，该寺僧人劝我也跟著他们逃难去印度，他们说留下来肯定会落入共军手里，结局必定会很惨。他们还说，如果因腿伤不能走，他们可以背在背上也要到印度。我婉言谢绝了他们的好意，从西藏到印度千里迢迢，数月路程，谈何容易。祖祖辈辈生活在自己故土的同胞们，忽然间要逃难去一个谁都不熟悉且远在天边的异国他乡，从此颠沛流离，生死两茫茫，不知何时才能生还故里，但这是如此绝境中

唯一的一条活命出路。临行时我们依依难舍，忍痛挥泪一一道别。

我在此地待了数日，跟庄园的税官阿旺扎西商议后，庄园贮藏的所有粮食按人均分给了差户，并作了详细记录。第三天共军在夺底林县张贴公告说：“无论是否参与过抵抗，任何藏人，一旦选择投靠他国，就没有出路。西藏的天地皆一同已经由共产党彻底接管，如果远离反动分子就不会遭到逮捕关押，可以依旧生活。”共军的公告正令我们灰心沮丧之际，忽然又传来了大批藏军和义勇军已经挺进甘丹寺，翌日就要进攻拉萨共军兵营的消息。我怀著将信将疑的心情离开了觉布，来到彭波河下游的平原上看见一个年轻人正在田间耕作，我走到他面前向他讨一顿饭吃，他说茶已经喝完了，若喝藏酒的话还有一壶。我使用青稞酒拌著糌粑饱饱地吃了一顿，稍后酒劲发作感觉有点悠悠醉意。那年轻人问我是不是贵族家的仆人？我说我就是贵族的仆人，在诺布林卡与老爷走散了，拉萨到处都在打仗，所以跑出来的。他很同情地说：“你现在离开这里，今夜肯定找不到落脚的地方，倒不如在我家住一晚，明天一大早再赶路？”我想，连夜赶路去甘丹寺探听一下，来了大批藏军的消息是不是真的。想到这，我谢绝了年轻人的好

意。

乘著酒兴很快经过白荣村来到了扎热渡口，并及时赶上最后的牛皮船渡到了对岸。刚一下船无意中遇到了我的妹夫，他一见到我，喜出望外地紧紧抓住我的手说：“可找到你了！觉布庄园的几个僧人到你阿妈家说，你已到了觉布，他们还说要带你一同去印度，可是久等不来，他们不敢耽搁於是先走了。阿妈听到你的消息后特别著急，迫不及待地派我来寻找，并连连叮嘱一定要把你带回家，三宝保佑我找到你了。”与妹夫的邂逅相遇，再加相见母亲心切，改变了原先要去甘丹寺的计划，於是与妹夫一起直奔老家。

一到家里，阿妈高兴地满眼含着泪花，紧紧握住我的手说：“是我的儿子真的回来了？感谢三宝保佑，我儿平平安安地回家了！”阿妈拿出家里所有好吃的东西摆在我面前，我一边吃著丰盛的晚餐，一边详细讲述了在拉萨期间如何展开反抗共军的所有经过。与母亲和亲戚相聚的几天间，听到了一些外面的消息，所谓大批藏军挺进甘丹寺的说法纯属谣言，不过“曲西岗朱”卫教义勇军在山南正在抵抗共军的消息确实是事实。由此我想到山南去参加义勇军，但此时此刻想从朱茜村走出

去已经很困难了，因为周围村子已经住进了汉人干部，某些普通民众受他们的蛊惑，为他们传递消息，我回家的消息也早已传到干部那里了，我的举动已经在他们的监视之中。

一天，中共的几个干部果然到我家，摆出一副假惺惺的样子说：“你的有些问题还没有调查清楚，所以你暂时不能外出，要待在家里等我们的通知。”过两天他们又到我家对我说：“拉萨绕慕齐发生的动乱事件你知道不知道？你是不是参与过此事，如果参与了，那就主动说清楚，我们不会追究你的罪责。即便没有直接参与抵抗，也把你所看到听到的事情毫不隐瞒地说出来，千万不要抱侥幸心理，我们对此事的前前后后已经了解得很清楚。”我对他们说：“拉萨因为发生了大动乱，为了避险我才逃回家里，我既没有参加过抵抗军，也没这个胆子，手里也没有任何武器，连一把刀也没有。因胆小一听到枪声便躲在屋内没敢出去，外面发生的事情我一概不清楚。再说发生动乱之前我已经逃离了拉萨。”那天他们并没有说什么。第三天他们再度出现，而且甘丹寺霍东康村的僧人洛桑米朗也一起来了，他已经投靠了汉人干部。他们把我带到了朱茜庄园，当天在朱茜庄园召集全村大会正要批斗庄园代理人敏久。会场上一名

干部对我说：“你的问题还没有搞清楚，所以你先需要学习，你马上带著行李到甘丹寺去，通过学习提高了觉悟，再把自己的问题交代清楚，然后可以马上回家。”

我的遭遇又给阿妈增添了新的痛苦，她流著眼泪替我收拾了行李，而后我被两名干部和一名士兵，还有两名甘丹寺僧人中的积极分子押著我走出了村子。一路上他们都骑著马，我则背著自己的行李徒步跟著，两个僧人积极分子对干部献殷勤地说：“今天有可能会遇上叛乱分子，要随时做好反击准备。”身为雪域僧人却对我叫“敌人”，对中共干部如此忠心，实在出乎我的意料，也深感这伙人如此险恶。也是从这里开始，我在中共九恶俱全的牢狱里，开始了漫长的囚徒生涯。

## 六、极力伪装蒙古人却露奸细马脚； 大张旗鼓批斗声搅乱幽静牧场

甘丹寺北山和东山札仓变成了关押藏人中的各派抵抗分子的牢房，僧人集中关在北山札仓，而俗人关在东山札仓。我被押到甘丹寺院后，交给了一名叫严沛部长的巴瓦人，通过此人被关进了北山札仓。那个叫严沛部长的人对关押的藏人很严格，以恶劣的态度说：“不准随便跟这个人接触、谈话。”又勒令我不准随便讲话，不然就要用手铐脚镣。天黑后左右同伴给了我酸奶和饼子，还提醒我要注意霍东康村的僧人洛桑袞顿，说他是伪装成蒙族的一个汉人。洛桑袞顿是个汉人，是中共安插在甘丹寺的卧底，他在五九年之前就已经伪装成蒙古人混入了甘丹寺。从此甘丹寺的所有活动他都向共军汇报，共军进入甘丹寺后即当翻译，又把参加过抵抗运动的僧人一个个交到共军手中，他的表现曾一度把甘丹寺的所有僧人都惊呆了。在此拘押的人当初对他们说是来接受学习教育，其实共军是要找出参加过反共运动的人，一经确认后便当犯人对待。幸亏当时参加过抗共运动的大多数甘丹寺僧人早已逃匿了。

此时寺院完全变成了共军的军营和关押犯人的集中营，北山札仓的主殿副厅成了共军的马厩，东山札仓的诵经堂成了杀牛宰羊的屠宰场。目睹著这一切恍如到了阴间般的场面，联想到自从宗喀巴大师建立本寺以来，多少高僧大德为弘扬佛法在此付出的艰辛努力和立下的丰功伟业，如今却变成了魔窟妖堡。心底不由升起了一股绝望的悲哀，痛悔当时没有跟其他人一起逃到印度。

全无人性的红色政权最终赤裸裸地佔领了甘丹这座佛学圣地，应验了十三世达赖喇嘛在水猴年对全体藏人发出的红色预警。某一天共军对甘丹寺内室管家丹巴坚参为主的喇嘛僧官以参与叛乱为罪名，进行了残酷的批斗。对无力反抗者不容辩解地遭受羞辱和毒打，我是生平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场面，使人吓得毛骨悚然惶恐不已。更令人费解的是中共入藏短短几年里，通过红色暴力的蛊惑宣传，很多藏人轻信中共，上当受骗，自己根本没有主见和立场，就像一把无根的水上浮萍随着流水乱跑。而揪斗殴打我们的都是甘丹寺僧人中的那些积极分子民族败类。

几天过后，一个叫胡洋（音译）的汉族干部负责

审查我的情况，（他是五九年专门派到甘丹寺的一名干部，后来八十年代我们在宗教局一起工作过。八七年在甘丹寺开展国际主义教育活动时，他又是一名骨干。总之，他的一生耗在镇压甘丹寺僧人的事情上了）他虽然是个汉人，可藏语说得非常流利，无需翻译，可以和我直接对话。刚一见面，他便开场白似地，首先将拉萨发生的动乱情形大概做了介绍，其中有些事情如同他自己亲自参与过那样讲得特别清楚。他接著说：“拉萨密宗寺的僧人焚烧我们兵营机关事件，你不仅参与过而且是你带头干的，这些情况我们其实早就知道，只不过想给你一次机会，你也要把握机会把前因后果交代清楚，争取从宽处理。”因此我想，他们既然了解得如此清楚，再隐瞒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就这样把焚烧兵营机关的前后经过一一说出来了。后来几天对这个问题反覆审问了好几次。

审讯告一段落后，把我关押在驻扎甘丹寺的大批军人和干部的伙房里，担任背水的差事。每天从寺院附近背八九桶清泉水，用泥罐水桶背水需要特别小心，一旦摔坏了会遭到臭骂或毒打。后来我得到智霍斯嘉仁波切拉章的，平时用骡子驮的塑胶水桶的另一只，这样虽然不用担心摔坏，但这个塑胶水桶的容量太大，装满了

背不动，装一半走路又不能保持平衡，这个问题苦恼了我好几天。

不久在干部的鼓动下，部分积极分子动员东山札仓的僧人们起来批斗我，但东山札仓的僧人没有回应他们。后来他们调动北山札仓的僧人，在兹巴康村的院子里对我进行批斗。批斗的主要理由是参加叛乱的罪行没有交代清楚，尤其是反叛动机，如果不彻底交待清楚，就会让我把屎尿都拉在裤裆里，这伙人气势汹汹，看来势不两立的样子。我反覆解释已经彻底交待清楚了，再没有可交待的新问题；而动机是为了西藏的政教事业免遭毁灭，尤其是目睹西藏佛教正面临毁灭性灾难之际，身为一名僧人挺身护教本是义不容辞的责任，这就是我反抗的动机和目的。尽管我讲得都是实话，可他们并不满意这样的解释，积极分子们反驳说：“共产党根本不会消灭宗教，也不会剥夺达赖喇嘛的地位，你这是在狡辩，目的是不想把真实动机说出来，你不说我们有的是办法叫你开口。”还说：“时代变了，我们成了国家的主人，一切由你们说了算的时代已经结束了。”随后愤怒地举起拳头高呼：“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打倒反动派！”。我实在答不出令他们满意的答案，但也实在拗不过才对他们说：“听别人讲改革是很可怕的运动，所

以，我参与抵抗的另一个动机是为了反对改革。”干部们立即问我：“改革可怕的说法是谁跟你说的？老实交待。”其实这只是我无意间听来的，我也搞不清具体是谁说的，只好回答：“大家都这么议论。”积极分子立刻反驳：“我们可没有说过这样的反动话。”顿时批斗场像开了锅一样沸腾起来了，连一直坐在地上的其他僧人也一齐折腾，几乎异口同声地呼喊：“打倒反动派”的口号，如同捅破的蜂窝一样，顿时对我揪拉拽扯、拳打脚踢折腾一番。当时最令我痛心的是，一名平时很亲近的同一个康村的格西洛桑平措也对我吼叫著举起了拳头，见此情形我彻底寒透了心。

批斗会的浪潮一天比一天高，声讨反动派的批斗声浪响彻了甘丹寺的里里外外，昔日幽静的佛门圣地，现在沸腾的像一锅开水。我真的怀疑这些人是不是著魔了？真的想像不出他们会把我怎样？

我渐渐捉摸到了一个重要问题，在这样的关口，不能随便开口说话，祸从口出这话没错，稍不注意就会引火烧身，他们会死揪话柄问个没完。白天的批斗结束后，晚上又要在“打倒反动派”的震天呼声下继续批斗。有一次，一个叫贡布札西的藏族干部问我：“你跟

著藏军杀害了多少我们的解放军？”我始终咬定说一个共军都没有杀过。他质问我：“一个专门拿枪参加抵抗活动的人，怎么可能没有杀过一个人呢？你好好想一想，这有可能吗？”他这是在诱供，可我已经学乖了不再上他们的当，死咬一句话：“没有！”这一招还是很有效，尽管他们往往会说“态度不好”、“不老实交待罪行”等。积极分子们会跟著鬼哭狼嚎般地吼叫，揪斗一番，可最终他们也拿不出任何证据，事情就会不了了之了。

在甘丹寺关了大概六个月后，当年九月底，突然用一辆大卡车把我们二十多人送进了哲蚌寺。我们与哲蚌寺僧人中的“坏分子”，以及从附近抓来的藏人一起关在大堂里。

在哲蚌寺关押期间，有一天，哲蚌寺的密宗堪布资深学者丹增在密宗院的大院里挨了批斗，那天哲蚌德央康村的一个僧人积极分子带头说：“你们这些反动分子，以前如何残酷剥削压迫广大贫苦民众，今天对你的罪恶历史要进行清算。”随后，僧众进行狠狠地批判，同时开始了赤裸裸的暴力殴打，尤其那个带头的积极分子，殴打还不解恨，还用指头戳进了堪布丹增的双眼

里，硬要活生生地挖出他的眼球。侥幸眼珠子没有被挖出，只是眼睛受伤流了不少血，后来慢慢自愈了。

另外，哲蚌帕拉康村的内务大管家被押到批斗会场后，由於过度恐惧，还没有开始批斗就已经吓死了。那时所谓的敌我斗争、阶级斗争等的各种残酷斗争中，惨遭各种非人性折磨和毒打致死的人比比皆是，人们对这种人间罕见的悲剧，从惊奇心态逐渐变成家常便饭，平淡无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被摧残人格和尊严，甚至生命的大多数是藏人中有知识，有威望，有成就，以及有主见和思想的精英分子。

那年的十月一日是中共建国纪念日，也是中共在西藏第一次庆祝建国十周年节日。所以，那天他们在哲蚌寺召开庆祝会，摆设丰盛的宴席，所有共军和干部吃吃喝喝享乐一整天。他们当然不会对我们这些被关押的“罪犯”提供食物，但看管比平时稍微有所鬆懈。因此，我们聚在一起，分享了各自家属送来的食物。

当天早上甘丹寺的甲苏斯吉在哲蚌寺的厕所里猝死了。他的尸体被天葬师弄到哲蚌梯萨天葬台解剖，据说死亡原因是心脏破裂。

几天后，甘丹和哲蚌寺大批僧人被派到阿庆电站的修建工地去了，我和几个被看管较严的“犯人”仍然留在寺里。藏族干部洛追表情十分严肃地对我说：“不让你去参加建设阿庆电站，你知道原因吗？因为你是个罪大恶极的人，要不然你也会跟甘丹寺的其他有罪僧人一起到工地去。今天派去的僧人只要他们表现积极，等解除罪名后将成为国家的工人。而你如果不积极争取自己的出路，只有死路一条，这一点你要牢牢记住。”

不久，我们这些所谓重罪的“犯人”转移到仲扎玛康<sup>19</sup>，开始了漫长的囚徒生涯。所谓仲扎玛康其实就是扎基玛康，后来成为西藏最大监狱之一扎基监狱。这里不知关押了多少同胞，这也是我们这些被关押的人，在共军刺刀下建造的。

## 七、重罪犯人押送札基狱； 增建监狱河谷垦农田

战火之硝烟仍弥漫着晴空，野蛮的咆哮声在狱中回荡。本性捍卫正义之愿望驱使着毅力，虽身在饥寒交迫下仍在奋斗中度过，并展望着未来自由。一九五九年十月中旬，我们一百多名所谓重罪犯的甘丹和哲蚌寺僧人全被押送到了扎基监狱。扎基那片荒凉之地，有史以来第一次“迎接”了我们这些为保卫自己的国家和宗教而成为重犯的“客人”，从此它的名字也远扬到了全世界。扎基玛康较为完整能使用的房屋成了中共干部、军官、士兵的住所及办公会议室，而我们犯人则关押在四周密密麻麻圈起铁丝网的荒地帐篷里，并由士兵严密看守。后来在扎基犯人中广为流传的“帐篷囚徒先辈”指的是我们。不过在帐篷里没住多久，我们便搬进了破旧房屋。搬进的当天参与抵抗运动的近一百名色拉寺僧人也押送到了扎基。刚到的十几天伙食还算可以，因为共军从札仓、庄园、大户人家没收的食物中，一部分分给刚刚建立的扎基监狱。但没过多久，从四处押来的犯人越来越多，伙食却跟着越来越差了。

西藏的寒冷天气尤其是在这荒凉之地，突然搬进如此众多的人，不管是干部、士兵还是犯人，燃料成了燃眉之急。我们这些从西藏三大寺抓来的僧人由士兵看守，分别差遣到多日山、乃囊山、帕博岗、扎西曲林、觉布山等地砍柴。拉萨四周方圆百里都是光秃秃的山头，仅有少量耐旱极强又很刺手的植被乔木，无论如何，每人每天必定要砍回一百斤左右的柴薪。因人多缺乏工具，两人只配一把斧头或一把砍刀，砍的柴除了干部、士兵和犯人伙房使用外，其余的全送到别处去了。

一天，我砍到的柴都是长满针尖般多刺的荆棘，下山时脊背被刺扎的疼痛难忍，每走几步便需要停一次，结果远远落在了犯人佇列的后面。幸亏那天看押的是那位麻子脸军人和一个年轻的新兵，这两人不怎么训斥犯人，态度也比较和气，他俩不仅没有强迫我赶队伍，还从左右搭手帮我扶了一段路。尽管如此，我被那既沉又刺的一捆柴，累得两眼冒星，两腿发抖，直到晚饭时才回到了监狱。也许是受了风寒加上挨饿疲劳，使浑身冒汗发虚，连上厕所都需要别人搀扶，当夜连一口糌粑稀糊也没吃，迷迷糊糊似睡似醒地做了许多稀奇古怪的梦。

第二天早上我还在被窝里正迷糊时，耳边忽然听到藏族女干部次珠的大声训斥：“这些反动分子叫你们干啥啥都不会，真是一群没用的饭桶。”这个泼妇嘴巴毒心又黑，犯人对她极度反感，大家还议论著她使用的那个卡垫<sup>20</sup>和摆在她前面的桌子是从达赖喇嘛在哲蚌寺的寝室里搬出来的。犯病卧床的不仅是我，当时很多人因饮食不足，空著肚子强迫上山砍柴后，一大批人病倒了，监狱只好让犯人休息两天，体力稍微恢复后继续上山砍柴。

那一阵子，也就是六十年代初，扎基附近的天然植被，被中共的干部和军队驱使犯人砍伐，遭到了大规模破坏，有些植被连根拔掉后，从此绝迹了。

山上的树木植被将近砍伐殆尽时，犯人们分成两个队并进行了分工，一个队要制砖砌墙，在扎基监狱的四周筑一道高墙；另外一个队则是在河谷开垦荒地，将荒滩改造成耕地菜园。监狱的防护墙砌完后又建造了犯人的牢房。一九六一年所有犯人从玛康旧房搬进了新修建的牢房，还组建了女犯第三队与男犯分别关进了另一个院子。人们今天看到的扎基监狱的规模和布局，就是

---

20 铺在椅子上的坐毯。

当初由我们这些“犯人”修建而成的。后来囚犯比当初又增加了许多。

扎基玛康这座以前保卫西藏政权的重要军事基地，在不到两年时间里，我亲眼目睹了它如何变成中共的专政场所，如何变成关押摧残像我这样为保卫自己的国家和民族，而抵抗中共或反对中共统治藏人的全过程。谁能预料，不久前还住在这里背枪跨马的不少藏兵，现在成了中共的阶下囚，还用自己的双手修建了关押自己的这座监狱。这对藏人来讲何尝不是个奇耻大辱，更可谓藏民族有史以来第一次逼向灭绝边缘的一段可怕历史。扎基监狱的名声渐渐响彻了全藏三区，成了一个令人谈虎色变的人间地狱，有自我主见和思想的成百上千同胞的冤魂，徘徊在这座地狱上空。甘丹颇章的骨干；各寺院的喇嘛格西善知识；热爱自己民族的热血男儿在这里白天强迫改造，晚上学习红语录，互相揭发批判。这期间饿死的、被折磨虐杀的不计其数。直到现在，这座监狱依然是改造和摧残藏人灵魂的最大的人间地狱，历次反抗中共政权的无数同胞，大多数关押在这里，不少政治犯当今仍在此处，苦受牢狱之灾的煎熬。

搬进新牢房不久，来了两个为整座监狱安装电路

设施的一藏一汉电工，干部命令我做他们的帮手。那个汉族能讲一口流利的藏语，他说以前到诺布林卡达赖喇嘛寝宫安装过电线，还让我看他戴在左手腕上的那块精緻手表，神情激动地说那是达赖喇嘛送给他的，他还偶尔呼喊：“达赖喇嘛万岁！”。他个性开朗为人随和，对我这个犯人既不抱戒心也不轻视，危险的工作一般来说他不让我做，甚至归我的活，只要有空他一定会帮我。担任他的助手那段期间心情轻松了许多，从他的身上感受到了人与人之间的温暖和信任。但好景不常，一个多月转眼过去了，线路安装的工作旋即结束了。

一九六零年的藏历新年对藏人来讲是西藏被中共彻底统治后的第一个新年。大年三十那天，扎基监狱对全体犯人召开大会，一个汉族官员在大会上发言：“以前的藏历新年是西藏的三大领主花天酒地的日子，你们全是三大领主的一分子，每年会豪华奢侈地度过节日。可你们从来没有体验过贫苦的广大劳动人民是如何过年的吧，现在，你们所代表的剥削阶级统治的西藏历史已经彻底结束了，与此同时，广大的劳动人民获得了自由和幸福。今年的藏历新年该由劳动人民来过，而你们应该感受一下劳动人民以前如何过年的滋味。所以，你们今年要在劳动中度过藏历新年，以此方式补偿以往所欠

的剥削债。”就这样，那年在扎基监狱的第一个藏历新年，是在强迫劳动中度过的。

当时监狱里的伙食不仅很差，而且也缺盐巴，几乎都是清水般没有一点盐味的清茶淡饭，导致许多囚犯得胃病而吃不下东西。在这种煎熬下，我们被迫对寺院和庄园里没收来的整袋堆在一处的盐巴打主意。不过这得冒极大风险，因为有专人看守，弄不好会惹大祸。所以一定要寻找绝佳机会。我们分别耐心观察，终于在一个中午，得到了避开看守和犯人中的积极分子的机会，顺利地弄到了一小袋盐巴。尽管我们没有办法过新年，但拿到的盐均分众人后，终于在藏历新年吃到了有盐的茶饭。

## 八、搬沉重野樱木至香巴唐； 为赙续批斗带到仁庆岭

刚送别严寒，迎来春暖花开季节的一九六零年四月的某一天，长期驻甘丹寺的汉族干部胡洋（译音）突然来到扎基监狱，他把我从劳动场叫到监狱办公室，只说了一句：“立刻跟他去甘丹寺”。随即由两名士兵押送我，干部骑著马向甘丹寺出发。我想，该问的已经都问过了，这些汉人对我又折腾什么呢？路上我反覆揣测他们突然唤我的用意，心想事先应该有所心理准备，左思右想可想不出什么来，感觉不对劲，来者不善，善者不来。

走出监狱大门，看见监狱外面的社会与从前大不相同，田间、工地、屋顶、路旁到处插满一片火海似的呼呼飘荡的红旗，高音喇叭内不断地播放刺耳的歌曲，那歌声回荡在附近的山谷里。

一到甘丹寺，被直接带到东山札仓的一间幽暗小屋单独关押。第二天，拉萨军政委员会驻甘丹寺代表巴瓦格桑对我严格规定了二十四小时内的所有活动，勒令

我白天从甘丹寺的希达林卡砍的柴，背送到甘丹雪雄巴塘，返回时再把那里的树种背回甘丹寺；晚上则要接受审讯。每天要背一百多公斤的柴，沿著弯曲的山路到山下的雪雄巴塘，每天需要背三趟，返回时同样要背百来斤的树种到甘丹寺。常言道：“下山容易上山难”，背著那湿漉漉的一大捆树种爬坡，可想而知连牲口也会吃力发抖。他们怕我偷懒，专门派两名僧人积极分子来监督我，还特意配了枪给他们。积极分子手中拿著枪，毫不留情地像赶牲口一样强迫我完成每天的指标。尽管同样是佛门弟子，同一个民族，可他们绝情到连基本的人性都没有，没两天我的后背和手脚都磨出了血。白天赶毛驴那样强制劳动，晚上又轮流审讯到大半夜，尤其是巴瓦格桑反覆审问有关五九年参加抵抗运动的事，硬要我交代新的问题。平时给我吃的也是限量的，而且也是已经发了霉的糌粑。我明白他们想用这种手段彻底摧垮一个人的意志和体力，身心折磨加上伤痛，胃病已经把我逼到了油尽灯枯的地步。就在我对生存感到绝望之际，突然收到了阿妈捎来的一小袋新鲜糌粑，她知道我在甘丹的消息后，想尽办法特意捎来的。忽然，我的眼前浮现了阿妈慈祥的面孔和临别前那浸满泪水的双眼，冰凉绝望的心渐渐翻涌著妻楚、痛苦、渴望，渴望抱著

阿妈痛哭一场，倾诉满心的冤屈和痛苦。

他们特意把我弄到甘丹活活折磨了一个多月，后来可能感觉到我口中已确实没什么可捞的东西，弄不好还会命丧甘丹。所以，又把我送回了扎基监狱。当时押送我回监狱的除了胡洋，还有一名汉族干部，我们从甘丹搭了一辆顺路去拉萨的马车，马车上还有准备去拉萨开会的江巴洛追。之前，我们不仅是同一座寺院的僧人，还颇有交情。因此，我打算跟他打个招呼，可是他却根本不理我，始终背对著我，甚至以正面没有看我一眼。我理解他可能怕惹麻烦，更何况他现在是甘丹寺的委员，而我是重罪在身的阶下囚，是抵抗过中共的叛乱分子，再说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而这种白鼻子小人的交情却完全建立在利益至之上而已。

回到扎基监狱不久，凡是以前在寺院中担任过如堪布和僧官者，均被单独隔离关押，关押时一一搜身后，腰带鞋带等一律没收，每天只准上两次厕所，其余时间不准出隔离室一步。一切被严格限制在隔离关押状态。这样，一直到一九六一年时，还不仅没有任何减缓放鬆迹象，甚至局势更为紧张恶化，全西藏开始掀起了对“三大领主”及其代理人清算历史旧账的政治运动，

已经关押的也要带到当地群众大会上接受批斗。那时展开这种运动首先干部到接受批斗者的家乡，向群众传达介绍所谓由政府机关对接受批斗者的罪过和调查资料。其实所谓政府机关的调查资料大多数都是无中生有，凭空捏造，或夸大其词，目的是为了激起民愤，借群众之手剷除他们，并让人觉得这些人可恨恶劣，让带头批斗的积极分子感觉有理有据，批斗起来气势汹汹，一副若有其事的样子。积极分子和民众在这种有意识的、偏激的诱导下，极容易受到感染和蛊惑，以为自己贫穷落后的原因一概由这些人一手造成，以至於批斗过程中完全没有理智、没有法律、没有限制，批斗致死致残者比比皆是，其中不少民族菁英全毁在了自己人的手里。

六一年夏季的某一天，劳教科吴科长到我们囚室问：“谁叫宇鲁达瓦次仁？”我马上立正回答：报告，我是宇鲁达瓦次仁。“你在农牧区残留许多待算的历史黑账，群众中愤恨和揭发你的人很多，一再要求把你交给他们进行批斗，要跟你清算历史黑账。虽然，我们做了劝解，但群众根本不同意，我们也没有办法。所以，先转告你一声，让你事先有心理准备，可能明后天会来人接你”。说完吴科长头也不回地走了。听到这番话确实有点紧张，可细细一想平生我没有作过什么伤天

害理，让民众憎恨的事情。晚上又仔细回忆以前去过的所有地方和自己的所作所为，无论怎么想也实在想不起得罪过什么人，更没有严重到像吴科长说的那种程度。既然没有，他们为什么要如此说呢？我似乎明白了，不是群众恨我，而是中共政府当权者想玩弄藏人，利用群众来整我们，借刀杀人。尤其是他们对一些有影响力的藏人是绝不会放过的。

两天后，果然叫我到监管办公室来：“要带你去仁庆岭村。”仁庆岭村的工作组干部索南诺布、从前好友索朗觉旦、支部书记朗杰三人拿著一根麻绳正在大门口等著我。刚一出监狱大门他们就扑过来要捆绑我，被交送我的管教鹏多阻止道：“我们藏族有句谚语称：‘对到手的敌人要善待如子’我看就不用绑他了。另外，我还要强调，你们带他到仁庆岭批斗时若造成伤残等问题，到时候就要按法律会追究你们的责任。因此，你们三位要负好责任。”管教的交代稍微抚平了我一颗忐忑不安的心，不过我依然担心仁庆岭是个居民成分复杂的村子，虽然自信原居民不会对我怎么样，就怕外来移居的人会下黑手。仁庆岭到拉萨有一段路程，那边的人来一趟拉萨不容易。所以，离开扎基监狱的第一天晚上，

他们把我关在拉萨昌仁监狱<sup>21</sup>后，他们便到市中心办各自的事儿去了。

当时，昌仁监狱的各囚室像羊圈，犯人关的满满的，送牢饭的是以前被罢免的乃琼寺住持布巴曲苏的儿子孜仲布巴，由於他极会奉迎中共干部，所以才得到这个差事，其实他自己也是个被关押的犯人。他为了表现，往往擅自扣减犯人的饭食，一天两顿只给半小碗粗糙的糌粑和一缸子缺盐的清茶，以示节约。哲蚌寺的拉日仁波切也关在此处，他一天只吃一顿，剩余的轮流分给其他人吃。一同关押的回族犯人说：“哲蚌寺的这位喇嘛才是名符其实的佛教徒。”他既尊敬又称赞不已。

第二天一大早我从昌仁监狱被他们带出来，我们四人到拉萨葛曲大桥时搭上了一辆顺路的卡车，索朗觉旦与支部书记在左右两边看守我，我空著肚子一路颠颠簸簸地来到了麦卓杰桑。我们在此处下车后，走进路边的一间部队饭馆，他们勒令我蹲在墙边，稍后给了我一个馒头和一碗开水，而他们几人叫了好多馒头与饭菜，狼吞虎咽，大吃起来。由於没有吃早饭，加上一路颠簸，仅仅一个馒头实在没能顶住饿慌的肚子，尤其嗅到

21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中共在拉萨市原贵族昌仁府邸设置的临时监狱。

饭菜的诱人香味，我像一条乞求剩饭的饿狗，忍不住把祈求的双眼投向了正在大吃大喝的他们，但他们连看都没有看我一眼。离开饭馆徒步赶路途中，我突然假装生病“哎哟！哎哟！……”地叫喊起来，说我犯了胃病疼痛难忍。我想，装病可能会减轻批斗会上的毒打，还有可能吃到一顿饱饭。

来到仁庆岭后，我被关在仁庆岭寺交给当地民兵看守。我当年的施主噶康阿妈德吉听到我被带到仁庆岭的消息后，请求村干部索南诺布允许她去见我，索朗诺布答应：“可以去见”。阿妈德吉提著一壶茶前来看我。我眼前呈现的噶康阿妈德吉与从前简直判若两人，她一见我，双眼扑簌簌淌下泪水，久久无法讲出一句话。从前美丽而精明的女主人，此时裹著一身破烂的藏裙，头髮蓬乱，脸色灰暗，活像一个乞丐婆，从外表便可以判断她也遭受了不少的苦，甚至满嘴的牙齿也全掉落，这很有可能是在批斗过程中被打掉了。尽管她自己已经落到了如此地步，阶级斗争如此紧张的环境里，她不顾自己再度遭殃的风险，便来看望我，并且我在仁庆岭的三天期间，她想方设法对我送来了酥油茶、牛奶、糌粑、酥油饼子等食物。我押回监狱后，听说她由于受我的牵连又遭到了无法想象的批斗和殴打。

由於仁庆寺住持是布达拉宫秘书处和经书管理室主任，批斗的对象本来是他，可是，我却成了他的替罪羊。对我批斗的那天晚上，情势与自己事先想想得差不多，除了积极分子和少数群众挥拳怒吼地摆出一付势不两立的架势外，群众基本山没有那么配合他们，更没有像甘丹寺的僧众那样蜂拥而上拳打脚踢。尤其是仁庆岭村河对面的厦村群众，虽然工作组对他们发出了要参加批斗会的通知，可是他们以河水深，夜间难渡为由，来参加批斗会的只有几个人。批斗会上积极分子们指著我的鼻子气呼呼地轮流怒斥道：“你这个宇鲁反动分子，反抗政府、背叛我们各族人民，发动武装叛乱与解放军作对，其结果落入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法网，你现在的下场是咎由自取、是自找死路。”“因为反动分子宇鲁与苏卢才白群培，嘎康等反动分子狼狈为奸，发动武装叛乱的原因，祸及我们的故乡和寺院被抹上了反动的黑名，假如你们不折腾，现在这个寺院可以享受宗教信仰自由的待遇了。”“宇鲁！你获得格西学位后，我们原本希望你留在我们寺主持日常法事，可你跑到所谓上密院的绕慕齐那些贪得无厌的反动分子狗窝里，并且与他们同流合污，还实施了反政府的武装叛乱，你对自己的行为难道不感到羞耻吗？”“你们这些所谓的喇嘛既要

土地，也要财产，还要女人，算什么东西。”

连续三个晚上，他们如此轮流痛骂我反动透顶；罪大恶极；猪狗不如等等。可是，所谓清算历史黑账的具体问题，只不过是绕慕齐的那次抵抗活动，反覆纠缠，除了这个问题之外，再也找不到什么。那次，批斗最积极的还是一个叫古央拉姆的老太太、乡长朗杰、扎西平措这三个人。

第四天，我又送回了扎基监狱，负责押送我的只派了个叫斯热的村民，他的老婆和部分好心的村民暗中送了我不少食品，有糌粑、酥油、奶渣，还有袜子，甚至鼻烟都有，合在一起装满了两大袋子。这些东西拿回监狱后大伙一起分享了几天，狱友们还跟我开玩笑说：“如果仁庆岭的群众经常批斗你，我们的生活就会得到改善。”虽然，仁庆岭批斗就这么告一段落了，这期间尽管连续批斗了三个晚上，但不仅没有出现殴打现象，甚至善良的人们还悄悄送来不少食物。接下来担心的问题是，会不会又被带到绕慕齐批斗，听说绕慕齐的嘉热堪琼、阿旺次贝，以及密院总管根顿才尼已经被带到绕慕齐批斗过了。他们在批斗会上遭到了以上密院的江智齐莫、芒康阿旺曲旦为首的部分僧人积极分子的严

厉批斗，甚至毒打，结果阿旺次贝一气之下当场揭发了芒康阿旺曲旦的罪行，揭发芒康阿旺曲旦当年也拿枪抗击过解放军。结果引起在场的中共干部的警觉，不久芒康阿旺曲旦也被关进监狱，从此批斗场上消失了那个混蛋的身影。

押送我去仁庆岭开批斗会的驻村干部索南诺布，八十年代被委任为西藏大学教师兼班主任。当时我也是西藏大学的聘任教师，有一天他突然问我：“你不认识我吗？我以前在仁庆岭村蹲过点，六一年还到扎基监狱接过你。当时我们反覆给群众做思想工作。所以，批斗你的过程中，从头到尾没有出现类似殴打致伤，违反国家法律政策的现象。”听他的口气，我应该要感谢他的救命之恩似的。其实我早就认出他了，而且眼前还浮现那次在饭馆里他们对待我如同一条狗般屈辱的情景。我对他说，我确实应该要好好谢谢你，而且一见到你我就想起了此生最难忘的一天，犹如一条看门狗似地蹲在角落，忍受难以抑制的饥饿，眼巴巴地瞅著你们在一边狼吞虎咽。事实上，我也没有做过对不起仁庆岭群众的事，所以他们没有理由跟我过不去，甚至需要殴打洩忿。我的回答令他感到意外和尴尬，当即满脸通红地从其他教师旁观匆匆走开了。

## 九、增产节约运动又开始； 宇鲁思想污染被肃清

清晨的寒风扑面袭来，让人感觉直刺入骨。一九六二年秋季，劳改队掀起了“增产节约”运动。其含义是积极劳动多生产，从个人开始节约开销，为国家和革命事业做出贡献。这一运动对犯人而言是个天大的不幸，从此对犯人只供早晚两顿饭，午饭被取消，而且每一顿只给一碗无盐的冰冷粥，有时连这顿冷粥也吃不到，只有一瓶盖的豌豆。渐渐犯人们都被饥饿折磨的有气无力，面黄肌瘦各个活像重症病人一般，但千万不能叫“饿”，否则会成为抵抗运动罪大恶极的专政对象。不少年迈犯人及平时体弱多病的囚犯接二连三地去世了。求生是人的本能，世上恐怕没有不珍惜自己生命的人，每当一个个朝夕相处的同胞，一一永别，尸首被抬出囚室时，活著的犯人难免对死亡产生恐惧，深怕死亡随时会降临到自己头上。因此为了求生，寻找著一切可能的机会，树叶花草、腐烂的菜叶、菜根；为了应付饥饿，统统都吃，甚至不能吃的都成了救命的东西。一天我与笨须旺青格多、希迪洛桑西绕三人採食金花的叶子

而中毒了，我们几乎同时心悸、麻木、胃胀、腹痛、四肢抽搐，痛苦地挣扎了一天一夜，后来侥幸从死亡边缘慢慢挺过来了。

如此非人非鬼、半生不死地熬过一整年后，一九六三年初扎基监狱来了几个汉人医生，并对犯人中的部分高层和身分较特殊的人进行了身体检查，我是其中之一。原本还以为检查身体后，就要把我们派到某个更艰苦的工地去参加劳动，但几天后突然发布通知，中央政府指示，对作过检查的犯人将给予特殊照顾，决定给每人每月两斤酥油和三斤肉。这个所谓的照顾第二天起果真兑现了，监狱第一次提供犯人酥油茶和肉菜。无论汉人的意图是什么，总之，对我们这些已经被饥饿折磨得只剩半条命的犯人而言，当务之急是需要尽快恢复体力，这确实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对一个被打入那种牢狱里的犯人遭受恶鬼折磨，这等於活生生地经历了地狱。那时候，什么人权自由、人格尊严统统都是多余的话，尤其是共产党的监狱里整人、残害、虐待犯人既不需理由，也没有底线，仅凭干部不顺眼或捕风抓影，就可以任意对任何犯人指控罪名，然后关进禁闭室，惨绝人环地虐待毒打。不用任何

证据，单凭干部的感觉臆测，加上毒打暴揍、屈打成招便可罗列许多新罪名，这是他们的工作风格和鲜明特色。这是一群没有修养，甚至连人性为何物都根本不知道的人，为了所谓的专政需要，只知道对上级奉承。他们为所欲为的恶劣后果当然不必承担任何责任，他们没有这种习惯，所谓的法律政策只是讲给别人听的。

一九六三年年底的某一天，笨须旺青格多和我突然被关到禁闭室，我们的隔壁关著大吉岭印度人的侍女诺珍和袁德林阿妈贡桑。我们这几个人在禁闭室里关了一年多，每天早上我们要帮忙倒她俩的马桶。几个中共高干白天经常来监狱审讯我，审问主题依然是一九五九年抵抗共军的那些事，我所能交待的，翻来覆去还是以前说过的那些话，我确实没有什么可交待的新问题。审讯过程中他们除了对我恐吓刁难之外，没有使用暴虐和酷刑，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实属特例。审讯我的除了一个藏族翻译人员外，其他都是汉人，开审的头一句常常是，“如果不彻底交待所有罪行，你只有一个出路，那就是枪毙。”而我的回答是，当初在甘丹寺审讯时所有的问题都已经彻底作了交待，除此之外没有任何隐瞒的事。有一次，其中一个脾气急躁的汉人干部两眼露出凶光，对旁边的人说：“这个顽固狡猾的家伙真的枪毙算

了。”经过整整一年多断断续续的审讯后，他们并没有查到新的罪行，后来不了了之，也从禁闭室放出来了。

此时，扎基监狱的犯人数量仍然与日俱增，因为，中共在西藏三区全面清查过程中，被抓的大批藏人不少关进了扎基监狱，从中有判过刑的，有的没有经过司法程序就直接关进札基监狱。另外，除了被饿死、病死、整死、自杀、或处决之外，只抓不放也是犯人数量急剧增加的原因。一九六四年，监狱让犯人採石打砖，扩建了监狱内外防护墙和牢房。从一九六五年开始“三大教育”开始了，并把所有犯人编排为五个劳改支队，我被编入第五队。所谓“三大教育”主要对犯人宣传一些已经整理过的中国与国际方面的消息，以及西藏的形势，后来慢慢转变成西藏当时状况与个人罪行相结合，深刻认识思想根源，彻底坦白犯罪动机和细节问题。每个犯人都有各自的小组，每组有一名积极分子担任组长，谁也跑不掉，必须一个一个地轮番说出自己的思想、见识和观点态度，以及犯罪根源等等。这个运动看似平淡，其实是中共专制机关充满恶毒用心的一种诡计。因为，通过这种长期的自觉坦白进而相互揭发，对质，甚至诬陷报复，最终导致人人自危，相互猜忌，反目成仇，令清一色由藏族组成的庞大集中营的内部凝聚

力从根本上瓦解和自我摧毁，每个犯人二十四小时的思想行为受到其他犯人的严密监视。由於这一运动的特殊性，所以，一直延续到整个文化大革命结束为止。

那年孜仲贝布益西图登和琼热巴仁增朗杰等犯人中的先进积极分子被带到位於拉萨东面的红旗乡等地，说是现场实地学习先进经验，再把这些先进思想和工作经验传授给监狱里的犯人。红旗乡以政治思想先进，以及文化革命中具有高昂革命斗志成为榜样，曾一度在西藏中部名噪一时。他们从实地学习回来后，向每个支队和班组轮流讲解了红旗乡等地的先进思想和工作经验，之后监狱干部勒令每一个犯人结合自己的思想认知说出感想，尤其要认真领会红旗乡乡长的讲话精神。那位乡长对他们讲的大概意思是，旧西藏除领主的子孙后代和寺院的上层特权人物以外，其他藏人根本没有学习掌握文化知识的权利，各大寺院中出身贫困的一般僧人基本上都没有任何文化，甚至连藏文字母也不会写、不会念等等。

在众人面前强制表达自己的观点立场，这对每个犯人而言是个巨大的精神折磨，表达之前对每句话必须要深思熟虑，要有根据，同时绝对不能违背中共的政治

立场。对一个具有自我分辨意识的人来讲必定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是彻底放弃自己的立场，违背自己的思想观点去迎合汉人的政策观点；另外一个办法是在不明显违背中共政策的前提下，如实说出客观实情，这当然比前者风险大得多。当时我选择后者说出了自己的看法。根据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会，寺院中确实有一些不识字的僧人，不过说实话，这种结果并不是寺院的特权人物有意造成的，而是自己无心学习不愿下功夫的结果。由於纪律师严厉要求习文念经不准贪懒散惰，为此有些僧人抱怨没法待在寺院，甚至回乡还俗。如果自己愿意学习，肯下功夫刻苦勤奋，在寺院里一般没有学不到文化的道理。”我刚说完立刻遭到孜仲贝布为首的积极分子们的反击：“你这个反动分子，不仅不接受西藏人民表达的思想，还公然提出反对意见，这就是你的思想本质反动到什么程度的明显反应，我们要把这个反动本质彻底挖出来让你看看。”

接下来的十天里，他们把我轮流带到五个队，整个扎基监狱掀起了一场批判宇鲁达瓦次仁反动思想的运动。最终我在众人的唾骂声中被迫违心承认自己的言论是错误的，并表明了今后会认真改造反动思想的决心。

一九六五年底，《西藏日报》突然刊登了由曲果杰村民札西达瓦发表的“关于为什么达赖喇嘛是全西藏的罪恶根源”的一篇文章。该报还称一九六七至六八年维修曲果杰寺院过程中，为了奠基仪式的需要，四名八至九岁的儿童活生生被埋在房屋的四个角落底层等等。监狱干部次旺等人命令犯人每晚分组讨论这篇文章内容，尤其是全西藏的罪恶根源就是达赖喇嘛这一主题，每个犯人要认真领会，积极回答。班组讨论依然是孜仲贝布开头，随后囊本札西多结和琼热巴仁增朗杰等积极分子附和，他们纷纷表示，之所以说达赖喇嘛是全西藏的罪恶根源，其原因是他犯下了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滔天大罪，等等。他们不仅毫无顾忌地辱骂达赖喇嘛，还信口开河地指责他犯下滔天罪行。如此厚颜无耻的积极表现，令我等深感意外，惊奇不已。一名叫鲁苏罗丹堆巴的人讲：“以满清皇帝与达赖喇嘛之间的关系来分析，全西藏的罪恶根源应该是满清王朝而不是达赖喇嘛。”他这番话的意图是要转移矛头。随后我和强巴次忠、贝玛洛追等人也随机把矛头指向满清皇帝，大同小异地做了发言。还有一名叫查多强巴旦达的人说：“如果说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那么一切罪恶的根源应该是中国的满清王朝。如果说西藏是个独立的国

家，那么其罪恶根源肯定应该是达赖喇嘛。”且不论他说得对不对，总之，我很佩服他敏锐的思维能力，因为对他这番话，干部和积极分子无法马上揪住辫子，不敢说这是反动观点，而且这又不违背我们内心坚持的一贯原则。

在整个监狱五个队中，轰轰烈烈地展开关于达赖喇嘛是全西藏的罪恶根源为主题的批判声讨之后，逐渐形成了三种不同观点。第一种认为全西藏的罪恶根源完全是达赖喇嘛；第二种认为全西藏的罪恶根源在于中国的满清王朝；第三种认为全西藏的罪恶根源既是代表旧西藏甘丹颇章政权的达赖喇嘛，还有代表统治阶级的三大领主，以及一九五九年参加反共武装叛乱的反动分子。

监狱让犯人积极讨论这种政治议题，目的并不是为了政治决策的需要，而是为了深入识别每一名犯人的政治立场和思想观点。总结会上干部次旺说：“对此次主题的认识讨论，总的来讲效果不错，每个人直言不讳地说出了自己的看法，你们的讨论观点我们不会弃置脑后，而会存放在个人档案中。”

## 十、反共同盟之密泄露当局； 七位同胞之躯埋葬沙滩

“评比”是中共监狱里经常惯用的伎俩，是通过犯人对自己罪行的认识和改造表现，与其他犯人评比政治觉悟和改造态度的一种测验。通过评比过程中的自我检查，对他人的检举揭发和划界线批判，会确定这一阶段一个犯人的思想定位。这对积极争取中共青睐的人来讲是表现自己的最好时机，也是监狱专门为犯人便於向中共表现忠诚而专门提供的一个舞台。评比后会宣布评先结果，我一直名列在落后分子之列。

正在展开评比活动期间，干部次旺有一次来我们小组找我，他说：“达瓦次仁你是这次搞评比的主要对象，因为你的思想极其肮脏齷齪不堪。我们政府至今很希望你能改造成为一个新人，可你总是不识好歹。你平时跟三队的哪些人有暗中来往，这些自己心里很清楚吧？今天必须要老实坦白。”好像他已经掌握了我的某个把柄似地下了必须坦白的命令。听到与三队来往的话题，顿时内心很不安，但依然镇定地回答他：我与三

队来往的事情早就交代清楚了，现在没有任何问题可交代。“撒谎！你还敢说没有任何问题。”我刚一说完，干部次旺便气呼呼地拍案而起指着我的鼻子说：“看来不见棺材不掉泪，你这种人是不会轻易认输的。想清楚，选择继续顽抗到底，还是选择主动坦白交待？这个队除了你，其他人都已经提高觉悟，已提高到不仅能够彻底交待自己的罪行，还能主动检举揭发他人的恶劣行为，甚至你以前的那些同伙也已经觉醒了。”他用阴冷的口气威胁痛骂我一顿后，本以为他会当场揭穿我什么，但是说完后便离开了。

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反覆琢磨，他们到底知道了些什么？我与三队的人之间有何秘密？下一步会逼问什么事？但二十多天又过去了，没人提问这件事，不安的心才慢慢平静下来。可是，好景不长某天晚上，监狱教育科的吴科长带着一名翻译员，把我叫到他办公室提问了这件事。吴说：“今天，你一定要把跟三队那伙人的关系给我解释清楚，你们之间绝不是一般的关系，我还希望你千万不要轻易相信和袒护别人。”我对他说，三队的阿妈贡桑在一九六三至六四年期间，她曾经对我给过一些衣服、食物，还有肥皂之类的东西，可这事我

已早向干部交代过了。此外，目前我与三队的人之间没有隐瞒任何事。“你再好好想一想，我不会无缘无故在大半夜里提审你。如果你继续顽固，拖延时日，只有把你带到三队去对质，或在全队大会上公开审查，两条路你自己考虑，总之，不把问题搞清楚你是跑不掉的。”他因不满我的回答而恼怒，厉声呵斥一番后，当晚的审问就此结束了。

根据干部再次审问我的情况来看，这事不寻常，他们好像已经摸到了我的辫子。但再一想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可能是敲山震虎，以此想挖掘新的情况和问题。奇怪的是，此后的一个多月里又没人再提这件事了，我也认为自己的推测是正确的呢。此事几乎给淡忘了的某一天，突然召集全队大会，管教次旺神气十足地站在主席台上，从四个兜的军服<sup>22</sup>上衣右口袋取出本子，环视众囚徒一眼后翻开始讲：“今天的大会要审查达瓦次仁。”我的心倏地一提，联想到姓吴的汉人提过的警告，可是我还是不明白他们究竟掌握了我与三队的人之间的什么事？或者知道了我的什么秘密？接着开始讲话了：“我们人民政府对这个达瓦次仁作过长期耐心的说

22 当时中共因取消军衔制，65式军服的军衔标志，是军服上衣口袋，军官上衣有四个兜，士兵只有两个兜。

服教育，给过很长时间的自我思想清理的机会，可他只承认第三队的贡桑对他给过一些生活用品之外，一直顽固地声称没有别的任何问题。”他再次环视会场后停顿了一阵，然后继续说：“事实上问题绝不仅仅是他所说的那么简单，今天我们只能把所有问题摆在他面前，让他做出解释，如果还不低头认罪，我们还是会采取别的办法。”全会场的犯人目光刷地一下全扫到我的脸上，各个心里都在猜测“这家伙究竟又闯了什么祸？”稍后，干部次旺再次用高昂的腔调说：“下面要宣读阿妈贡桑交代的内容。”当时我心想，这可能是他们三番五次要我交代的癥结。

阿妈贡桑所交待的内容大致如下：“一九六三年开始我与达瓦次仁有了秘密接触。某一天，关在扎基监狱一名原籍为印度（拉达克）的犯人图旦杰布的人亲口告诉我，他明天就要释放了，要返回老家拉达克。当时，我（阿妈贡桑）告诉他，回到拉达克后，无论如何得想办法到印度去见嘉瓦仁波切（达赖喇嘛），并转达我等为了挽救雪域佛教，请求他尽快返回西藏。目前汉人在藏区的所作所为你已经亲身体验了，这些过程请你一定要向嘉瓦仁波切详细禀报。”

“另外，达瓦次仁是十三世达赖喇嘛亲自确认的仁波切，我很尊敬他，而且彼此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我们之间几乎无所不谈，从中我对他说，您是十三世尊者亲自认定的仁波切，所以，您要为西藏将来的政教事业多着想。尽管我是个女人，但我有坚定的决心为西藏的政教事业，尤其是西藏的经济发展方面能尽自己的微薄之力。比如；我在经商方面已经积累了一点经验，将来西藏的发展在商业经济领域，相信自己可以发挥一点作用。而您也不要把精力全部投入到佛经上，多积累各方面的经验，将来会有很多用处。达瓦次仁对我说，目前身陷囚笼，壮志难酬，一旦获得自由，便有决心为拯救西藏政教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此外，类似我对达瓦次仁所谈的内容，也写信通过达瓦次仁转交给了藏军司令堪琼·洛追格桑。”

干部次旺如法官宣读判决书似地念完了阿妈贡桑交代的内容后，他深吸一口气接著大声讲到：“大家说，达瓦次仁这个问题到底严重不严重？”同时转向我问到：“现在，你自己的所作所为该想起来了吧？”我被突如其来的质问和全场犯人质疑的目光怯懦了，仓皇之际回答：“是，是这样。”次旺说：“你

既然承认‘是这样’，那么，我们可以再给你一次机会，你要把握最后这一机会，写一份详细的交待材料给我们，我们政府对你真可谓是仁至义尽了。”

我同阿妈贡桑之间的谈话内容怎么会洩漏了呢？我一时没有想通，也不敢相信。当时阿妈贡桑亲口对我说：“我们谈论的这些政治话题千万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即使因监狱干部和积极分子起疑而逼供诱供，也绝不能吐出一个字。”而且她同我以母子关系，非常庄重地立下了严守秘密的盟誓。

可是，摆在眼前的事实不得不相信这一切。听到干部次旺宣读的交代内容后，恍然产生了被人出卖的感觉。一股惶恐愤恨之感涌上心头，也担忧下一步他们会如何处置自己。可恨的阿妈贡桑明明说要严守机密，并立过母子誓约，却偏偏告密，还牵连我们。懊悔不该如此轻率地相信别人而惹祸上身。

后来，细细一想，这其中必有缘故，阿妈贡桑绝不是轻易被屈服的人，她绝不会这样出卖我们和自己的灵魂。这背后肯定有别的隐情，想来想去问题很有可能出现在其他知情者身上，肯定是这样的，一定是其他人

出卖了我们，阿妈贡桑极有可能是被人出卖的受害人。如此一想反而对她的怨恨渐渐变成了同情和担心，不知道她为此事遭受了多少罪？在这座监狱里，她不仅是女犯中意志坚定，敢於抗争的一位女中豪杰，而且，她是一九五九年三月十日，在拉萨举行大规模西藏自由抗暴运动的领导人之一。

“这是对你的最后一次机会了！”管教干部次旺严正厉词的警告回荡在耳边，我再犹豫推拖已经无济於事，再说事情都已经捅出来了，这样，交待材料也没有什么不好写。如此考虑一遍后，交待材料按阿妈贡桑交待过的内容原原本本地重写了一遍。干部次旺认真地看完我的交代材料后说：“再好好回忆回忆，还想到什么及时向政府汇报，这样，对你的处罚会稍微轻一点。”出乎意料的是，这件事在全队犯人大会上只让我们做过一次认罪检讨之外，没有再作出其他处罚。

几个月后的某一天，我在打饭路上碰见了阿妈贡桑，看到她的身体状况与往常一样，似乎没有受过折磨拷打的样子，便对她产生了一股怨恨，我扳起脸对她瞪了几眼气愤地走开了。其实我并不是从心底里仇视她，多年来因与她结下的深厚友谊，共同经受过多的恐慌与

磨难，再加犹如母子般的感情，以及平日对她付出的担心和焦虑，由此可能由爱产生了恨。我的情绪被狱友强巴次忠发现了，他对我讲：“你不应该这样对待阿妈贡桑，你知道她的遭遇吗？阿妈贡桑是个什么样的人，难道这些年我们都不知道吗？如果不是出乎意外，或遇到了什么意想不到的难题，她肯定不会被屈服的。”我十分赞同他的看法，并当场表示，以后我一定会原谅她。

不久，阿妈贡桑是否告密的真相慢慢在犯人中传开了，也证实了自己之前的推测和强巴次忠的看法。自从她关进扎基监狱后，中共干部和他们的喽啰积极分子们一直怀疑阿妈贡桑有重大的政治问题，尤其是以她的悔罪认罪态度更加重了他们的怀疑。尽管他们使用评比、审问、禁闭等手段多次审查，但始终没有从她口中得到有用的东西，也没有找到有关她的什么罪证。因此，监狱干部在她身边安插了一个眼线，此人是三队女犯——来自乃东德吉康萨的一名雀斑脸妇女。因为，她是特意安排的眼线，所以有机会长期跟随阿妈贡桑同吃同住同劳动，渐渐这个女人主动向阿妈贡桑议论一些政治话题，假装仇恨汉人和监狱生活，信誓旦旦地表示甘愿为西藏政教事业牺牲生命。阿妈贡桑虽然是个精明的女人，可她性格刚烈又容易激动，往往激情溢於言表，

久而久之被这个女人的表演所蒙蔽，对她产生了信任感。监狱干部从她个性的软肋下手，获取了他们极想知道的大量东西，包括监狱内部与她有关犯人的活动和思想动态。阿妈贡桑完全上了这个貌似憨厚，相貌平平的雀斑脸女人的当，还跟她立下过结盟守密的誓约。监狱掌握了她的许多秘密后，在三队大会上宣读部分罪状，让犯人批斗她，这期间管教还假惺惺地表扬她说认罪态度有改进。那是一九六六至六七年间发生的事。

那期间，监狱当局对我的调查也没有停止过，中共一些高级干部和监管轮流审问我和嘉热堪琼阿旺次贝，审题依然是有关一九五九年参加武装抵抗运动的事。他们还说此类性质而戴罪在身之人的判决结果近期就要公布，如果还有什么遗忘和遗漏的需要补充，可以书面呈报。另外，可以通过检举揭发他人的犯罪行为，为自己立功赎罪争取宽大处理，无论检举监狱内外任何人的犯罪行为，这些都可以视为立功表现。他们还说监狱里外的不少人多次检举过我们，所以唯一的出路，是把自己的犯罪情节毫不隐瞒地交待清楚，争取早日获得释放，这样才能为自己赢得一个光明的前途。

几个月过去了，当最后一次审问我时，狱警干部

问：“最后还有什么补充的？”我说第一次在甘丹关押时已经把自己的全部问题彻底作了交待，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问题，至於他人的问题实在是一无所知。随后，他们让我核对笔录后签字。从此年复一年的审讯看来要结束了，他们对我将做出最终的判决。

几天后，几名法官在监狱审讯室单独宣读了我的判决书，判决书称：“公元一九五九年达瓦次仁参与武装叛乱，抵抗我人民解放军，并在焚烧我军两座粮食仓库时担任骨干分子。被捕入狱后仍然幻想复辟旧西藏社会，抗拒教育改造。以上罪行，证据确凿，特判达瓦次仁无期徒刑。”

草棺人命的恐怖岁月里，像我这等人判处无期徒刑，那简直可以说是太幸运了。当下不知道他们在我身上打的是什么算盘。当时制造的无数惨案之中，令我永远无法从眼前抹掉的一幕是：文革中期一九七零年的某一天，我因病到女犯三队旁边的医疗所就医时，只见三队各处布满了许多荷枪实弹的士兵，空气显得异常紧张。稍后阿妈贡桑、桑那曲珍、达确布赤三人被押上一辆卡车带走了。我焦急地打听原因，只听犯人讲她们三个人被打成了不知悔改的极恶顽固之徒。第二天，监狱

的各要点部署大批士兵，周围架起了机枪，步枪上了刺刀的士兵牢牢控制着整座监狱，而后让全体犯人收工召开了宣判大会。阿妈贡桑、桑那曲珍、达确布赤，以及从第五队抓来的四名藏族男性犯人，双手被麻绳紧紧绑在背后，为防止她（他）们喊口号，喉颈也被紧紧地勒着，每人被两名士兵押解到了会场。一名法官在大会上用阴冷的语调宣读了判词：“贡桑等人悖逆事实顽固不化，实施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罪行，图谋复辟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妄想把西藏人民第二次推向苦海。他们这种背叛国家和革命事业的行为，对国家和人民犯下了无法弥补的滔天罪行。尤其是主犯贡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疯狂攻击污蔑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政策，气焰十分嚣张。桑那曲珍和达确布赤等人充当忠实走狗，犯下恶劣的反革命罪行。特将对这七名罪犯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法官刚宣判完，七人被士兵拖到监狱北边的沙滩上就地杀害了。

这令人残酷绝望的一幕，刻骨铭心地烙印在我的心坎上，我既敬佩阿妈贡桑等人的坚强意志，又深深地悔恨自己以前错怪阿妈贡桑。尤其是她们视死如归面对共军枪口的那种悲壮场面，激励我在恶劣监狱环境中勇敢面对一切艰难的意志和信心。我多么希望祭拜她们的

在天亡灵，可身为囚徒哪有这种条件，一般人连想都不敢想。我唯一能做得是早晚默默祈祷，同时深深忏悔自己曾经对如此坚贞不屈的女杰产生误解。今天，我在这里记录的只是我最熟悉亲近的人曾惨遭屠杀的个别例子，其实难以计数的同胞，当时因一些莫须有的政治罪名，而遭到了同样的命运。

中共当局为了杀鸡儆猴震慑众犯，把那些有名气和影响力的人物公开处决之外，一般犯人都会秘密处决，或秘密消失。某天夜里我突然作了个恶梦，梦见一只可怕的妖禽在监狱屋顶上活活吞噬一只小鸟。二十天之后甘丹寺的色桑仁波切又被公开杀害了，他被枪杀之前右腿已经残废了。因为他对管教，尤其是积极分子的指责批判往往据理力争，他看不惯他们如此肆意妄为。因此，他们在虐待他的过程中整残他的右腿。枪杀那天因他不便活动正躺在床上时，两名士兵把他从床上拽下来，连囚服都没有来得及穿，使用麻绳捆绑勒住脖子，直接拖到了宣判大会上。法官宣布他的罪状称：“罪犯图旦贡布（色桑仁波切）对我们处决的罪犯贡桑等人极度不满，声称罪犯贡桑是西藏人民的优秀女儿，痛恨自己没有能力营救她们等。事实上罪犯贡桑是个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图旦贡布如此明目张胆地为她们说话，

其立场观点明显暴露出了罪恶的反动本质，他的下场自然跟她们一样会受到无产积极专政的严惩。罪犯图旦贡布顽固不化抗拒改造等，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色桑仁波切也被拖到监狱大墙外的荒滩上杀害了。

如此，人的生命视如草芥的那种残酷环境里，有时真的奇思幻想地希望出现某种神话般的奇迹。色桑仁波切原本是个修练密法颇有功底的密乘大师，并且曾得过密法大师顿典仁波切的真传。西藏历史上甚至二十世纪初期的真实记载里，密乘派喇嘛身陷绝境时，曾有过显示神通的真实事例。由此当时真的希望他能露一手神变的本领让人们开开眼界，即使不能制敌，起码也能在扎基监狱可以产生轰动的效果。遗憾的是从头到尾，直至他的尸体被丢进坑中被土掩盖，根本没有显现任何异常现象。我们狱友间纷纷议论：“现在密宗大师之法力衰没了，世间威猛护法之四大功业也只成为名词而已”

。

## 十一、审评途中各种灾祸接二连三； 积极分子陷入欺诈泥潭之中

人类在进化，社会在演变，在此过程中，人们挖空心思设计各种诡计和陷阱，既欲求达到铲除异己之目的，又道貌岸然地极力掩盖自己丑恶的动机，极力标榜自己是替天行道的替身，进而所谓胜敌於无形的阴险权术发挥到了极点。不过当触及信仰或意识形态领域时，彼此双方往往产生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这是必然的结局。

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通过触及每个人灵魂的改造，欲图实现发动者自己标榜的革命目的，要清理铲除一切信仰领域的异己分子，并选择采取的是赤裸裸的暴力手段。於是遍及之处令鬼神哭泣的暴力清洗，令人人几乎每时每刻都生活在恐惧与死亡的气氛中。尤其是彻底丧失了人身自由的一个囚徒而言，无休止的揭发、评判、批斗、虐待、羞辱、毒打，甚至加刑或枪决，是时刻需要准备和面对的问题。为了求生，为了争取悲惨环境中的相对优越地位，似乎人人不得不随波逐流去取悦主

宰者的欢喜。但无论如何，人毕竟是个有信仰和尊严的灵性动物，於是矛盾、冲突抵触、摩擦等等无法彻底根除的情况下，永远可以划分所谓的先进与落后、革命与反动、积极与顽固等的区别。

一直划在落后分子行列中的我等，平常最厌烦的是那些处处需要提防的积极分子。他们几乎无所不在，长年累月如影随形。所以，实际生活中他们比劳教干部更危险、更可恶，可以说他们是变相的专政工具，是时刻监视着我们的举动与声音。中共专政机关通过这些眼睛和耳朵，破解过监狱里外许多藏人的秘密，尤其是文革中造成众多藏人被关押、处决、折磨、虐待、致残等惨案，可以说与这些眼睛与耳朵有重大关系。给别人制造各种横祸后，自己又得到了什么好处呢？其实也很可怜，充其量他们只是管教员任意操控的工具，唯有在犯人当中，才可以吆五喝六地摆摆谱，耍耍威风。一旦成了他们的耳目，就只能身不由己地继续为恶，根本没有自我调节的余地，更谈不上受良知道德上的顾忌或谴责。

通过身心的改造要令藏人脱胎换骨，改造成为另外一种人，是中共统治西藏过程中带有意识性的一个政

策，并且在各领域里，贯彻始终地表现这种带有鲜明倾向性的政策。例如，对藏人的任用或罢免，打击或利用，褒奖或惩罚，都与是否符合这一倾向性要求有极大的关系。所以，从整体而言所有藏人统统都需改造，无论替中共做事的任何一名藏人，本质上都是围绕这个倾向性意志并为之服务的工具。诚然，好的改造与进步不论是人与社会都是必需的，但前提必须是善意而公正的改造，不应该包藏祸心，居心叵测。中共强制改造西藏及藏人过程中，许多具有自我民族意识和尊严，而不屈凌辱的藏人丢掉了性命，付出了家破人亡的惨重代价。

积极分子们所关心的不是政策性的理论知识问题，而是如何整人害人的那种不计后果的极端做法。他们尤其毫不客气地当众批判和辱骂藏人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特意批斗羞辱宗教界的喇嘛格西。对善恶会遭受报应的恒理和应当遵循的道德伦理，一概弃置脑后视若粪土，盲目推崇和践行伤天害理损人害己的恶德恶行。如果认真追究这种人性的畸形变态，当然与滋生这种变态心理的环境——中共对待藏人的政策有直接关系。这一政策在藏人之间分划了势不两立的两种阶级，革命与反革命、先进与落后、积极与顽固、同情庇护与检举揭发等等…让藏人相信，只有选择脱胎换骨，选择背叛才能

找到出路。因此，整个西藏社会陷入了与个人前途命运相关联的各种激烈矛盾与斗争之中，蛰伏在人性之中的丑恶一面得到了合法展现。与此同时一个民族的共同价值观和形成整体凝聚力的基础，都成了反动，被践踏的支离破碎连根拔除。这种政治运动的风暴同样刮到监狱犯人当中，当时我们支队的积极分子一孜仲贝布益西图登、琼热巴仁增朗杰、郎本札西多杰、蒙日巴多吉捷布等人，置自己被打成历史罪人关进铁牢的事实於不顾，反而期盼已久似地为政治运动的深入普及绞尽脑汁献计献策。他们这种像小丑般极力向统治者表忠心，对血脉相连的手足视如仇敌，百般羞辱刁难甚至诬陷折磨藏人的丑态，激起了关押在扎基监狱里的所有藏人的愤慨与蔑视。

监狱里推行的花样百出的破四旧运动中，勒令要坚决憎恨旧东西与旧观点思想，坚决以雄壮愤懑、准确果断、气势磅礴的破四旧风貌展开揭批斗争运动。我们分队由於积极分子们的突出表现，被评为先进分队。一九六七年智如夏仲和固仓仁波切被列为反面典型，开展了各式各样的批斗运动。比如，身穿红黄色衣服被说成是宗教迷信，藏靴和氍毹制成的东西说成是旧传统。总之，藏人之前的思想观念和所使用的生活用品，几乎统

统成了“留恋或妄想复辟旧社会”的证据，这些东西一一被没收焚烧或砸毁。在这种荒唐而疯狂的革新运动中，我身边仅有的两件东西，是母亲送来的一件氍毹袍子和先父遗留下来的一只木碗，均被他们强行烧掉了。他们不仅毫无顾忌地毁掉别人的东西，还理直气壮地倒扣各种帽子，说我们残留旧思想，眷恋旧社会，这是死心塌地妄想复辟封建农奴制度的表现。

在大大小小的批斗会上让人无休止地交待思想，坦白罪行。为了积极投身破旧立新运动，勒令每名犯人写出书面思想汇报后，贴在各自囚室的墙壁上，犯人称之为“思想体会”。这既是管教干部经常观察犯人的思想动态和改造态度的平台，更是积极分子们抓柄扣帽子的依据。内容每个礼拜要更新一次，根据政治运动的主题和当时的形势，自己如何进行改造的体会成果和决心等等。行文措辞如果不认真推敲或立论汇报与政治主题未能结合或结合错误，就会惹祸上身。左倾思潮充斥发烧的年代里，弄不好会当成现行反革命随时拉出去枪毙。

有一次，我在自己的思想汇报末尾，以体会写道：自己的前途问题上可能会遇到一些挫折，因为早先

形成的痼疾遏制著先进思想的萌芽，经常陷入落后与愚昧所束缚的顽固黑暗的恶习之中，短期内很难解脱其桎梏。”孜仲贝布照例检查体会中的毛病时发现了上述几句话，“达瓦次仁的思想体会里有毒！”他惊呼著跑到劳教干部巴瓦格桑前作了汇报。

当晚，巴瓦格桑召集我们班组会议时说：“本次会议是针对达瓦次仁和强巴旦达的问题召集的，你们二人要老实回答我的提问。”他刚说完，积极分子们便开始攻击我和强巴旦达，他们个个对我们如同对待杀父仇人似地怒气冲天挥手顿足，甚至有些人干脆直接要上前毒打洩愤，他们还诬陷说：“达瓦次仁在监狱里也有杀人的意图。”乱扣这种无须有的罪名，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看这情势他们想置我於死地。但我并没有被他们的气势吓倒，反而更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处境的同时，抓住他们话题中的逻辑矛盾反驳说：“我根本没有杀人的意图，就算有这样的念头，也根本没有兑现的条件，我既没有力气，也没有武器怎么去杀你们？分明是做白日梦嘛。”“你写的东西里，有含沙射影指明了想杀我们劳教干部以洩私愤的意图。”巴瓦格桑边说边盯著我的眼睛。无论是干部还是积极分子的质疑，我始终镇定自如地一一作了反驳。强巴旦达跟我一同受审的原因，仅

仅是因为他赞赏我的写作而受到了牵连。他们说我们两人一个是高谈阔论的谬论家，另一个是臭味相投的跟屁虫。那时班组里经常会出现他们认为需要清查批斗的问题。因此，我的问题暂且拟定为待查，并在小组会上再被批斗几次后，算是暂停下来了。

那时犯人的任何一点正常疏忽会演变成政治性质的问题，随时有可能报告给管教干部。而管教干部往往会以积极分子的报告作为依据，对被告的犯人用各种手段进行审查，重则丢掉性命，轻则打成累犯。这成了中共专政机关对犯人实行的一种特殊狱政，也是中共监狱才有的一大特色。我的狱友强巴次忠善於绘画，他笔下的人物和山水风景简直栩栩如生呼之欲出，堪与顶级画师的杰作相媲美。尤其四吉祥中表示第一吉祥的那只大象，即威武雄健又亲昵憨厚，令人百看不厌，爱不释手。有一次经我再三请求他为我画了一幅大象图，我很欣慰地常常拿这幅画来欣赏解闷。可意想不到的是这幅画成了他们找茬的依据，一幅普通的画像经过他们的主观臆断成了与政治性质相关联的原则问题。他们把主观臆想出来的结论向管教汇报的同时，气势汹汹地质问：“你们绘制和欣赏的这只大象是不是有意表现其力大无比势不可挡？大象一般生存在印度，所以你们想

表达印度比中国强大的意思。你们这是极力表现印度反动派，及逃到印度的那些走狗，还幻想著去投靠他们……”什么印度比中国强大、妄想投靠反动分子，纯粹是无中生有的诬陷。我们画大象仅仅是为了欣赏，就这么简单，根本没有考虑过如此复杂问题。我坚持陈述理由的同时，为了澄清政治性质的诬陷而辩解道：“自从一九五九年关进监狱进行改造至今，既与外界几乎断绝了联系，这期间与印度反动派那边没有过任何联系，也没有听任何人议论过这类问题，如此指控纯属无中生有。”但任何事情一旦被他们咬住绝不会轻易松口，积极分子和干部沆瀣一气、不依不饶地通过三番五次审查批斗，结果因为所指罪名过於牵强附会，最后便不了了之。对一个受审的犯人而言，任何时候自始至终，镇定自如地进行逻辑贯通的辩解陈述，这是最好的自卫方式。

## 十二、吾被列为第三“宝瓶”成员； 一首祝寿偈颂出自衣兜

古往今来大力弘扬佛教思想的究竟目的，既非是为了桎梏人类固有的思想行为，更不是为了巩固统治阶级的政权地位。佛教的核心价值原本是为普天下苍生指明一条驱散黑暗的光明前景，即在今世要积德行善珍爱众生，使众生相互谦和敬爱，和谐有序地生存在同一个家庭里。同时对无法预知的彼岸世界，勾勒出了令人们充满遐想的一盏航海灯标或理想信仰的座标。可是，对宗教持否定观点者对佛教提出的“来世轮迴”和“因果报应”等立论解说，驳斥成是蛊惑人心的精神鸦片，是令人误入迷信歧途的罪恶陷阱，进而视为危害社会的毒瘤，并用各种极端手段予以消灭、取缔、禁止。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可谓是消灭宗教的楷模。

一九六八年秋，智如夏仲暗中给了我象征二十一轮王的法王祝寿祈祷文，名为《诸佛大悲乳海论》。他还问我是否已经受过《噶当十六精要》灌顶？我说以前在扎伊巴时从扎热大师处受过全程灌顶。一个月之后他

把《噶当十六精要》本部的威严度母经送给了我。我当时虽然暗中背诵过几次这本威严度母经，可最后还是没记住多少。那时我在监狱裁缝组当裁缝，所以他常常利用来回取送材料的便利，暗中对我送东西，包括一些有营养的食品。后来我才知道他送给我的那些食品，是他们几个人秘密为达赖喇嘛举行祝寿祈祷仪式时，用糌粑拌酥油、奶渣、红糖等做成的供品，而且还有一小块用藏文书写梵文咒语的黄色绸布，梵文内容是祝福我未来吉祥，健康长寿的祝辞。他们祈祷达赖喇嘛永久住世的同时，也在监狱中举行纪念一九五九年三月十日爆发的“西藏自由抗暴日”十周年活动。因为，一九五九年三月十日藏人在拉萨掀起了反抗中共入侵西藏的大规模运动，从此每年三月十日藏人便自发性地举行纪念活动，尤其一九六九年三月十日是十周年纪念日，参与祈祷的还有贝巴仁波切，强巴次忠，江参强巴等共计二十多人。当时，他们特别以观想噶当十六精要坛城，用糌粑做成的表示吠琉璃的五个宝瓶举行了祝寿发愿仪式。五个宝瓶分别代表著祈祷人须仲仁波切、贝巴仁波切、强巴次忠、江参强巴、图登尊追及其他他们所代表的众人。他们把我安排在第三宝瓶，也就是现世轮，这些事情经洩露后我才得知详情，事先根本不知道。

此事洩密的原因是由阿旺才登离世引起的，他以前是管理达赖喇嘛诺布林卡夏宫的僧官。他参与了此次祝寿祈祷活动，并且是第三宝瓶成员之一。他本来体质虚弱，加上监狱里无休止改造，评审多次遭到残酷毒打折磨。另外，经常忍饥挨饿过度劳累，患病受伤却无医无药，最后彻底病倒，於一九七零年夏季某夜圆寂在监狱床上。不幸的是，他离世后同囚室的孜仲强旦噶布从他的衣兜里搜出了祝寿祈祷文。当时，他发现此物后如获至宝，欣喜若狂地即刻报告了监狱管教。管教让他暂时保密，不准传出发现此物的讯息，随即传唤了与阿旺才登平时最亲近的江参强巴。江参强巴是个思维敏捷胆大沉着的人，并非是胆小愚钝的懦夫。面对审讯他坚持陈述此事与他无关，始终没有洩漏一句。无奈之下监狱干部又传唤图登尊追，并使用欺骗恐吓等惯用伎俩在他面前佯装满不在乎地说：“告诉你，秘密聚会祈祷的主谋和随从、时间、地点早有人报告过了。本来今天没有必要再找你来审问这件事情，但本著我们政府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对你给了一次主动坦白的机会，要不要抓住这个机会取决於你自己。不过你要弄清楚，这是一起在共产党监狱里背叛党、背叛国家，尊崇反动分子，毒害犯人思想改造，极其恶劣的案件，弄不好你的

小命也有可能被它埋进沙土的……。”结果图登尊追被他们的假戏弄糊涂了，真以为有人已经报告了此事，加上管教员把这件事情的后果说得如此严重，他开始害怕而心虚了。最终他把祈祷内容等全倒出来了，还出卖所有参与的人员。

本来图登尊追也算是个较有胆量和头脑比较好使的人，此人性格开朗，喜欢吹牛爱说大话，尤其擅长取笑逗乐，常常会把大家逗得捧腹大笑，所以大家都喜欢亲近他。而且智如夏仲也把他视为知己，很器重他。此次也是智如夏仲推荐下他才参与了这件事，谁曾想到他会给众人造成了这么大的麻烦。当年冬季评审活动主要针对与此事有关的人，包括我展开了批斗会，让每人在会上轮流交待罪行，然后众犯人唾骂、批斗、讨伐，主谋还被拉到全队大会上进行了批斗。起初我和江参强巴怀疑山南强巴林的堪布洩漏了此事，根本没有怀疑过图登尊追。

正在评审阶段的一天晚上，我在厕所里与图登尊追相遇，我小声对他讲：“交待我们关系时，只能说一些牵扯宗教信仰方面的事情和其他生活方面的事，千万不能牵扯到我们对革命和共产党不满等私下议论的话

题。”可是他根本没有搭理我说的话，连正面对我看一眼都不敢。我顿时感到情况不对劲，看样子唐突失言又给自己惹了麻烦。

果然不出所料，几天后分队大会上管教说：“今天图登尊追要揭发本队里的有些坏分子，这些坏分子近期跟他接触后教唆他要顽固到底的罪状。”随后，让图登尊追出来揭发坏分子，他面部露出极不自然的表情，战战兢兢地说：“宇鲁达瓦次仁为了隐瞒罪行，几天前找我串供，人民政府为了让我们这些犯人在良好的改造环境里，能够洗心革面重新做人进行了长时间的耐心教育，可他不仅自己不领会政府的良苦用心，还教唆别人抗拒改造，想把别人的前途也跟自己一同毁掉。”当即干部叫我站在人群中间接受众犯的批斗，起来批斗我的还是积极分子孜仲贝布、仁增朗杰、次旺占堆、次旺热杰、敦珠琼桑等人，个个表现出水火不容的样子厉声痛斥我。“在本队，宇鲁达瓦次仁是个不仅自己抗拒改造，而且阻挠他人改造进步的，他是一个最坏的罪不可恕的家伙。”有的还说：“达瓦次仁的反动思想满盈到了污染他人的程度，综观他的前后恶行，现在只有背上插木牌之外已经没有别的出路……”背上插木牌的意思，就是要实行枪决。文革期间对判处极刑的人在宣

判和押赴刑场时，插在该犯人背上的一块写有其姓名的处决令木牌。当晚的批斗会开到很晚，直到凌晨时分管教才作了总结。但只说批斗的好，透彻之类的鼓励话以外，没有作出什么结论。正式分组展开激烈审查、揭发、批判从第二天才开始。

令我感到一丝欣慰的是，分组之前教官次旺特意到我们队的动员会上强调说：“最近我们队有人对其他犯人进行审评和批斗过程中，流行著要背插木牌的说法，这绝对不是什么正确的言论。背插木牌是人民政府惩治那些罪大恶极，仅凭改造手段不足以平息民愤的少数血债累累的，且坚决与党和人民作对的死敌。至今我们这个队里还没有出现罪大恶极到需要插木牌处决的敌人，无论这个队里任何一名积极分子和先进分子，对其他任何犯人的不法言行，可以检举揭发，对他们阻挠改造的任何活动可以审评，也可以向上级汇报，而且身为先进应该履行这个义务。但是，扬言或向上级提出背插木牌的要求是万万不可以的，要记住你们没有这种资格和权利。”姑且不论他的话能否兑现或有别的用意，总之，对我这个没有话语权，并遭批斗的人来讲，当时颇受感动，他说到我的心坎里去了。

秘密聚会为达赖喇嘛举行祝寿仪式的主谋强巴次忠和贝巴仁波切，以及凡牵涉此事的人一个不漏地揪出后，成了长达个把月专题批判运动的对象，与斗争的目标。尤其是两个主犯，被批判成无产阶级铁牢里的顽固反动头子；达赖的忠实走狗；在共产党的监狱里散布迷信思想；胆大妄为地置人民民主专政权威和革命力量於脑后，死抱烂缠地顽固坚持早已腐烂恶臭的旧思想，妄想把陈旧的、被扔进历史垃圾堆里的东西仍抱住不放；阻挠和破坏全体犯人在崭新的改造环境中接受新思想，塑造新的人生目标的罪魁祸首等等……。其实这种声势浩大、旷日持久的斗争、批判、揭发等，令人胆战心惊的政治运动欲求达到的目的，绝非单纯通过现场斗争就能实现的问题，这本质上是两种完全不同意识形态理念的冲突。所以，改造犯人的办法也只能针对意识形态领域，也就是洗心革面，脱胎换骨的思想斗争，仅靠惩治是远远不够的，有些管教肯定明白这个道理。

通过长时间的大小审查、揭发、斗争、批判，有关举行祝寿仪式问题全部彻底清查后，一九七三年初召开了总结大会。大会宣布强巴次忠为这一事件的主谋，以重大累犯罪予以备案；贝巴被认定为主要协从犯，以累犯罪予以备案；其他直接参与此事的人都一一

记了大过；没有直接参与此事的我和江参旦培被勒令为继续悔过阶段。

不幸中的万幸是没有一个人因这个事件而被当场处决。不过所谓累犯罪备案就是一种特级警告，以后的变数就难以预料了。

### 十三、身患重疾则成修行助缘； 黄色板车引发重大争议

铁丝网密密麻麻地围在监狱高高的砖墙顶部，红色的砖墙因久经风雨腐蚀而变得灰白不堪。长年与世隔绝的高墙内院景象如同这堵破败老墙，无限惆怅、苍凉。春风扬起阵阵尘埃到空中，使身心憔悴弱不禁风的囚徒们的视线也被风尘吹打雕琢，变得朦朦胧胧。

一九七三年初，审评还未完全结束的一个春季早晨，全体犯人正在进行跑步练操时，我的腹部突然一阵剧痛，只好捧腹下蹲，痛得无法站起来。当时带队操练的是果卡·次旺占堆，他严厉训斥我继续跑步操练，可是我痛到莫说跑步，连腰都直不起来。从此病卧在床，劳动出操只能免除。之后经监狱医务所诊断为急性肝炎传染病。医生还通知管教：“该犯患有严重传染病，若不及时采取隔离措施，会传染给其他犯人，后果将不堪设想。”管教听后大惊失色，当场把我隔离在一间僻静的破旧小屋，严禁我自由外出接触其他犯人。同时管教顿珠指令我们小组说：“从今天开始达瓦次仁的牢饭由

你们组负责端送，送饭时不准进屋，搁在门口即刻转身返回，因为医生说患有急性传染病，如果有人擅自与他接触传染，届时你们也跟著他葬身沙滩。”从此犯人们像躲避鬼怪一样远远地躲著我，几乎没有人敢接近，只有江参强巴和强巴次忠、日喀则杰布三人，先后悄悄地来安慰我。医生们只说我的病特别严重，但究竟严重到什么程度，如何救治一概没讲清楚。因此，我借机在医务所询问病情和医治情况，可是医生的回答是：“你是个罪犯，得了什么病没有必要告诉你。”就这样，犯人想知道自己得了什么病的权力都没有，可我生平第一次听到自己患有如此严重疾病。回到灰暗的小屋，孤零零地面对墙壁沉思，身为囚徒连命都不归自己支配，遑论询问生病的原由。死一般孤寂中禁不住被抛弃的凄凉、哀楚，从医生的神情判断，自己得的病很可能是不治之症，死神可能会随时降临到头上。我渐渐驱散隐隐哀痛，做好了坦然迎接死神的准备。

通常犯人死后，医生洛桑塔庆会唤来几名犯人，他们拿著铁锹，一边把尸体装在一架黄色板车上，推到监墙外不远的沙滩上，连囚服也不脱，草率地把尸体埋在沙土下。这样，一切都平凡的再平凡不过地结束了。

心想自己也很快会被他们放在那黄色板车上，推出去草草埋葬的时候不远了。想到此处，蓦然凝神聚精会神默默向达赖喇嘛祈愿祷告，为消除雪域西藏的沉重灾难和种种恶业，甘愿将全部罪孽由我一人承担。如此强烈地发了心愿，从此不分昼夜，抓紧时间默诵了无数百字忏悔经和六字真言。全心全意地投入到祈祷诵经中。逐渐地不仅心情开始豁然开朗，身体也明显好转。单独隔离近五个多月后，我的身体比以前更加健康，体内病毒也完全消失了，真可谓诚心能使狗彘生辉。医生再次诊断后惊奇地说：“该犯人体内已经没有任何病毒，完全恢复健康了。”从此我被解除隔离，又回到以前的囚室。

单独隔离近几个月后，病情恢复良好的消息被管教顿珠和积极分子们知道后，他们为了探听我独居期间的思想动态，寻找继续打击的把柄，指派平时与我没有任何抵触的多仲次旺热杰来接触我，他们认为我对他不会存有戒心，会吐漏实情。由此他们要挟多仲说：“听说达瓦次仁的病情恢复得差不多了，我们交给你一个立功的机会，你主动去接触他，打听他在隔离期间搞了什么迷信活动，到时候他回到队后你就要检举揭发他的罪行。这件事情我们已经分配给了你，如果你不做我们还有别的途径，不过这样你不仅失去了立功的机会，反而

会成为他的死党，我们将一起批斗你。”多仲在他们的威胁下，接受了这项立功的任务。当然这些详情，都是事后多仲亲口告诉我的。

我快要解除隔离前的某一天，多仲突然来到我的小屋，装成非常关心的样子说：“现在身体状况怎么样？人到了这地步最好还是不要想太多，想多了没有用，主要还是多念诵佛经，向三宝祈求祷告，人死后唯有这些东西才可以带走，您说是不是啊？”当时，我哪会想到他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相反还感激他不畏忌讳特意来看我。所以，我未加思索地对他说：“你说得没错，我也是自从被隔离以后始终向三宝一心祈祷，结果日益心宽体健，摆脱了病魔。这期间我念诵过大量六字真言和百字经、心咒等等。”

后来我被解除隔离回队不久，在一次检查思想会上，多仲突然主动站起来说道：“达瓦次仁在隔离期间我为了了解他的思想改造状况去找过他，他告诉我说，他因病得福，得到了潜心念经颂佛的机会，什么六字真言啊，百字经啊等，默诵过多少遍都跟我说了，这个人一贯喜欢搞这些东西。”我大感意外地瞅了一下他的脸，可是，他倒轻松自然地把全部过程说了一遍。管教

顿珠接住他的话尾附议似地道：“达瓦次仁啊，我看你还是把所有问题都坦白清楚，不要等到问题闹大了，这样再也说不清楚。”明摆著这是他们设下的圈套，但又能怎么样呢？只是心里一时难消这种被人玩弄的怨气，於是我反驳：“多仲次旺热杰的话纯属诬陷，我被隔离后监狱上级领导严令不准任何人接近我，他怎么能接近我，并且听我说这些话呢？”我还没有把话说完就被管教顿珠气呼呼地喝斥声打断了：“这种恶人连活人都敢生吞，站起来！你这个厚颜无耻的狗东西。”他让我站在犯人当中，然后环视一下众人继续说到：“这个不知羞耻的达瓦次仁，活生生的人当面对证仍然死皮赖脸地敢否认罪行。我们人民政府让你养病休息，可你为什么把病休场转变成搞迷信活动的场所？”说著揪住我的胸衣狠狠地拽了两下，并用手指对著我的额头：“不交代清楚，就有好戏看，甭想蒙混过关。”这时积极分子们激昂怒吼，众人趋情附和，指责、讨伐、唾骂混成一片。看这情势若不作出适当的表态恐怕很难过关了。“我身患传染性疾病后政府果断采取了隔离措施，之后听医生讲我的病情特别严重。因此，以为自己得了不治之症，可能离死不远了，不久就会用黄色板车拉到野外被埋掉。所以，事先自己给自己做了一点祷告。”刚说到这儿又被管教顿珠打断道：“听到了吧？他的话中之意，你们理解了吗？监狱审查会上还竟然敢把话题

公然扯到黄色板车上去了，分明是想扰乱人心散布有毒思想。所有人对此人的阴暗思想要进行坚决批判，要彻底肃清思想领域的消极毒瘤残渣。你们当中跟达瓦次仁一样怀著悲观思想的人，我想肯定还有，对此每人结合自己的思想改造情况要一一进行盘查清理。”随即积极分子带头以“黄色板车”为议题，首先从批判我的有毒思想开始，展开了人人要过关自我思想检查。直到凌晨管教顿珠才作了总结。他说：“今晚对‘黄色板车’问题取得了较为统一的认识，但是，对达瓦次仁的灰暗思想观点，还没有清理干净，今后要继续对其实行监督观察。”

文革末期的某一天，多仲次旺热杰主动向我解释了上述事宜的前因后果，并恳求我原谅他的这种不仗义做法。我也以宽容心态接受了他的道歉，从此我们又和好如初了。其实监狱里身不由己，犯人作出违背自己良知和起码道德界限的事情，多的举不胜数。尤其是积极分子们费尽心机充当中共监狱管教的走狗，有些为此作尽了伤天害理的事情。如此践踏自己的人格后得到了什么回报呢？除了干部的口头表扬，最多只是记一两次功，仅此而已，回过头来还不是如同被人驱赶的牲畜似的囚徒，几乎从未见过一个走狗因此而得到过什么好的出路。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解。

## 十四、猛烈洪水肆虐满院； 监墙一节节被倒塌

一九七四年八月三十日深夜，突然闪电雷鸣，暴雨倾泻，顷刻间雨水灌满了监狱内院的所有坑洼低凹处，起初我们从窗口瞭望时，水面漂浮著垃圾杂物，雨水并未漫延至囚室。白天如牲口般辛劳的犯人们晚上总是拖著疲惫的身躯极快进入梦境，对他们而言，睡眠是唯一的享受，梦境是唯一的自由。当天半夜，突然从多达迪<sup>23</sup>发的巨大山洪冲向了扎基监狱，洪水猛烈冲入监狱内院，与之前的雨水汇合后又迅速冲进牢房，与此同时周边防护墙和各队之间的间隔墙相继倒塌。突然被惊醒的犯人们眼看著洪水马上就要冲垮牢房，有的惊呼尖叫、有的大声呼唤干部快来开门、有些人开始敲打，甚至砸门欲夺门而出。我们同室的所有人也想采取砸门的办法，可是我们没有工具可以砸开坚固的铁皮牢门，加上洪水冲倒了电线杆，整座监狱漆黑一片，如此紧要关头迟迟不见管教干部的踪影，无奈之下我们只好拿木制的尿桶合力砸门，最终我们砸开了门。跑到外面后雷雨交加声中，耳旁传来阵阵院墙相继倒塌的轰隆声响，

稍后干部才拿来钥匙打开了所有囚室，我们搀扶著老弱病残的狱友撤离到了监狱修车间的大院里。为了防止犯人在混乱中趁机潜逃，大院四周整夜部署了大量持枪士兵。而惊魂未定的犯人们大部分没来得及穿上外衣，有些人甚至根本没有穿衣服，有些光著脚的人则被玻璃碎片扎破了脚板，但没人理会这些小事。我身旁的噶玛曲吉只穿一件单薄的衬衣和裤衩，冻得浑身发抖。我在黑暗中没有找到腰带，匆忙中拿著透湿的裤子跑了出来。

八月末秋初，我们整夜浸泡在暴雨加刺骨寒气的露天院中，个个冻得瑟瑟发抖；而干部们穿著雨衣，且在喝酒御寒中有的人还喝醉了。而我们唯一的希望是早一点天亮后露出温暖的太阳，对此我默默祈祷著。

东方天空缓缓泛起了鱼肚白，暴雨也渐渐成为丝丝小雨，天色大亮后狱方用卡车把我们运送到了五支队。下车清点人数后，我们吃到了滚烫的清茶和新鲜糌粑，很久没有吃到这么好的糌粑，吃饱喝足后人人脸上的鸡皮疙瘩和倒竖的寒毛逐渐消失了。之后狱方派部分犯人到扎基监狱清理垃圾和淤泥，我们留下的人则在五支队待了八天。这期间每天安排审评和揭发批判，第一

天五支队召开大会，会上一名汉族干部说：“扎基监狱因为遭到洪水冲击，房屋和院子积满了污泥垃圾，因此需要清理几天。在此期间你们要抓紧时间搞一次思想整顿，为彻底肃清旧思想观念，对犯人平时的改造态度进行几天一次的认真审评、揭发批判，争取返回扎基时在思想改造方面有一个实质性的跃进。”

事实上这种老调重弹的思想改造方式，犯人们已经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了。人人为了免遭无谓的人身攻击，所有的怨恨悲哀和不满，几乎严丝无缝地收藏於内心深处，在外表上八面玲珑无懈可击。因此，经常在干部督促进行的思想审查会上，往往找不到新的议题和批判对象，而陷入僵持沉闷状态。每当此时，为了活跃气氛讨取干部的欢心，不论有没有事实根据，总是习惯性地拿落后分子们开刀，我则是我们班组首当其冲的开刀对象。

到五支队的头一次审评会，开始时众人都沉默不语，可能是在酝酿批判对象和内容，之后我们组的仲果杰典站起来谈到：“当监狱遭受如此洪水袭击时，人民政府和共产党从死神手中夺回了我们这些犯人的生命，本人深受感动，并致以诚挚的感谢。但我们当中某些人

不仅对救命之恩无动於衷，还仍然心向善达赖，偷偷摸摸地搞迷信活动。”他刚说完多仲次旺热杰呼地一声站起来道：“干吗吞吞吐吐不敢痛快地说出此人名字，我们当中平时搞迷信活动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达瓦次仁。虽然，我没有听清楚声音，可我清楚地看见他在雨中作祷告，从他当时的面部表情和喃喃自语时嘴唇的抖动就能判断他在搞迷信，除了迷信他还会搞什么！”其他犯人因为找到了议题而活跃起来，他们都知道一旦找到了攻击点便可以炒作，把气氛炒的火热，如此一来干部看在眼里，至少可以进行到及时开饭，不用熬夜。

对我而言，此次只是表情和嘴唇摆动的问题，尽管这几天会遭到司空见惯的讨伐、批判、辱骂，但不会导致严重后果，只是对多仲的那种满不在乎的指责口气有所憋屈。我被众人夹击下被迫讲道：“我在雨中面部被冻得失去了知觉，因哆嗦嘴唇可能抖动过，可我没有作过迷信活动，多仲的揭发只是他的主观猜疑。假如抖动嘴唇时无意间失口露了一两句，除了向人民政府诚心请罪以外，绝不敢狡辩。”积极分子们气急败坏指责我在找藉口、态度不老实。他们怎么可能会轻易放过我，个个横眉怒目地批判了我一整天，所幸第二天他们又找到了新的炒料和批判对象。总之，在五支队的八天时间里，整天处于疲惫不堪的批斗状态，最后总结大会上得出结论，宣称此次整顿已取得了巨大的思想改造成果。

## 十五、无能反驳找瑕疵； 精彩评论动人心

尽管扎基监狱被罕见的洪水袭击后，房屋、设施、工具及环境等遭到了重创，但这种天灾怎么可能改变中共的囚徒政策与一贯的方针措施。洪水过后不久，扎基监狱召开了相关官员出席的一个大会，分管监狱政治工作的一名汉族官员对如何开展政治教育运动作了陈述，他说今后政治运动的主攻方向是要大力开展批判林彪和孔子，以及揭批达赖、班禅的运动。从此，扎基监狱掀起了新一轮的政治斗争运动。

遭受十几年的监狱残酷冶炼煎熬，令犯人相当熟悉中共这一套政治权术，犯人远不像一九五九至六十年代那样的愚钝脆弱。为了保护自己，如何看风驶舵、投其所好，干部、积极分子以及犯人彼此间如何左右逢源、巧妙周旋，大小会议上如何把握话语、轻重等心术诀窍，娴熟到了相当程度。尽管如此，犹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那些狱方教官的找茬招数也在同步提升。

由於他们长年与犯人打交道，相当熟悉每一个人的

政治态度，改造状况，以及平时的思想动态、生活习性等基本情况。专政者与被专政者之间的无形较量升级到了新的层面，以前的模糊概念和界限越发变得清晰透彻。比如：犯人谈论思想认识时，每一句话的政治含义会寻根究底，反覆对证逻辑条理，甚至藏语语法中的恭维辞、敬语、称谓等是否使用恰当也会仔细审查，时刻纠察所谓残余思想的毒渣，以避免遭到批斗、辱骂惩罚。总之，敢于正面与中共恶毒奸猾干部，拿脑袋对抗这种糟踏人性无赖行径的人，藏人中除了已经横尸荒野的几百名铁骨铮铮的壮士女杰之外，这种傲骨胆气几乎已经荡然无存了。

分班组讨论大会精神，如何批判林彪、孔子以及达赖、班禅的主题列出提纲让犯人学习，再勒令每人根据列出的提要结合个人的认识观点展开批判。各队干部在上级官员的监督下表现得格外积极严厉，他们警告犯人：“此次批判运动每一个人要彻底划清政治立场，要毫不犹豫、毫无顾忌地坚决揭批达赖和班禅的罪行，要彻底认清他们的罪恶面目。谁要是避重就轻，敷衍了事，借口回避，我们绝对会揪出其思想本质，其结果难逃人民民主专政的法网，会成为包庇批判对象——达赖和班禅的人。”以前狱方一直说班禅的观点与达赖是对立

的，他是一名热爱祖国与共产党，患难与共，坚决拥护党的事业的杰出人物，对他倍加称赞。对正在坐牢的甘丹颇章官员和喇嘛、堪布、格西等人，往往会拿班禪仁波切来进行比对，要把班禪仁波切的远大理想和意志当做学习的楷模，从各方面要为自己争取前途。可是，现在突然又说他是罪人，要批判他，共产党的这种出尔反尔的做法简直令人晕头转向，分不清方向。

班禪仁波切从共产党的忠诚朋友变成敌人的疑惑，渐渐从批判过程中找到了答案，原来他把中共从五十年代到文革期间在西藏推行的野蛮暴力行径和恶劣后果详细统计后，整编了一本《七万言书》备忘录，并据说上报给中央，这就是问题的症结。对他的这一壮举我们深受中共迫害的所有犯人既震惊又振奋，由此证明他绝不是一个无原则无底线的共产党忠诚朋友，他依然是个无愧於西藏人民的精神领袖，心中时刻牵掛著藏人的疾苦和民族的危难。

本来一个佛教徒万不可贬斥辱骂自己的上师，这是大逆不道的，可是身为囚犯除了违心地满足当局要求之外，哪里还有自己选择的余地。第一天的批斗会上，管教故意点名噶如仓仁波切和贝布益西图登开头发言，

他俩一个是迷信落后分子，一个是先进积极分子。果然毛病又出现在噶如仓身上，指责他批判达赖班禪的言词不激烈，旗帜不鲜明等等，并警告他下次要注意。每人轮番地起来批判时，首先要狠狠贬斥、唾骂批判对象，骂得越狗血淋头越好，之后再按自己的理解能力揭批其具体罪行。后来轮到我时我没有犹豫，闭著眼睛狠下心道：“达赖不仅是个背叛国家，挑起叛乱的罪魁祸首，而且逃到国外后，还以各种方式进行西藏独立活动。这一切所为任何人看来都是痴心妄想，是做白日梦，不会有任何结果。”如此玷污自己的上师，当然内心深处如刀绞般地难受，可众目睽睽之下，一旦不装做认真严肃坚决的样子，就会惹上大麻烦的，尤其批判达赖喇嘛时必须要说“达赖”，如果说“喇嘛”前面必须要加上“反动”两个字。凭著多年的经验和历练，不仅可以投其所好地以准确的措辞表达，并且平时尽量回避犯人间的不必要接触谈话。如此小心翼翼、处处谨慎地度过了七五年整整一年的政治批判运动，虽然曾受到了一些警告和小惩罚，但对生命没有造成危害。

时间推移到了一九七六年，此时我已在监狱艰难地熬过了整整十七年，刑期依然是无期徒刑，没有丝毫减刑迹象。我总认为监狱的一切变动不会改变自己的前

途命运，只要西藏的政治问题不发生根本性转变，尊者达赖喇嘛不能返回西藏，自己终生将要在中共监狱里度过，并且心理上也早有这种准备。

批判的浪潮已经消退，又开始兴起了人人结合个人前途，讨论思想认识的一种活动。说是为了自己的前途，把国内反动分子和共产党的所有敌人都揭露的同时，他们所造成的反动消极影响与自己所犯的罪行进行对比，再陈述反省认识，较有深度的论述还要以书面报告方式呈递管教。此次题目和内涵比从前狭隘的政治议题要宽广多了，以全国反面人物的罪恶历史为背景，评判其罪行和下场，再串联自己的前途，提出个人的反省认识。这种书面报告不仅不难写，而且很有意思，也很热闹。我们队的犯人中有不少曾当过旧西藏政府官员，所以，写作上没有什么困难，并且其中几个人具有相当的文化水平，当时干部挑选几个较为典型的报告，让我们反覆讨论过数次。

多年监狱生活令犯人敏感并熟悉政治运动内涵，大院内唯一了解外界的讯息是藏文报和少量宣传资料，还有会议传达学习的文件。犯人逐渐对中国历朝至国民党、共产党各历史阶段的几个反面人物的背景（主要是

罪行)可以道出一二,这些历史常识成了此次撰写反省认识报告的素材。多数人的报告开头都陈述这些反动人物在历史舞台上,曾剥削压迫劳苦大众等倒行逆施的罪状。有意思的是,串联自己的罪行陈述反省认识时,自然提到了藏汉两族从民族、国家、政治、社会制度的本质区别,一九四九年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才打破了两族平等的地位,尤其是一九五九年之后西藏才彻底丧失自主权,陷入中共统治。这里大多数人原先是旧西藏政府官吏,他必定首当其冲,瞬间乾坤颠倒令这些人噹啷入狱,糊里糊涂成为囚犯。之后经历十多年的革命高炉的熔炼,纷纷对“劫难余生的前途”从不同角度作出了各种认识,有些撰写了四十多页,具有极高的阅读价值和丰富内涵。这些都是民族遭到毁灭性劫难时,与这个民族共命运的人对劫难过程的亲历见证,是遭受了各种残酷折磨的人发自内心的独白,应该说都是珍贵的历史资料。

小组会上我没有隐讳地说出对迷茫前途的忧虑看法,对此管教干部说:“你因为缺乏改造意志,所以对前途会产生黯淡没有期盼的想法,这是严重错误观念在你心底作祟的结果。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共产党多年对你进行反覆教育的用意,完全是为了你能赢得一个好的前途。能不能争取到前途,关键不在於罪行的轻重,而取决於改造的质量,这是共产党政策之所以正确的鲜

明特征。比如；爱新觉罗的罪行与你们相比具有天壤之别，但由于他诚心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真诚悔罪，积极改造，而赢得了党和政府的信任。目前，爱新觉罗·傅仪正在社会科学院工作。”

一九七七年的总结会上勒令我再度深刻反省，尽快写出思想认识报告，并且警告说，缺乏热情和勇气，对前途黯然沮丧的心态是对党的政策没有信心的表现。因此，为了搜集批判题材，我借阅了一本叫《宣统皇帝通鉴》的藏译版，据说中共为了批判满清王朝的罪行，特别编译出版了此书。我从中国各朝代如何压迫剥削中国人民，揭露旧统治制度的黑暗落后的同时，再串联批判了旧西藏的封建农奴制度，以及一九五九年发生的武装叛乱。较有系统地记述了自己从小如何进入寺院的经历，直至一九五九年参与抵抗运动的全部过程。并陈述道：“原先一直以为自己是个重罪在身的人，对前途抱著消极态度，但经过认真学习领会后逐渐了解，党和政府改造犯人的真实目的是为了让我们弃暗投明改造成新人，再说论罪过自己远比那些历史罪人轻的多，由此思想开始顿然开朗，对前途也充满了希望，今后有决心加倍改造，积极进步争取早日出狱。”如此完全按管教干部提出的思路要求，一份真假参半的思想汇报书递交到了管教干部手中。

## 十六、以猪油灼治手上裂口； 纸条包石头扔监墙外

“改造”顾名思义是通过对身心进行强制性惩罚，欲求达到思想上彻底屈服的目的，由此可知其劳动强度和生存的惨烈状况。为了求生存不知要付出多少血汗，要承受多少非人的虐待折磨屈辱，多少个不肯屈服的人被残忍处决，许多人悲惨地病死、累死、饿死。

自从一九五九年关进扎基监狱以来，最初两年上山为监狱砍柴，后开垦荒滩建造菜园，夏季种植蔬菜，冬季任务则是制造土砖砌墙、修房屋内院，时至一九六七年从菜园组转到裁缝组。尽管裁缝作业不分季节，而且量也较大，主要制作囚服被褥，还有干部使用及对外售用的厚垫子，但是往往短缺材料，没有材料时裁缝组便要上山採石。採石的苦役相对比种菜、裁缝辛苦且危险，扎基监狱的主要採石场在噶如山半腰处的凸岩下，以及色拉天葬台的北面朗庆山沟及多迪沟等。这个工作不受季节和条件限制，一年四季犯人採石的叮当声不绝於耳。因为，採石场在深山沟背对太阳的阴坡，日照时

间短。犯人在刺骨寒风扬起的阵阵尘埃中，握钢钎、轮铁锤，手脚脸面冻裂破伤，渗著点点鲜血完成一天的指标。幸运时饭里能见到一小块带油的猪皮，这是犯人极难得到的宝贝，从碗塞进嘴，又从嘴里小心翼翼地抽出来，然后保存好，早晚用它烤灼治疗手上的裂口，便可以较快癒合裂口，犯人都称它“烤皮药”。当然，贴在伤口时灼痛的不免发出尖叫，但“烤皮药”很管用，往往会产生奇效。

砸岩採石也是个极其讲究诀窍规律的工作，负责爆破的人白天凿出炮眼，傍晚犯人收工后再放炮，第二天管教和组长把炸的满地的石头分包给每人，每人每天就要处理完自己的分配任务，先把大的石头切开，然后按规格砸成方块，必须完成一天的数量。这不仅需要力气，而且也是一个智慧和耐力的考验，手忙脚乱，急躁的人往往是新手，老练人都知道如何寻找石脉，敲砸起来既稳且快，效果又好。

文革风浪尚未退潮的一九七五年冬季的某一天，我去厕所解手时发现了一张写满藏文的纸张，由於从小受到文字包含著三宝的教育影响，本能地捡起后想放在一个干净的地方，拿回囚室又怕引起麻烦，最后包块小

石子用力掷到了监墙外面的林卡<sup>24</sup>里。很不幸，我这动作被噶玛夏江曲旺发现了，他即刻向管教汇报说我向监墙外扔信件。管教次旺和阿旺吉美带领我和几个犯人，从林卡里找回了我扔出去的那张纸条，随后传我到办公室问话。当时我还不知道有人发现此事，并报告了管教。所以，不知道又会降临什么灾难，心里有点紧张。一进办公室管教气愤地叫我脱帽跪下，我脱下帽子跪下后，他俩质问：“老实说今天你又干了什么好事？”我说，我什么也没有干，阿旺吉美恼怒地指著我的额头吼叫道：“你在这个小时之前干过什么，还敢狡辩。”我依然回答：“不光是今天，自从去年起没做过任何坏事。”随即次旺把那张包著石子的纸条啪地一声扔到我面前说：“这是你在一个小时之前干的好事。”一见这个纸条我才明白了怎么回事，紧张的心顿时踏实了许多，我草草地看过内容，里面没有任何反对共产党的政治内容，由此我解答说这不过是那个吉苏写的，“喙儿弯曲又赤红……”这是描绘鸚鵡的一首普通诗词吗？仅此而已我并没有做什么坏事。可他俩仍气呼呼地说：“就其内容而言，只不过是吉苏的作品，但也不是什么好东西，这是封建统治阶级的肮脏东西，可能有必要清除

---

24 公园、林地。

其政治毒瘤。再说你为什么要把它扔到监墙外面去？是不是又犯了封建迷信的老毛病？根据迷信说法文字代表著自己的信仰物件，你今天的行为是否出於这种动机？我们先给你一段考虑时间，你把陈旧发霉的迷信脑袋好好清洗一次，回头再对自己的行为和动机做出说明。”

第二天晚上召集队部会，管教针对此事说：“达瓦次仁这么多年接受改造教育的结果还没有触动他那陈旧腐烂的迷信思想本质，昨天他又犯了视文字为信仰物件的老毛病。党对他进行了这么多年的唯物主义正确思想教育，可他始终对唯物主义的教导抱著抵抗情绪，不予领会贯通，还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实施封建迷信行为，藐视党的教导和唯物主义理念，顽固坚持过时的旧传统理念，明知故犯地辜负人民政府的良苦用心。”所有犯人受管教干部的鼓动纷纷指责训斥我是死不悔改，害群之马等等，有人还提升到更深层的政治性质的问题，说什么：“旧西藏的三大领主本著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和骗取民众对他们的尊崇，胡说什么对文字要跟三宝一样敬畏，若不然会打入十八层地狱等等。他们只为了剥削榨取和骑在百姓头上作威作福，才使出了这些愚弄百姓的骗术。达瓦次仁此次之所以做出这样的事，是因为他以前与那些吸血虫狼狈为奸，奢华无度的生活影

响下留毒太深，才不能通过改造完全清洗这种思想的结果。”

我只希望早一点结束这种无聊的批斗会，再说管教干部和积极分子都清楚我的动机，这种思维习惯一般藏人都知道我是躲不开的，由此我检讨说自己由於受宗教影响太深，多年受党教育改造至今仍残存迷信思想，而做出了这种辜负政府的封建迷信行为，我有决心今后绝不发生类似事情。这样，此事才算摆平了。

## 十七、释放消息传遍整座监狱； 扰乱囚心一时陷入疑惑

个人的前途命运常常与国家民族的兴衰，以及重大的政治调整措施密不可分。由此而言，因一九五九年参加抵抗运动，从而以反动罪名打入铁牢的囚徒们的命运，也取决于西藏问题的定论和境内外藏人抗争自由的力度及其影响程度。尽管中共仗著强大实力，推动如文革等各式各样的红色政治运动，靠屠杀、镇压、破坏等手段欲将其统治之下的人们，统统洗脑改造成为异族奴役。西藏因外在物质落后无法抗衡外来实力入侵，彻底陷入了中共铁腕般的统治之下，但上千年来形成的内心精神世界，无论使用柔硬任何手段，始终未能实现令中共满意的改造效果。凭著藏人的这股精神力量，我才能顽强挺过了二十年的铁牢煎熬。

一九七九年二月，参与一九五九年叛乱的犯人不久就要释放的消息，在狱中不脛而走，普遍传开了。但我觉得这不是可靠消息，一来这是没有来源的小道消息，二来消息未传开的前两天，因参加所谓叛乱而判处

无期徒刑的人减刑到十五至二十年等不等有期徒刑。很显然，这就证明了不准备释放一九五九年事件中被捕的人。所以，我认为这是不可信的谣言。我们队中有不少判无期徒刑的人，其中不少已经改为有期徒刑，可是，对我丝毫没有减刑。

二月底，我与嘉贝忠阔·次旦觉杰、帕果仁波切赤来嘉措三人被派到跟随运石车到多迪採石场装石头，这只是犯人常干的一项工作，并没有什么稀奇。当天的监工是讲一口流利藏语的那位汉族干部，歇息时他对我们说：“现在外面的社会变化很大，而且都往积极的方向发展。目前拉萨市场上购买茶叶布匹等货物不需要凭票，可以随心所欲地买。这一繁荣景象也许你们三人很快会看得到，尽管对达瓦次仁来讲，你是个五九年武装抵抗人民解放军的主犯；而次旦觉杰呢，达赖外逃时你是隆子县县长，你为他的外逃提供各种便利，也参与过叛乱，罪行是极其严重的；对赤来嘉措来说你不仅是个受过国民党官衔的人，而且叛乱时还担任过藏军司令。总之，你们三个人的罪行都很严重，留下过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即便如此，你们在监狱积极接受现代教育改造，能够悔罪遵法争取进步，得到了人民政府的肯定和好评。”之后，他又对其他几个刑事犯说：“你们

虽然只是刑事罪犯，而且全是清一色的贫农出身，可平时的改造态度很差劲，缺乏争取前途的信心。”

今天，他对我们一同劳动的政治犯和刑事犯做出如此言不由衷的评论，显然是别有用心。平心而论，我们根本没有什么优越的突出表现，他这样说的不公平的，如果按他们的标准，应该说我们的思想更为反动。

他话中的含义和近期的传言，以及目前的一些不同寻常的动向来看，不难推断不久将有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但我并没有寄予过高的出狱希望。与此同时其他一些要犯也得到了干部的暗示，转眼之间监狱里沸沸扬扬地都在议论释放的话题，甚至有人揣测政治局势发生巨大变化，也预示著达赖喇嘛就要返回了。对这一没有来源的消息和每个人的期盼而夸张渲染，并纷纷猜测，使监禁了一、二十年的囚徒们蓦然沉浸於重见天日的兴奋和激动之中。

三月初的一天早上，我们队里仅有的十二名所谓上层人士突然被召唤到了监狱办公室。一进门，刹那间感觉与平时的气氛截然不同，管教干部一改常态要我们入座早已准好的席位上，给每人倒了一杯上好的酥油

茶。这天他们的言谈举止跟平常简直判若两人，一时之间令我们不但不习惯反而觉得惊惶失措。在此之前任何一个犯人一进这个办公室就要脱帽，如果因为出事来挨训的，更要双膝跪地苦苦坦白，请求饶恕。体罚毒打时的尖叫声老远都能听到，一旦被传唤到办公室，最笨的犯人也知道准没好事。像今天这样犯人与管教干部同席而坐，甚至管教干部满脸笑容对我们上茶，这实在打破了扎基监狱历史惯例，真可谓铁树开花。

当我们受宠若惊地面面相视之际，一个掌管监狱的汉族高等干部打破这大惑不解的场面说：“你们几个参加五九年叛乱之前都是旧西藏的上层人物，共产党的政策一贯是正确的，我们国家干部会坚持正确地执行这些政策。今天把你们召集在这里既不是要审查新的问题，也不是要宣布新的改造方案或单独集中学习。你们先喝茶休息，过后返回自己囚室每人写一份从八岁到现在的详细经历，尤其你们曾经当过旧西藏的政务官员或有地位的喇嘛，应该说都是有背景的人物，经历中把这些过程和具体职务，以及叛乱中的所作所为，判决书中的刑期直到今天服刑了多少时日，都详细写出来。”说完后还发了纸笔给每个人。

离开办公室每人脸上焕发著兴奋激动的表情，个个都估算著这是将有特大喜讯的前兆，也有人推测这是西藏的政治局势开始发生重大转变的端倪，标志著达赖喇嘛流亡他乡后掀起的各种政治运动取得了重大成果。而我感受最深的是，虽然看不出西藏将要重获自由地位，进而所有囚徒将会重见天日的标志性预兆，但达赖喇嘛经过多年不懈奋斗的成果威力，才强而有力地促使他们不得不关注我们的处境。时局的转变令平时甘为走狗的那些奸诈小人们个个都傻了眼，呆若木鸡。尽管他们凭藉告密、整人、使坏等各种肮脏下流手段，曾获得先进称号或奖状，为回报减过两三年刑，不过此刻这些人却无人理睬地被抛在一边了。此时，这伙人的面目中明显流露出懊丧与绝望，兴许参杂著反省后的忏悔。他们在犯人之间制造了多少冤屈痛苦，导致多少人付出惨重代价乃至生命，因果报天理昭昭，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第二天早上，嘉贝忠阔·次旦觉杰又被叫到办公室，管教干部郑重要他马上把经历，以及在监狱期间的改造情况详细记录后交到办公室，要他的前途出路问题作特大决定。他急忙来找我告诉这一消息的同时还说：“撰写以前的事情倒比较简单，棘手的是关进监

狱以后的改造情况，写起来有点掐不住脉搏。看样子已经有计划很快将释放我们，达瓦次仁你看我的改造情况该怎么写比较好呢？”我说改造的关键是通过改造真正改变了你什么，最好实事求是，但也不要过分，点到为止，这样就行了。如果是整个社会的变动和国际形式的影响，促使中央政府不得不调整政策下令释放政治犯，那么写的东西与你出狱没有直接关系，其目的仅仅是当局的下台藉口，无论好坏释放你是早晚的事。但他还是执意要听听我是怎么写的，我说我蹲了整整二十一年的牢，一一写起来比较繁琐，这期间的改造表现他们最清楚，也有记录，所以我不想说那些名不符实的虚伪奉承话。如果与一九五九年参与叛乱有关的犯人，不分改造表现一律释放，我就有希望出去，若一旦要甄选，我绝不会列入释放的行列。因为，前一阵子很多人无期改为有期时，我的刑期却没有减，从这个动作判断我的问题不会有动静。即便如此反正我对自己的前途已经没抱多少希望，我最渴望的是西藏的整个局势能有所转变，若能这样，我蹲多少年的牢都无所谓。

几天后，也就是（一九七九年）三月八日中午，突然通知所有犯人紧急集合。犯人整齐列队后几个监官首先宣读了一九五九年参加叛乱的犯人名单，其中点到

了我的名字。名单宣布后没做平时一样的冗长讲话，而直截了当地大声宣布：“从现在起你们不是犯人了，回去收拾自己的东西，准备出狱。”听到“从今天起你们不是犯人”这句话是人们盼了二十多年的回应，今天终于听到了。点到名字的人个个绽放重获自由的激动笑容，收拾东西后背著个自的行李徐徐走出了监狱大门。来到外面后，当夜安排居住在军用的一间大房子，既没有哨兵看守也没有上锁，从此告别了伴睡马桶的艰难监狱生活。

## 十八、获就业权当建筑工； 对甘丹寺供斋僧茶

尽管我们这些老囚终于等到了走出铁牢大门的这一天，但从修建这座监狱迄今二十一年的时光里，在此屈死的无数同胞由谁为他们昭雪，安抚他们的冤魂？谁会秉持正义对历史换公道？回顾囚禁二十多年之久的高墙铁门，不由怀念起曾患难与共的一个个熟悉面孔，及其一幕幕悲惨而恐怖的经历，往事历历在目，唤起隐隐伤感哀痛，此时此刻我以发自肺腑的祷告作为道别吧！

宣布解除罪名后，按法律规定在监墙大门外居住的第二天早上，由劳动局长旺久主持，召开了所有与一九五九年叛乱有关人员和原西藏政府高层官员等在内的释放大会。犯人们整齐排列聆听干部讲话。突然，开天闢地第一次听到了一句新鲜词，旺久局长站立在队伍前，环视众人一眼，接著讲道：“同志们，朋友们，共产党光明正确的政策给你们指引了新路，从今获得了新生……”

二十多年来视为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转眼间莫

名其妙地成了“同志”和“朋友”，人人惊奇而疑惑的目光似乎在寻找是祸是福的答案。当晚对每人发了一套新服装和三十元人民币，第二天带我们游览参观大昭寺、布达拉宫、诺布林卡、拉萨水泥厂，之后进行几天政治思想教育后分别安置到各建筑队，成了有劳动有报酬的建筑工人，从此处境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

几个月后，我们被释放的五十多人中的部分人再度安置到山南农场，我们剩下的二十几个人安排在五支队，破格给予一级工人待遇，每月规定工资为四十八元，外加奖金和补助，实际可以拿到六十七元。此后不久我接到侄子次仁寄来的一封信，信中称：“奶奶承受二十一年的歧视虐待，心里始终挂念儿子的处境，不知流过多少痛苦泪水。随著政治运动的结束，她又天天从房顶望眼欲穿地瞭望弯弯山路那一端尽头，苦苦翘首企盼著日夜思念的儿子……”字字戳心、思母心切，便即刻向工头提交了探家报告，工头十分干脆地准了我五天假。

我用出狱后的积攒为母亲买了一对崭新的卡垫，偕携同伴送的米、肉等东西，当天便搭公车归心似箭直

奔故乡——朱茜。到达朱茜谷口色康村时，刚一下车，一个男人细细端详我一阵后问我去哪里？我说要去找朱茜阿妈拉吉。他叹声摇摇头道：“以前的旧房已成为废墟，现在阿妈拉吉由小女儿罗布卓玛在赡养。”他似乎对我的家境瞭如指掌，可我根本想不起，也忘了打听他是谁。一听到母亲由小妹在照顾，顿时对大妹次仁卓玛不尽孝道的做法气愤不已。长子、长女赡养父母是天经地义的规矩，她怎么可以让小妹来赡养母亲呢。我背起东西，沿途不间断地赶到了朱茜村，一名小孩指点我要寻的房子，刚走到房前，正好碰上母亲与一个小女孩打开院门出来，母子相见不禁抱头大哭，母亲张开颤抖的双臂紧紧抱住我，泪水浸满了她那苍老褶皱的面孔，哭声陪伴著周围狗的狂吠声，我们走进了屋内。

母亲尽管苍老了许多，但总算健康，这些年她背著反动家属罪名，在残酷的阶级斗争中不知吃了多少苦头，为儿子牵肠挂肚，不知哀伤过多少。如今，有幸三宝保佑终於得以相聚了。母亲和小妹的生活状况十分贫寒，但她们尽其所能地招待了我。二十多年来天各一方，生死两茫茫，自然有道不完的话语，母亲聊开话头道：“过去的黑暗岁月里，多少人因未能逃出劫难

而丧失了性命，所幸你虽承受了那么长的折磨饥饿，但不仅捡回了一条命，而且手脚五官都完整地来到了我的身边，仅此我就已经心满意足了，这都是因果报应呀，今后我们可要知足才是啊。”显然，母亲不希望我再出事。我把离别后的前后遭遇详细地讲给她们听。

这时，一位男人径自进屋向我道了问候，由於二十一年与家乡失去了联系，所以，很多人我不认识，后来才知道此人是我的妹夫。我跟妹夫正在说话时，又来了一位双目失明模样寒酸的人，还带着一瓶酥油茶和几个鸡蛋，以示问候我。我问他是谁，他是住在江查的洛桑云丹。我问他为何落到如此惨景，他把自己的悲惨经历和现在仅靠救济苟活的生存处境诉说了一遍。其实天灾饥荒遍及各地，偏偏又阶级斗争风起云涌的疯狂年代里，多少人悲惨死去，又有多少人的生存处境跌入到死亡边缘。就母亲一家而言，划为富农成分，没收财产，毒打批斗，饱受了歧视虐待，更可怕的是家里没有一口饭吃，为了生存，母亲曾多次到墨竹一带行乞要饭，一家老小几乎被逼到了死亡边缘。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每一个牧区村落，娓娓道来旷古罕见的人间灾难。本来很想多陪老母几天，遗憾的是五天的假期瞬间即过。

返回后在五支队先后待了三年多时间，这段期间从事过打造水泥砖坯、操作搅拌机、筛料、充当石匠帮手、矫直切割钢筋等，凡工地上的所有粗活都干过。尽管劳动量很大，但毕竟已经融入社会大环境，并靠自己的双手在过正常生活，而且能拿到相应的劳动报酬，心里总觉得很知足。

一九八零年夏季大地一片翠绿的某一天，接到从前的老雇主墨竹仁庆岭噶康的邀请，便向工地领导申请后，批准了一个月的假期。来到老雇主家目睹著这一家庭的败落景象，比当初的预料还惨。想像这个家庭从前是墨竹一带人人敬仰，堪为传统楷模的一户人家，户主以身作则勤俭持家，从不倚富欺穷横行乡里，一贯秉持礼仪乡亲，救人济难，敬畏因果、笃信佛法，广结善缘，礼敬三宝的家规，是个从不越轨传统的典型藏族家庭。可在民主改革尤其是划定成分阶级斗争运动中，这个家庭的所有财产包括住房统统被没收了。我到那里时看见女主人噶康阿妈和两个子女拥挤地住在像是牧羊人在山间临时盖起的一间小屋，且破旧不堪，门口的两头牛和几只鸡便是他们全部的家产。这家的男主人原是西藏政府的摄政鲁康娃的亲侄子，在时局突变中被关入墨竹县监狱，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被活活整死了。噶康

阿妈也在这些年受尽了凌辱迫害，变成了现在这付乞丐婆似的模样。好在如此浩劫中能够捡回一条命，彼此还能活著见面，是不幸中的万幸。虽然，自一九七九年起西藏全境停止搞政治运动，推出了摘除各种帽子和消除阶级区分的政策。可是，阿妈噶康还依然戴著“四类分子”<sup>25</sup>的帽子。这位曾经持家立业，独当一面的女主人，并没有因为这些年的巨大挫折而气馁，虽然家庭、丈夫乃至身体都在一瞬间被摧毁了，可是她的精神深处依然焕发著一股坚韧不拔的毅力，从前的神态礼仪和善解人意的豁达，仍可以从她的举止投足之间浓浓透出，无意间给人一种油然而敬的感觉。令我颇为感动的是她对自己的遭遇几乎没有什么抱怨，她说：“个人遭受屈辱甚至丢掉性命都不算什么，这种事情自古有之，要紧的是整个民族不能没有前途出路。”

拜访完老施主后又应邀到墨竹谷深处的牧区，相见了阔别已久的一些老牧人。当时我们在帐篷里正在谈论个人经历时，只见一头大角雄鹿，在帐篷不远处的草地上踽踽悠闲地走来。牧人们见此情形大为惊喜，他们说，自从一九五九年后，野鹿便失去了踪跡，现在总算又回来了，这是牧区的祥瑞之兆。时间的流逝，时局的

---

25 共当局在1940-1970年代，对所谓地主、富农、反革命和坏分子这四类人的统称。

变化，并没有磨灭牧人们的纯朴个性和对故交的真挚感情，他们不仅热情款待了我，临别时还纷纷赠送了几十斤酥油和奶渣。我带著这些礼物返回途中，特意绕道去看了一下正在重修的我的母寺——甘丹寺。

犹如朵朵洁白祥云飘落在大山怀中一般的甘丹寺，不仅是我自幼成长修学的母寺，更是雪域大地的福泽基地和格鲁派的核心发源地。可如今放眼望去因遭战火洗劫和文革摧毁，现已成为满目创伤的一片废墟，使我痛彻心扉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对中共的肆虐更加激起了满腔愤恨。当晚，我露宿在废墟中，整夜思绪万千难以入眠。隔天一大早起来转了几圈，之后参拜了新修建的两三间佛堂，给寺院的每一个僧人布施了两元，并把牧民赠送的大部分酥油当作斋僧茶供给寺院。然后回到老家，在阿妈身边待了五天后返回了五支队。

一九八二年八月五日，我从五支队辞职，搬到拉萨中心的帕拉大院，借住在一名熟人的房屋里。可是，五支队根本不同意迁移粮户关系，他们说政策规定是“从哪里来，回哪里去”，任何人都不能违越。我三番五次找领导论理求情，还跟他们说：“如果任何人都要遵守这一政策的话，那么，拉固·次旺多吉是不是应该要返回英国伦敦，为什么他可以住而我不能住？”经多次申辩后，最终，虽然从五支队弄到了粮户关系，但又被

市公安局给卡住了，他们以同样的理由不予落户，拖了很长一段时间。有一次，我生气地跟他们说：“张经武还没到西藏之前我已经是拉萨居民，你们不能把我当成新迁的外来移民。”后经居委会开具证明才勉强落了户口。住宿及户口问题解决后，我在第九建筑工地找到了担任材料保管员的差事，白天运进工地的材料要清点登记，开具发票，晚上要守护材料及工地其他杂物，每天工钱两元。一个多月后区教育局聘用我到诺布林卡参与中学生藏语文教材整编工作，每月工资为一百元。在此机构工作期间由于西藏大学缺少教师，区教育局借调我到西藏大学，担任摄类学和因明学教师六个月。六个月后又延长聘用期，工资增到一百二十元，先后当了两年聘用教师。

按道理讲因明学是拉然巴格西必修的一门功课，可经历这么多年的波折后，很多细节我都遗忘了，因此担任教师期间颇费脑筋，曾多次找色拉米寺院塔庆老师帮忙复习。

在西藏大学任教期间，区政协发函召集原西藏政府官员、仁波切等具有一定职位的人员参加。那次会上与会人员投票选举我为区政协委员。如此一来，本人得到了为民族发挥微薄之力的大好机会。

## 十九、 维护古老文化立大论讲修院； 历经劫难深知西藏文物价值

一九八二年召开的区政协会议上，我被推选为拉萨市政协委员后，便辞去西藏大学的聘用教师职位，开始到市政协上班。安排给我的主要工作是通过调查和考究资料，整理编写拉萨市和所辖各县的不同时期历史。负责指导这一工作的是著名藏学大师东噶·洛桑赤列仁波切。收集整编的主要科目有地方名称，辖属拉萨的宗教、政治、军事等领域的著名人物及事件、著名湖泊、植被、珍稀飞禽走兽的分布种类等。不过这个机构只能说是因应潮流曇花一现，仅至一九八八年年底便以关门告终。

我在一九八二年成为市政协委员后，继而被任命为全国佛协西藏分会理事、市民族宗教局佛教协会常务理事等职。这段期间到拉萨市管辖的八个县了解各地寺院的历史和文物保护状况。参与色拉、哲蚌、甘丹三大寺民管会委员整顿及监督选举正副主任的工作，并得到发表意见建议的机会。

一九八五年年底，佛协会中纷纷议论的是对各寺院整顿的反映，尤其是对限定条件招收僧侣的做法提出了不同意见。自治区副书记巴桑准备参加监考各寺僧侣时，各寺院内好多老僧对此强烈表示，妇女担任寺院监考官是藏传佛教历史上的旷古奇闻，这样做完全不适合宗教惯例。此事由民宗委主任袁确达杰在会上作了汇报。

因受这一僧众的强烈反应，便指派了我等有仁波切名号者担任监考，我与宗教局的几名干部负责色拉寺考场。政府规定的招僧条件有年龄、道德、基础文化等的限制。那天我身为主考官根本没有理会这些条件，凡是愿意出家者全部录取，而且没有遭到干部们的反对，后来也没有招致任何麻烦。

一般，处理寺院的各项事宜由局长和党员们说了算，其他机构成员仅仅充当陪伴的角色而已。但是，我下乡入寺时主要强调开展宗教活动，维护道德、戒律等方面的事宜，并为解决招僧，建立禅院等一些主要问题上，不顾及各县有关干部的阻挠约束，尽己所能地做出了努力。比如：哲贡迪寺按传统建立禅院被墨竹县阻挠一事，我在区佛协大会上提出过反对意见。我说，四大

寺和其他寺院不仅要按传统广泛进行闻思修五部大论，而且萨迦、宁玛、格鲁三大教派也要按传统建立禅修院。否则，开放寺院仅仅是徒具虚名，这不符合党的宗教政策，应该要大力支持传统宗教的复兴做出努力。我的意见得到了与会代表的完全赞同，会议还推选我为自治区佛协理事，负责理事会日常事务；征求各方意见，为理事会建言献策等工作。当时我还告诉哲贡迪寺的代表丹增，返回原地后尽快建立几座禅修院，如果墨竹贡嘎县来阻挠，就要说明这是通过自治区佛协会办理。当时大胆履行宗教政策的实质精神，顺利展开宗教领域的各项事务做出了不少的努力。

一九八六年，恢复举行拉萨大愿法会时，为了让元宵供会等大愿法会期间的各项活动能够得到圆满，成立法会领导小组办公室，由热地和策门林丹增赤列担任正副主任，我来负责元宵供会，元宵供品的准备工作主要由迪朱仁波切负责。那年大愿法会元宵供会的造供师<sup>26</sup>由本人挑选。一切工作准备完成后，由於负责这一工作的某些人不识时务地摆起官僚臭架子，恶语粗言对待聘请来的造供师，结果造成造供师停工。当时本人利用政教二者上的职权，恩威并施，最后才把这项工作有

---

26 制造供神祭品的僧侣。

头有尾地得到圆满完成。

不久，西藏日报社来电告知宗教事务局，人民日报记者将要采访我。那天下午针对有关西藏问题对我进行了近五个小时的采访，并由佛协主任顿珠次仁和副主任丹曲担任翻译。当时人民日报记者问我：“你对目前中央政府的宗教政策有什么看法？”本人回答，中央一贯坚持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虽然，共产党自己不信教，但它不停地宣扬，在保护民众的宗教信仰自由权，人人有信教或不信教的权利。尽管如此，在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帮横行期间，给整个藏区带来了难以挽回的巨大损失。尤其是宗教的根基寺院、文物、僧团，均被当成攻击对象而遭到了毁灭性打击，寺院被捣毁，佛像经书法器均遗失灭迹，信教僧众被当作牛鬼蛇神遭到了残酷迫害，连西藏的藏医学名著《四续部》以及藏语文文法都被篡改。四人帮垮台文革结束后，虽然，党中央及时推出了清除左倾毒素，拨乱反正归本重定的平反政策，但之前的恶劣影响和思维观念至今还依然存在，在西藏宗教领域里这种影响更为显著，比如；在一九八三年全国开展严打过程中，甘丹寺再次遭受打击，成了首当其冲的严打对象，这些事情也许中央政府知道吧。现在藏人能够享受的宗教信仰自由，只不过是手摇经轮，念佛绕

寺，膜拜顶礼，仅一些表面仪式而已。对招纳新僧和继承传统，兴办寺院等实质问题上，不仅得不到政府的支持，而且处处受到阻挠和约束，甚至进行打击、取缔等的障碍和困扰。因此，我对中央一贯坚持的宗教政策有许多疑虑和担心，文革四人帮遗留下来的思想毒素到底能不能彻底清理？我怀疑党的宗教政策能否真正实事求是地兑现落实？

记者又问：“中央为维修藏区寺院拨下鉅款，并且许多寺庙也已经得到了修复，对此你有何感想？”

我的答复是，寺院是僧侣对佛陀教法进行闻、思、修的场所，僧众要按优良传统对佛教深奥的内涵进行讲、辨、著作。这样才可称得上是名符其实的寺院，中央针对寺院投入的资金也会立竿见影。仅仅营造一个花花绿绿的空壳，里面摆放几个佛像再安置几个护寺僧人，被称为“高度重视宗教事务，保护和恢复藏传佛教”，岂不是自欺欺人徒具虚名吗？这样岂能保护藏传佛教，岂能令藏族信众满意？在中央正确的宗教政策指引下，抢救和复苏藏传佛教的关键问题，我认为要彻底发挥人才的作用。要想顺利正确地恢复发展藏传佛教，首先要彻底发挥骨干人才的引导作用，既可以让国内的

佛教学者人尽其才，也可以让国外的多年研习藏传佛教的大学者们回国发挥其专业作用。如此一来可以很好地落实兑现党的宗教政策，并且为地方的稳定和建设能够产生积极的作用。可是，现在的许多做法恰恰违背了传统规律，从前五六岁开始就可以出家入寺，开始学习藏文字母乃至基础文化，到十几岁时就要开始上法相课，之后逐级晋升，优胜劣汰慢慢步入顶级行列。现在想入寺为僧按政策规定必须要年满十八岁，我想在藏区也许在曲意执行中央的宗教政策。总之，处处充满障碍和荆棘。

记者问：“中央为了西藏的发展投入了巨大资金，相比之下我们也知道旧西藏是极其落后的，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我回答，目前西藏最明显的建设成就，也就是各大城镇盖了很多汉式的水泥楼房，就拉萨而言，以前渺无人烟的羌塘<sup>27</sup>现在盖满了一排排水泥房子。但需要说明的是，居住在这些房子里的人全都是政府的公务员和外来的汉族，城镇藏族居民的住房条件直到目前还很简陋破旧。再说完全脱离了藏民族的建筑风格，给人的感

觉像是到了内地的某个城市一样。各大寺院的维修也只是几个主殿和门面粉饰而已，实际千疮百孔的破败景象没有得到改变。当前，自治区的领导们仅拿这些成就，通过媒体大力宣传西藏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等，藏人都很反感这种言不符实，夸夸其谈的欺骗宣传。我想如此下去西藏人民会对党的政策失去信心，也会对祖国大家庭失去信心，会对民族和个人前途产生忧虑。今天我谈的只是个别例子，我对现任自治区和拉萨市领导根本没有信心，你们二位是中央媒体记者，所以，才毫不隐瞒地向你们吐露了心里话，希望中央能听到这些话，并能有所改变。

一九八六年初，十世班禅大师到西藏视察工作，某天在市委召开了以仁波切为首的五十余人的一个会议。我以佛协领导成员的名义受命参加该会议，并作了十五分钟的工作汇报，汇报的主要内容为，各寺院尤其是三大寺有必要取消目前招收新僧时限制年龄的政策规定，并且要允许除西藏自治区以外的藏区僧人按传统加入三大寺。另外，甘丹寺遗失的鎏金《丹珠尔》目前仍在内地，甘丹色吾唐<sup>28</sup>目前在诺布林卡，希望能完璧归赵，物归原寺。后来，我所说的——得到了落实。在

会上班禅大师很严厉地质问当时的拉萨市委书记杨有才：“八三年你们派军队到宗喀巴大师建立的甘丹寺，毒打关押大批僧人，还任命那些没有资格，不受欢迎的人来领导寺院，这是怎么回事？”杨有才当场表示八三年确实对甘丹寺采取了一些过分的措施，类似事情今后保证予以纠正。但班禅大师仍然声色俱厉地说：“不要老说今后纠正而拖延时日，应该马上解决，中央正在调查这些事情。”当晚在政协举行的晚宴上杨有才特意走到我旁边说：“会尽快进行甘丹寺的整顿，到时候我们一起做这个工作。”我对他说，不符合藏民族根本利益的事，同样是违背中央基本政策。所以说，整顿是非常必要的。

其实杨有才的保证和整顿只不过是逢场作戏，班禅大师离藏后，他们不仅没有对寺院人选给予整顿，而且大张旗鼓地开展了针对性的爱国主义教育等政治运动。这样，再次惊动了班禅大师，他在第二年的大愿法会前夕专门打电话质问当时担任自治区主任的热地：“你们到现在还没有解决甘丹寺主任一事，到底有什么理由？如果不能做出合理解释，今天就把那个洛桑诺拉的甘丹寺主任职务给我撤下来。”自治区领导不敢公然抗命大师的旨意，立即把甘丹寺主任调离了。法会结束

后宗教局正副局长强巴、旦曲、白马，以及我在内的四人，负责整顿甘丹寺的领导人选一事。为了充分体现民意，确实通过民主途径选拔民管会领导，我尽己所能，而且如愿以偿地达到了预期目的。

整顿工作基本结束后，政协让我与其他代表一起到内地观摩了两个月。返回后按惯例让我在大会上报告观摩后的感受，也就是经验交流报告。我根据自己亲眼所见实事求是地侧重宗教方面的一些问题做了汇报，我说，众所周知内地现在的经济建设日新月异蒸蒸日上，这些不必讲了，我见到内地许多地方的寺庙在文革中并没有遭到破坏，据说只驱散了和尚尼姑，许多古刹庙宇现在依然还在。见此情景联想到整个藏区的六七千座寺庙几乎无一幸免地遭到毁灭的惨状，心里确实感到了无限的悲哀。同样的风浪下汉族人民知道保护自己的历史遗迹和珍贵的文化遗产，而藏人的有些做法我确实感到不可理喻。通过此次参观我觉得藏族有很多地方需要向汉族人民学习，比如：理想奋斗、民族自尊、承担社会责任和义务、辨别是非等等。藏族也被誉为是勤劳勇敢的民族，这要兑现在社会活动当中，要自立自强、增强责任义务和是非观念。只要藏人认真去做，我相信汉族人民能做到的，藏族人民也能做得到。

## 二十、复制外宣藏事公文； 一代新人再添希望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局动荡令不少藏族同胞避难逃亡到国外，直至1987年5月，我第一次见到的流亡藏人，是从意大利来的格西强巴嘉措，及陪同他的意大利宗教团体的两名僧人和一名在家人，他们前来拜访我。我想，这是西藏境内的许多困境向外界传达并赢取舆论声援的一次机会。因此，特意安排在僧人图登次仁家中热情接待他们。彼此寒暄问候之后，我询问他们，时局的趋向和西藏未来的命运将会发生何种转变？至今我们把解决西藏问题的希望，寄托在嘉瓦仁波切（达赖喇嘛尊者）和你们国外藏胞身上。然而，现实并非如意，据说为西藏问题呕心沥血、锲而不舍的唯有嘉瓦仁波切一人，其他尤其在印度具有经济实力的团体与个人，只关心修建自己的华丽寺庙、康村、住房等，安居享乐，却不怎么关心西藏民族的政教前途和返回雪域故乡等问题，这是不是真的？格西强巴嘉措很慎重地回答道：“国外许多富豪施主为修建藏传佛教寺院确实提供了许多资金，这些资金用来修建主殿僧舍之外，余下的

要作为出家人生计本钱，要不然寺院没有别的经济来源。另外，多年漂泊他乡谁不想返回故土，承蒙达赖喇嘛尊者的恩德，我们很快能返回故乡，阖家团聚，西藏一定会发生可喜变化，这一点你放心吧！”我要求他们回去后尽快把西藏的厄运和目前的危难状况及时禀报嘉瓦仁波切和西藏流亡政府，并且希望他们向所到之处的政府和人民大力宣传西藏问题，彻底揭露中共在西藏肆无忌惮的恶劣行径，争取各国知识份子和媒体为西藏问题的早日解决，提供强而有力的支援，这是全体藏人的根本愿望。我说，西藏这只气息奄奄的羊羔如果不能尽快脱离狼口，命不久矣！他们用摄像机录制了我们谈话的全部过程。僧人图登次仁也是一九五九年参加过抵抗运动，后来受尽多年的牢狱折磨，始终关心西藏民族前途命运的一名敢於奉献的藏人。这一问题上他也谈了很多。

一九八九年九月二十七日早上十点，一群年轻僧人沿著巴廓街，一边高呼“西藏独立！”；“达赖喇嘛万岁！”等口号，一边举行了抗议游行。目睹这一壮举由衷感到激动振奋，压抑许久的沉闷心情顿时开朗了许多。我疾步如飞地到慕如寺向护法神敬供一碗神酒，便急忙返回打算看个究竟。可是，返回原地游行的僧侣们

都已经离开了，听街上的行人议论，他们是哲蚌寺僧人。也得知市民没有配合他们的行动，顿时我感到伤心，不觉眼泪浸湿了我的眼眶。

九月二十九日，我们宗教局和佛协应邀参加色拉寺的夏坐休沐宴会<sup>29</sup>时，听色拉寺僧人们的相互对话，其中有人说：“人们常说色拉乞丐面粥未开却沸沸扬扬，哲蚌尼姑面粥开而无声无息。但这个说法这次恰恰给颠倒了，我们步人后尘了。”见此情形当时我暗想，色拉僧人此后两三天内肯定将要行动了，不知甘丹会怎么样？以前水蛇年的抗共活动，甘丹寺表现十分突出，可这次我担心可能会落后了。

果不其然，1987年10月1日早晨，便听到色拉寺僧人在巴廓街举行示威游行的消息，也有人电话通知了宗教局，这一消息引起了办公室一片骚动。回族马主任气喘吁吁地说：“完了，完了！乱套了！”局长和下属干部们气急败坏地都都嚷嚷：“这些僧人如此安逸还蹦跶什么啊，准没有好下场。”我表面装作焦急的样子，可内心充满了惊喜，惊喜得简直像期盼已久的梦想终于实现了。从此为了应急，我在办公室守夜班，主要任务是

---

29 佛教徒在举行夏令安居的长期宗教活动结束后安排的休假宴会。

坚守电话消息。一次，跟我搭班守夜的人是宗教局以前领导我的老相识胡洋，他焦躁不安地问我：“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呢？要不明后天你去色拉和哲蚌寺去教育教育那些不听话的僧人，他们尊重你，只要你去规劝，他们一定会听你的。”我对他说，就算他们尊重我，可是，这次无论怎样，他们肯定不会听我的，原因是他们跟我们的立场不同。胡同意我的看法。那晚他坐卧不安，频频从门窗往外观察动静，也不知整夜是否睡了觉，而我却躺在床上酣然入睡了。

连续发生游行事件后的一天，由毛如柏主持召开自治区统战会议，他要求参会代表就社会稳定；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反分裂议题等发表各自意见。当时桑顶多吉帕姆带头讲道：“我们各条战线的革命队伍遭到了分裂主义分子的疯狂攻击，此时此刻我们要去慰问在一线战斗的全体指战员，要针锋相对地反对分裂主义分子，要坚决打击他们的嚣张气焰和破坏行为……”紧接着与会代表们接二连三地发表意见，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自己完全站在共产党的立场。只有坐在我身边的色拉格西益西旺久说：“我们是来自各战线的民众代表，想民众之所想，急民众之所急，与民众共患难是我们身为民众代表的责任和义务。因此，我们同样应当要安抚慰问

动乱中受到伤害和损失的群众，有责任把他们的呼声和诉求反映给政府。”我们挨坐一起，他讲完后自然轮到我了。我说，目前社会治安相当混乱，尤其频频发生的偷盗抢劫事件对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直接威胁，对此如果政府不能采取及时果断有效的措施，就会危及社会秩序和西藏的长治久安。很显然，毛如柏对我们同上述大相径庭的意见感到很不满，他对多数代表畅所欲言分辨敌我立场的表现大加赞誉，并做出肯定和表扬。最后毛说：“宇鲁达瓦次仁和益西旺久两人模稜两可、是非含糊的观点是不足取的，我们要认真分析这种立场不够坚定的思想根源，要清晰分辨敌我立场和是非观念是我们统一战线代表的前提要素，一定要牢记在心。”

之后，政协办公室又接到电话通知，甘丹寺僧人又准备到拉萨市举行游行被达孜县公安武警中途拦截了。为了应对层出不穷的动乱和严峻事态，当局前后向色拉和哲蚌寺各派遣了五十名工作队干部。当胡洋局长等人组成的工作队傍晚进入哲蚌寺时，遭到哲蚌僧人的阻拦并抛掷石块，最后把他们赶了回来。第二天早上市委专程通知我，跟我细说甘丹寺发生的事情，为了给工作队开路，他要我和其他人先到甘丹寺说服僧人。我对市统战部王部长说明了难以从命的理由，我说，我

们这些人平时只不过是办公室里的抹布，只管递信传话之外没有屁大的权力。所以，如此关键时刻，我们这些说话不管用的马仔怎么可以在此时打肿脸充胖子呢？说到这，自治区统战部张部长正好打电话叫我过去。一进他办公室张部长满面笑容地与我握手说，这次无论如何要我们一起去甘丹寺去。之后策门林丹增赤列也叫过来了，经他建议同诺布林卡的格西益西旺久也一同叫去了。我们几人驱车赶往寺院路经达孜县，该县县委书记嘉措热情地与我握手说：“你们到这里就好说了，这次事件也不能全怪僧人，因为工作队天黑进寺引起了寺院方面的误会，希望通过你们来做工作，相信从此政府与寺院之间能够扎西德勒<sup>30</sup>，这次政府绝对不能再骚扰寺院。”他说这次政府不能再骚扰的意思说明之前确实骚扰过，这难道还需要怀疑吗？

我们刚到甘丹寺民管会门口，大批僧人多数是年轻僧人从四面围拢过来，看此情形，如果没有我和益西旺久在场，他们真的像赶走胡洋他们一样把我们也赶下山。之后召集僧众会议，首先格西益西旺久做了开导性讲话，他说解决问题的前提必须通过和平方式才能对彼此有益，要理性地表达意见和诉求，过激情绪和行为只

30 藏语，如愿吉祥或万事大吉的意思。

会招致祸端，适得其反……。僧众纷纷控诉共产党对出家人和寺院的镇压和打击，他们手指着满目疮痍的寺庙废墟，哭诉著从一九五九年直至一九八三年众多僧人遭受的斑斑血泪史，听著无不催人落泪痛彻心肺。过后我对他们讲，我理解你们，你们的举动确实迫於无奈，不过要明白制造骚乱除了个人和寺院吃亏之外，不会达到任何目的。倒不如依据党的宗教政策所赋予的权利，以正确途径，有什么苦衷可以向进寺展开教育的国家干部公开公正地进行陈述和诉愿，绝对不能选择动手闹事等极端做法，这种思维绝对不符合目前的局势，要审时度势趋利避害地争取权益，得到自我保护。有权利要求反省纠正过去的错误，同时要不失时机地抓住当前随著社会发展的趋势而呈现出的争取民族和民众实质利益的契机，而且还要学习研究历史进程中的客观事实。要坚定政治立场维护本民族的根本利益，努力争取民族和个人的未来前途。这些完全符合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基本精神，一定要竭尽所能地进行争取。更为重要的是要清醒认识到自己的身份和根源，而后应该争取做一名问心无愧的藏传佛教传人，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和义务，要把前辈们千年沿传下来的宝贵遗产尽全力继承下来，同时一定要继续发扬光大。

会后，一名僧人找我哭诉寺院的公车被达孜县扣押，这等於掐断了僧众的生活来源，他说我是该寺院的喇嘛，一定要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事实上我哪有解决此类问题的权利，但我义不容辞地马上求助平时关系甚好的工作组年轻队员旺堆次仁，他通过市委与对方几次交涉后，最终得到了解决。不久三大寺和上下密院等规模较大的寺院主任和部分工作组成员集中在昌都办事处，准备通过为期三个月的政治思想教育，来彻底了解和摸清寺院内部的政治，经济，以及立场等深层次问题，但教育进展很不顺利，没有达到预期目的。领导成员之一的宗教局长强巴托病请假，并举荐由我来代替他，但我以自己的政治水平和素质难以服众为由推辞了。

一九八七年十月二十六日及十二月十五日晚，先后两次市公安局三名警察到宗教局办公室搜查我的办公桌抽屉，搜取几件东西后把我带到我的住处，又搜查了宿舍房间，连房梁墙壁都没有放过，凡是写有文字的纸张全都拿走了。当晚夜幕降落不久他们拘捕了我，没有做任何解释，直接戴上手铐将我押入囚车，关进了位於下桑益的区公安厅看守所。我心想，这下子又变成了囚犯，二进宫了，但心情坦然，问心无愧。他们从我

办公抽屉搜走的东西中稍有价值的是热振摄政王通过吴忠信写给蒋介石的一封信，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就两张残缺不全的信纸上潦草地写著几行字，标题是“呈中国总统蒋介石”，之后是“为此次达赖喇嘛坐床仪式特派遣内务大臣吴忠信，各项事宜顺利圆满。赠予本人的信件礼品也均收悉，谨此一併致谢！”内容只有这么多。这封信是我在整理市统战部的三箱旧信件时发现的，当时认为这是个重要的历史资料，所以，准备捐给在印度的西藏流亡政府，正巧近日有熟人要到印度，并约定了时间来领取这份资料，却在这个当下被他们搜走了。另外，还有1913年藏蒙签订的盟约和宣告独立的复印本，以及目前流亡西藏政府的机构设置和运作简介。后两个材料是图登坚参给我的，这是属於境外宣传的材料。

审讯我的重点是那封信的来源，他们说这是极具价值的中国历史资料，窃取它究竟意欲何为？一个多月里反覆追问偷窃这封信的动机目的，我始终避重就轻地应付著。至於境外宣传资料的问题，起初我一口咬定是在林卡路上捡到的，但遇到了无法回避又难以自圆其说的障碍，这两份资料上有图登坚参的亲笔签字，事后图登坚参也被捕入狱了。实际上我这次被抓的主要原因不

是上述问题，而是之前我和僧人图登次仁对著摄影镜头宣传西藏问题的影像带落到了公安手中，上述那些资料只是他们搜查当中的意外“收获”而已。僧人图登次仁也同时遭到被捕，不足为奇。

审讯时间一般都在下半夜又恰恰是高原的寒冬腊月季节，由於长时间挨冻受寒因而引发肠肾固疾。审讯的内容和话题只有这么多，彼此总是围绕这么几件事情来回推磨。这期间睡梦中总是梦见已故多年的那些熟人，心想这梦境可能是不久将会死在监狱的前兆，不过心情依然很坦荡，没有什么搁不下的心事。我被关押之后，在市公安局工作的侄子格桑达瓦还穿着警服曾几次前来看望我，并送来了裤子、大衣、肉干等。后来单位对他做出了扣工资、降级警告等处分。

某夜似梦似幻的意境中看见看守所达杰所长蹑手蹑脚地来到我身旁，猛然紧紧掐住了我的脖子，我蓦地被吓醒过来，感觉呼吸困难，心脏剧烈跳动近半个小时。此后一个多月心跳异常频急，喘气不顺，胸口发闷，非常难受。不过心中总认为，这样死去此生已经足矣，尤其觉得下半生更值得自豪。托嘉瓦仁波切的福，来世绝不会堕入地狱。每当审讯的时候，心里总会默默

祈求，并观想著本尊吉祥天母和犀甲护法神时刻在身边，在关押期间早晚祈诵从未间断过。一天晚上，看守所里里外外打扫干净后，两名警察拽住我的左右胳膊将我押了出去，看此架势预感大难临头了。他们把我押送到一间临时设置的法庭，在那里早有两名法官和其他官员，以及拍片记者在等著我。接著庭审开始，法官询问我的年龄、籍贯、工作单位等基本情况，而记者拍摄了全部的审问过程。

大约一个礼拜之后，两名拉萨妇女拿著酥油茶和食品专程前来探视我，她俩一见到我惊喜地叫道：“古秀<sup>31</sup>宇鲁啦还依然健在！拉萨市民都传说你已经被迫害致死了，市民们都拥挤到大昭寺和小昭寺为你致祭，有人还说已满头七呢！”听到拉萨居民如此关切自己，一时百感交集，两眼涌出泪水，硬咽著说不出话来了，他们如此在乎我的这么一点付出，我因而倍受感动和欣慰，同时更增添了战胜困境的信心。此后，我的亲戚陆续来探监时，我每次都表现一付满不在乎的样子，我不想让他们看见我被打入监狱后凄凉悲伤的样子。

我被单独囚禁几个月后，一九八七年藏历十二

---

31 藏语，对有学问有声望的人的敬称。

月，公安厅的吴坚厅长亲自出马审讯我，他说还有不少问题没有交代清楚，应该要主动交待，争取在大愿法会举行之前返回原单位工作。他连续三天老是围绕没有交代清楚的话题盘问个没完没了，但我把自己做过的事情已经全数交待了，也都做了笔录，再怎么逼问已经没有什么可讲的了。之后的一天中午，自治区领导次忠和杨有才到监狱视察，我曾与他们有过谋面之交，所以对我说：“我们的这位同志迷失方向，陷入了歧途，实在很可惜呀。司法机关已经完全掌握了你的犯罪证据，眼下唯一的出路是彻底坦白争取宽大，只要积极主动争取立功，我们仍可以成为战友。”他们装出一付对我的表现感到莫大痛惜和不解的样子离开了。

正在举行大愿法会期间吴坚厅长又来提审我，他说：“达瓦次仁你到底想什么？我们苦口婆心地规劝你多少次了，你仍然执迷不悟？你原单位的同志们正在开开心心地主持法会，可你在监狱，这全是你自找的，咎由自取，活该。”接著我们对吵了半天有关新旧社会举行大愿法会的隆重程度，既有趣又可笑，是他自己为了打击我的心理而开了这个话题。他说今年的法会盛况空前，足有两千多名僧人参加，其开销在旧社会是难以想想等等。我听后不服，反驳说旧西藏社会仅参加法会的

便有两万多名僧人，所供奉的财物份子就有三万多件，不仅大昭寺的每个角落和整个巴廓街被参加法会的僧人挤得水泄不通，而且热堆、上下密院、米如、习迪、朗杰寺、乃琼寺等也是布施供养范围，还有阿塔杰三寺和山南的颂若林寺等。他当然不想理会我说的话，可我只想说明这些事实，如果不相信我说的话，拉萨还有很多老年人，而且洛桑丹增大师还健在，他对这方面很了解，你去问问他们吧。最后他说，今天大半天时间只是宇鲁吹牛皮给白白浪费了。说着表情无奈的样子，摇摇头回去了。

据说当天电视台一开始现场直播了大愿法会，但迎请弥勒佛法尊时，不知何故影像突然中断了。关在我隔壁的是哲蚌寺僧人图登平措，我们虽不能见到彼此的脸面，但可以对话。我们正在议论今年法会的现场直播为什么会突然中断的话题时，管教员拉巴拿著脚镣先打开图登平措的门，一边用脚镣铐住他的双脚，一边吼叫著，一边狠狠地甩打，“谁让你们随便讲话……”接下来，便轮到我挨打，从此我们便被隔开了。

## 二十一、被捕后宣布罪过； 开庭判处有期徒刑

坚持博弈的结果我再度被打入了扎基高墙内，又一次开始了失去自由的囚徒生活。1988年3月9日早晨，看守所的干部异常忙碌，稍后我们连早饭都没有吃，就被戴上手铐用卡车押解出去了。我默默安慰自己，这一切都是为了民族、为了正义，纵然今天被他们秘密处决也问心无愧死而无憾。我暗暗向诸佛菩萨，本尊度母以及尊者达赖喇嘛、怙主帕旺卡、怙主赤江仁波切等作了祷告。

汽车驶向了位於拉萨东郊的古匣监狱方向，古匣监狱布满了大量严阵以待的全副武装的士兵，整座监狱置於武力控制之下。召集犯人大会会场四周张贴的布告显示：“直接参与拉萨骚乱事件的三名罪犯，於1988年3月9日早上，由拉萨市公安局依法逮捕。”随后，把我们押入会场宣读了罪状和逮捕令：“被告达瓦次仁现年五十一岁，系拉萨市达孜县拉木区朱茜乡人。一九五九年因参加叛乱被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一九七九年

获得特释，一九八二年委任为拉萨市政协委员；全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理事；拉萨市佛教协会常务理事。被告不珍惜难得的前途执意坚持反动立场，前后搜集复印反动宣传资料，并于1987年7月29日，串同罪犯图登次仁对佯装游客窜入拉萨的国外反动分子发表西藏独立等反动言论，恶毒污蔑党和政府的政策措施。1987年12月26日，与国外反动分子勾结，实施反革命宣传煽动，意图推翻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被拉萨市公安局依法收容审查。经过审查达瓦次仁对国外反动分子发表反动言论的动机目的陈述说，其一、向达赖等人传递境内讯息，其二、赢取国际支援尽快实现西藏独立。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本人供认不讳。经人民检察院检察认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零二条第二款之规定，被告达瓦次仁触犯刑律，犯有反革命煽动罪，特批准由公安机关依法实施逮捕，并提交人民法院进行审判。”

当天，在古匣监狱看见许多头脚包扎的年轻僧人被军警来回押解，我推测可能迎请弥勒法尊时发生过重大冲突。押回原看守所后，当天的藏文报证实了我的推测，而且该报第三版报导的全是我的罪状—原拉萨市政协委员，全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理事，披著宗教外衣

的分裂主义分子甘丹寺仁波切宇鲁·达瓦次仁被依法逮捕。

当晚吴坚厅长偕同另一名警官又来审问我，他说：“我们先后几次希望你悬崖勒马改过自新，可你就是不听，不彻底交待问题导致了今天被逮捕的结局。不过现在还有机会，只要坦白立功洗清瑕疵污点，依然能获得美好的前途。三大寺的反动组织肯定与你有联系。另外，政协机构里肯定有人跟你有过犯罪牵连，这些问题最好说清楚，即使你不交待我们也能查出来，到时候你会坐失立功机会。”我的回答依然是，该说的已经都说了，其他事情一概不知道。最后，吴坚气恼而又无奈地大声训斥到：“你就傻等著幻想中的独立，老死在监狱里吧。”从此吴坚厅长再也没有来，只有检察院和法院的人为了核对案情传达法庭通知书来过两次，并只对某些细节重新审问之外，详细交待我庭审过程中应该注意的事项，没有像吴坚厅长那样逼供子虚乌有的罪行。

半个月后的一天早上，两个武警把我押入卡车，车子绕著诺布林卡开进了武警总队大院，武警总队礼堂里召集各单位干部，把我和僧人图登次仁关进被告铁笼

进行了开庭审判。七天之后我和图登次仁，一同关在该看守所的山南人甘丹寺僧人旺扎、墨竹平措坚参、巴须加塔、嘉玛贡桑次仁、墨竹尊追塔庆、拉莫琼达、嘉玛次仁、甘丹寺恰村的次仁索朗、嘉玛札西、嘉玛班典、嘉玛巴桑、嘉玛索朗等甘丹寺僧人，以及从古匝监狱押来的西藏大学学生洛桑丹增、拉萨居民索朗王堆等二十多人，被铐上手铐再次带到武警总队礼堂，让我们面对审判席排成一排站在下面，接著宣读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判决书，我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甘丹寺嘉玛班典、僧人嘉玛巴桑、嘉玛索朗三人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期两年执行，当场释放。

当天，押解我们的武警士兵无故殴打僧人，用枪托打断了甘丹次仁索朗的三根肋骨、嘉玛札西的右肩骨，还拳脚相加乱打乱踢，打伤了巴须加塔的下体。另外，不少人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毒打。对如此骄横残暴的野蛮行为，我们集体提出过抗议，但结果没人理会，连一句安慰话都没有听到。

看守所的一名汉族官员唤我到审讯室专门上了一堂政治课：“你们蹦跶的结局如何？我们共产党从帝国主义的枷锁下解救了西藏，百万翻身农奴盼到了当家

做主的好日子。从前旧西藏连个电灯都见不到的黑暗时代，现在已经彻底改观，兴建了大型电站和学校医院等重点公共设施，可以说西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前在封建农奴主的黑暗统治下，甭说目睹汽车，连个像样的骡马道都没有。可现在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随著推进建设新西藏的宏伟目标，已经修建了纵横千万里的宽敞大道，各种车辆络绎不绝地奔驰在千里平坦的公路上。概括而论，西藏从贫穷落后跨越到了今天的先进发展水平。但是，在一贯不愿看到中国发达的西方敌对势力的撑腰下，少数分裂主义分子千方百计地在扰乱西藏稳定团结的政治局面，阻挠破坏西藏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妄想重演那臭气熏天的农奴主社会制度。就因为你们总是与历史发展背道而驰，才尝到了如此失败的恶果。事实上，你们从一九五九年起步步迈向了必败的错误道路，由此今后应该要面对事实吸取教训，好好改造自己的思想。”那位汉族官员夸夸其谈，一口气背诵了中共干部常挂在嘴边的那一套口头禅，以幸灾乐祸的戏虐口吻对我等的信念贬低耻笑了一番。对他的这种华而不实令人反感的政治夸张宣传我反驳道，你这种说法是缺乏实事求是态度的偏颇抽象认识，或者说你根本对西藏知之甚少。落后只是西藏问题的一个方

面，也是表面问题，其实西藏是个幅员辽阔、资源丰富，蕴含著无穷宝藏令人垂涎，充满神奇的宝地，哪能单凭表象以偏盖一切做出如此草率结论呢。藏民族是个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民族，有自己独特思想和思维习俗，有自己的语言文字，生活方式。同样，藏文化、藏医学、藏传佛教等都堪称是世界文化瑰宝，内涵人类文明的精华。一概定论西藏没有学校，没有医院乃至诋毁为一无所有、漆黑一片的荒蛮之地，这既不符合事实，也是对藏民族和西藏人民的恶毒污蔑，是拿大汉族主义孤傲歧视心态看待少数民族的认识观点。早在一九二八年，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尊者领导西藏时期已经有了电站、电报局等高原现代化设备。尽管由於种种因素，尤其是交通因素而迟迟未能得到发展，但行动本身宣告了藏人迈向现代化的决心和觉醒。我想随著整个人类的现代化普及，西藏迟早也会迈向现代化，只不过是时间问题。中国也不是近期才迈向现代化吗？他哑口无言地听完我的陈词，蓦地一拳砸在桌子上：“你这个顽固不化的狗东西竟敢跟我叫板，你就坚持你的反动立场吧！”他怒不可遏地痛骂我是扶不上墙的烂泥，破口大骂一番后才让我“滚回”禁闭室。

## 二十二、札基监狱增设第五队； 办公楼前石板被血染

一九八九年藏历新年来临之际，我与图登次仁被移送到了札基监狱。岁月如流，人生似梦，犹记得一九七九年三月中共司法官员在此大声宣布：“从今以后你们再也不是犯人了。”我们欣喜若狂地离开这座监狱至今整整过了十年，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又以同样的罪名性质再度返回了这座监狱。今天的札基监狱与从前相比有了巨大变化，以前的周边土砖防护墙现在改换成了水泥石头混合砌造，墙顶用铁丝网层层密布既高大又坚固。牢狱高墙阴森恐怖，令人望而生畏。

现在札基有四个队，第三队是女犯队，三个男犯队分别囚居在新修建的两排二层的牢房，只有女犯队牢房依然是1960年代建造的平房。监狱办公处从以前的旧军营搬迁到了原址前方新修建的一座三层办公楼，现在旧军营好像已经成了无人居住的荒凉空地。以前的不少老管教员现在仍在岗位，一九五九年关押的有些老犯人现在成了监狱职工，有当司机、修理工的。当年的著名

积极分子孜仲贝布益西图登，现在是看守监狱内院大门的管门老头。

刚进监狱我与图登次仁单独关在一间六十年代的旧房里，藏历年也是在这间老房子度过的。当时，一同关在扎基的政治犯好像只有达纳·晋美桑布、八三年的龙虎组织成员当智次塔，以及八七年拉萨动乱事件中，被指控为焚烧车辆主犯的拉萨小伙子边巴次仁，其余都是刑事犯，其中只有一两名六几年的老囚犯。我们被送到扎基的当天，外号称“锅底脸科长”的监狱管理科马科长<sup>32</sup>前来训话，他瞪大一双怒眼直瞅著我说：“喂！狗东西，你懂不懂廉耻，共产党给你安排工作职务，你却以怨报德，良心让狗吃了吗？以后劳改期间不准污染监狱空气，不准教坏其他刑事犯，拖他们下水，听见没有？”我连忙点头，啦嗦！啦嗦！<sup>33</sup>第二天，监狱总务处的政委巴桑老太太前来巡查是臭骂我：“你这个家伙老端著一副臭架子，你反倒以为自己是国家和人民的功臣吗？……”转身又痛骂我身旁的图登次仁：“你这个老东西，不好好在五支队拿工资当职工，枯朽入土之际还抱著幻想垂死挣扎，末了还把自己的臭尸又送到监狱

---

32 此人是那曲地区藏族。

33 藏語：是，是！表示答应。

来了，是不是？……”

3月15日，西藏国旗悬挂在大昭寺屋顶上的消息传到监狱时，当时我正牙痛难忍，听到这一消息后，兴奋得整夜睡不着觉，病痛也似乎减轻了许多。1988年3月5日，拉萨大规模游行示威中，被捕关押到各处看守所和古匣监狱的二十多名政治犯移送到了扎基，我们所有政治犯一起关押几天后分别安插到各刑事犯分队中，又开始了正式的监狱生活。

我与西藏大学学生洛桑丹增、老家山南的甘丹寺僧人旦巴旺扎等几人安插在一队，一队基本都是判了十年以上或无期死缓的重量级刑事犯。起初我的工作是翻土浇水整理菜园，之后让我协助一名汉族小伙子饲养四百多只鸡。

一九八九年九月二十九日，西藏电视、广播、日报等在同一时间的新闻报道称：“全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第五次常委第二次会议於一九八九年九月二十六日，做出了关于宇鲁·达瓦次仁、琼达二人从佛教协会除名的决定。宇鲁·达瓦次仁和原甘丹寺民管会副主任琼达，对分裂祖国为目的的拉萨骚乱事件进行过反革命煽

动宣传，其二人行为不仅触犯了我国宪法及有关法律，也违反了佛协条例的根本原则。因此，撤销二人原有一切职务的同时，特决定其二人由佛协部门除名。

与我同一座监狱的全是陌生的刑事犯，不过如何与犯人之间协调相处，避免不必要的摩擦和麻烦，以求自保方面，由于我是个经验丰富的老囚徒，所以，没有遇到过太多的难题。我的家人亲戚送来一大堆酥油、奶粉、白糖，为了表示友好，我在藏历4月13日，特意打了浓浓的酥油茶给一队所有犯人。但后来这件事情被一名汉族犯人报告了管教员，第二天马科长和札西科长传讯我到办公室训话。“你不经我们许可，擅自作主用酥油茶请客，意欲为何？是不是心怀叵测地利用摆阔、拉拢手段，妄图在监狱里继续推行分裂祖国的煽动宣传活动？”札西科长手里的电棒对著我的额头说：“你这个坏蛋，拉拢其他犯人究竟想搞什么阴谋？”很显然他们是在捕风捉影，要么是歪曲事实或小题大做，其实我只是想让大家一起分享这些东西，同时想改善与其他犯人之间的融洽关系，仅此而已。可是，他们不会相信或不接受这种解释，最后处分写检讨书，并在今后杜绝类似事情再度发生的保证书，还禁止探监一个月。但后来我通过他人给二队犯人供过一次甜茶的事却没有引起麻

烦。四队的政治犯索朗旺堆也因为对其他犯人供甜茶，遭到了中队管教西洛的训斥，并勒令写了检讨和保证书。

我们关押到扎基监狱不久，于一九八九年三月五日，拉萨发生了抗议事件，此后西藏自治区范围内的各地各县也由此陆续引发越来越多的西藏独立运动。在这一运动中被捕的诸多藏人遭到判刑。因此，移送到扎基监狱的政治犯与日俱增，又明显对刑事犯形成了传染政治影响的威胁。当时北京当局下令对拉萨实施军事戒严，分裂与反分裂严打与严判运动瞬间普及，变成了深入持久绝不留情的残酷打击运动。关押在各监狱内的政治犯首当其冲成了受害对象。针对紧张政治气氛的反应，一九九零年，扎基监狱新编成立第五队，也就是纯政治犯组成的一个队，原先分散安插在各个队里的政治犯集中到新编五队，还特意安插了十名对共产党忠心耿耿的刑事犯。从此犯人之间区分了等级，就连开会的时候刑事犯可以坐木凳，而政治犯却要坐在地上。管教干部对两种性质的犯人抱著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偏见，对政治犯动辄得咎，任何小事都习惯性地与政治性质相提并论，毒打、捆绑、禁闭、刑讯、逼供等各种残暴虐待手段，统统毫不留情地用到政治犯身上，政治

犯处境的残酷性难以用语言形容。那时对犯人进行严厉政治思想教育的同时，管教干部也定期学习接受时政教育，强调督促与分裂主义分子要展开最坚决的，针锋相对的殊死斗争。进而对政治犯无论老少、民族、名望，以及不管平时改造表现如何，若偶然发生琐碎小事，只要是政治犯便进行严厉打压，强迫让他们参加劳动、没收有宗教等内容的读物，这将成为干部个人的政绩，可以得到奖赏提拔，受这种诱惑的驱动下，对政治犯的打击迫害越发变本加厉，置政治犯於死地而后快。政治犯的谈话和行动时时处於严密监视之下，两名以上政治犯需要聚集劳动时会派一名刑犯中的积极分子来监督，绝不会让政治犯们单独活动。

一九九零年十二月十四日夜，我们政治犯成员拉萨小伙子拉巴次仁突然病死在囚室。他的死因其一是管教员不让他及时问诊治疗，说他装病抗改寻机偷懒；其二是病入膏肓之时医生仍不予救治，说他根本没有病。第二天噩耗传出后，政治犯们个个伤心悲痛，回想政治犯遭受的残酷虐待非人折磨，可以断定死者是遭到暴力毒打，体内受伤导致死亡的。他的死点燃了众人的满腔怒火，他的悲剧就是我们明天的结局，义愤填膺的政治犯们对如此暗无天日的处境已经忍无可忍，不少人认为

反正横死竖死都是死，与其束手待毙倒不如放手一搏。再说政治犯不同於普通罪犯，个个都是为民族的命运敢於呐喊、敢於献身的人。

当时经商议后，由我代笔向监狱督察处递交了一封请愿信。请愿信中提出三点要求：第一、允许政治犯的部分代表向拉巴次仁遗体致哀的同时，遗体要按藏族习俗天葬或水葬，并且由政治犯代表参与葬礼全过程；第二、如果遗体要移交其家属，要准许政治犯代表全程目睹移交过程，直至家属送葬为止；第三、要说明导致拉巴次仁死亡的真实原因。

我等几人递交请愿书返回时，拉萨人丹增、甘丹僧人巴须加塔、策门林边巴、哲蚌僧人嘉玛格桑等人，高举著床单上题写的“沉痛哀悼逝者拉巴次仁！”；“要改善在押政治犯待遇！”的横幅，偕领全体政治犯来到了办公楼门口。汉族干部小张挥手示意让我们待在队部场地不要起哄，随后几名管教出来对我们讲：“你们当中是不是死了一个人，死的那个是不是叫拉巴次仁？他的死与我们无关。”大伙纷纷大声反驳道：“我们的人明明病得很严重，可是你们竟然再三拒绝给他治疗，医生又不予救治，而且措姆医生还训斥他是无病呻

吟，结果导致了他的死亡，这等于是你们杀害了他，与你们有直接关系，你们要承担后果。”一开始管教员用恐吓态度追问提议聚会和题写横幅的发起人，他说这座监狱有史以来今天破天荒地第一次发生了如此聚众抗议事件，后果不堪设想。但绝望而愤怒的政治犯们无人理会那一套，僵持一段时间后，发现众人没有松动缓和迹象，管教员也看到政治犯们的异常情绪后，最终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态度温和地规劝我们，说监狱绝不会接受用这样的方式解决问题，这完全违反了监狱管理条例，结果犯人会吃大亏的，并答应导致死亡的原因会通过调查再做明确答覆，如此一番解说后，才把政治犯们劝回各自牢房。两天后，果然管教带著拉萨人民医院的两名医生，来说明拉巴次仁导致死亡的原因，一同来的还有法院和检察院的人。医生对政治犯代表讲：“我们亲自到色拉天葬台对死者尸体作了解剖检查，结果发现阑尾炎是导致他死亡的主要原因，况且发病已有很长一段时间了。”我们都很气愤地指责：“这是因为管教和医生不履行国家监狱政策，视犯人为草芥，对犯人未尽尽职尽责的表现，其不负责任的态度才导致了这一结局。”医生和法院检察院的人顿觉尴尬难驳质问，一个个默不吭声地退出了会议室。最后只剩下五队政治犯的

管教边觉一个人，他说这都怨医生没有及时检查发现，显然地他想把责任全推到医生身上。

事后的某一天管教把我从工地召回会议室，当天一位汉族记者专程到扎基监狱采访我。他只介绍自己是一名记者，并没有讲其他的，当即一边为我照相，一边很礼貌地问我最近生活和身体状况。我说我是一个年过六旬，大半生艰难熬在监狱的老囚能好到哪里去呢？多亏亲戚朋友从外面尽可能地给予了生活上的照顾，这才勉强可以应付监狱里的严厉改造，如果单靠监狱伙食我肯定熬不过这十年的刑期。监狱里除了礼拜天，都要强迫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但生活待遇极度糟糕，这可能是共产党惩罚犯人的一种方式吧。他问我改造方面有何感想，是否意识到从前的行为是错误的？我回答道，我是个自始至终为自己民族共同利益和前途鸣不平的人，从前每一个足迹都是围绕这个主题而留下的，并没有因为攀权附势而改变过自己的立场和信念，正因为这样，我的大半生便耗费在监狱里了。直到现在不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反而认为所迈出的每一步是正当的、理性的、十分值得。

大概是一九九一年夏季的某一天，监狱公务科的

次仁仁青科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异常热情地说：“我今天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照我说的做绝对有好处，自治区的次忠和杨有才二位领导不仅没有忘记你，前两天还特意问及你最近的改造表现呢，我说你现在表现很不错。现在只要你明确表态自己以前怀著西藏独立的陈旧思想而陷入了歧途，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然后发表在西藏日报上，或者直接接受电视采访也行，如此一来我敢保证次忠主席会亲自到监狱门口来接你，你未来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我一听就明白了这些人又想拿我做文章，我对他说，你的条件我办不到，如此一来我不成了信口雌黄、胡言乱语的人？明白事理的人岂不戳我的脊梁骨骂我是藏奸、骂我是小人？更何况自己为了信念，大半辈子付出的代价就这样付诸东流？他听到我的回答后脸色刷地一下子阴沉了下来，但没有发火，仍叫我再好好考虑考虑。半个月后又问我考虑的结果，我说衷心感谢政府和领导对我的关心，但领导关怀我的前提条件我仍然办不到。

一九九一年四月六日，驻华美国大使芮效俭为首的三名美国人来到了扎基监狱，他们当时把我叫到会议室询问了我的简历；前后坐牢的原因，原工作单位等情况。担任翻译的是一位汉族姑娘，至於她用英语是怎么

翻译的我不得而知。她把英语翻译成汉语再由马科长用藏语解释给我听，当时马科长是这么跟我说的：“喂！达瓦次仁你听著，这位美国先生叫你端正态度，诚恳地忏悔罪行，今后要认真改造，好好表现，听明白了吗？”我暗想美国大使怎么可能跟我说这些话呢，这完全是管教自己的口头禅嘛，我改造的好坏跟美国人有什么关系？不用费解这肯定是马科长自己的话，大半辈子跟他们打交道，我太了解他们了。但我只当是美国大使的原话，应诺，啦嗦，啦嗦！

当天，拉萨人洛桑丹增和甘丹僧人旦巴旺扎利用去医务所之机，早已准备了一张纸条悄悄递给了美国大使，不幸的是那位大使不及时塞入口袋傻乎乎地攥在手中，结果被那位女翻译发现后，很不客气地从他手中一把抢去，交给了次仁仁青科长。因此，他俩九号上午从工地被押回监狱关禁闭，随后4月27日下午，他俩和巴须加塔、旦巴平措、边巴共五人被拷上手铐，用卡车押送到扎莫监狱<sup>34</sup>去了。当天众政治犯虽然知道了他们五人要押解到别处的消息，但谁都不知道要移送何处等具体情况。因此，大伙非常担心他们的处境，有人对此提议要集体罢工，表示抗议，有人说应该冒险拦截以达

<sup>34</sup> 位於拉萨市东部尼洋河下游的林芝地区深谷中，那里是专门关押特级犯人的一座重刑监狱。

到阻止押解的目的。他们问我怎么办？说我们不能置若罔闻、默不吭声，要不横下心来蛮抗，要不就是有计划地文字抗议，无论采取何种办法，反正一定要行动起来提出抗议。我当时想无论采取何种抗议方式，其结局是难以预测的。我没有把握自己的一句话会对他们招致什么样的后果，一旦导致人命事件，他们的家属肯定会说宇鲁·达瓦次仁害死了他们，这很难担当。但是，若劝他们不可莽撞，应该从长计议，他们肯定会听不进去。因为，大家对毫无人性的管教已经恨透了，都在异常激愤似乎要拼命一搏的地步了。我在左右为难之下对他们说，这次怎么做全凭大家说了算，大伙说怎样做就怎么做，我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当天，我们收工回来时他们五人已经押走了。因此，五队所有政治犯全聚集在办公楼门口，对著管教次仁仁青呼喊著，要说明政治犯成员洛桑丹增等五人的下落。气急败坏的次仁仁青脸色发青、两眼通红地大声怒斥道：“你们凭什么质问他们的下落？你们这些不知好歹的反动东西太把自己当回事了，滚回去。”但政治犯们并不畏惧他的暴怒呵斥，纷纷跟他唇枪舌战抗议监狱当局虐待政治犯。次仁仁青发觉自己难以镇住阵势后，马上跑到总务室打电话调遣了一个连的武警。全副武装

的武警迅速赶来把我们团团围住，随即展开了攻击，枪砸、脚踢、猛打、暴揍，骤然间呼爹喊娘乱作一团，无力反抗的众犯像躲避发疯的恶狼似的纷纷逃回了各自牢房。随后又从牢房把我们一个个揪到办公室，军警合力毒打暴揍，办公室满地和桌椅，甚至在办公楼大门口的空地上到处都是五队政治犯的鲜血。最后，演变成了“四二七”镇压事件。至今，扎基监狱历史上，仍记忆犹新留下了当年对全体政治犯施暴惨案的罪恶一页。

身陷囹圄的政治犯们为民族共同利益遭受如此虐待之时，为何西藏的天神护法不能显示神通救护他们呢？难道护法也跑到共产党那边去了吗？人一旦陷入绝境无助到一定程度时，竟产生如此怨气和幻想也是正常的。几个月之后，冬季学习改造时的某一天，张建院长视察监狱来到了第五队，他一见到我瞪眼怒吼道：“喂！达瓦次仁，你这个养不熟的白眼狼，共产党如此看得起你，可你竟然还背叛国家，不要脸的狗东西，奸猾的老狐狸。从一九五九年起时时刻刻空想著西藏独立，结果怎么样？反倒自己变成了一个可怜兮兮的糟老头，你这叫做痴心妄想异想天开，懂吗？还自称所谓的喇嘛有什么能耐，有什么钻天入地的本事露出来让我们瞧瞧，天堂地狱在哪里谁看见过？你们尽会瞎吹这些蒙人

的鬼话……。”如此对我讥讽臭骂了半个多小时。从此犯人背后管他叫“老狐狸”，这反倒成了他自己的外号了。

一九九一年五月二十二日晚，被锁死的内院大门再度打开，狱警把我叫到了办公室，一排就坐的六七个管教当中的次仁仁青站起来对我说：“这两天你好像挺忙的嘛，告诉你不久是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十七条和平协议》四十周年纪念日，我们想为了庆祝这一纪念日叫你随便来一首歌舞或小品，无论你表演什么政府都会表示欢迎，你看怎么样？”我说自己在这方面不擅长，确实难于担当。他说：“解放后的发展变化总不能说不会讲吧？”我说，政府修路筑桥，建造电站医院学校等都是造福人民的好事，可我没有表演经验，临阵磨刀只会闹笑话。他见我不合作便发火了：“这样不行，那样也不行，推三阻四，说穿了心里不愿意是不是？叫你喊独立才会眉笑眼开一百个乐意，你这个自绝於人民，死不悔改的反革命分子，一辈子不会对党和人民做一件有用的事。”此事后来作罢，他们让我滚回去睡觉。

一九九三年年底，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纪念

日那天，各监狱指派犯人参观拉萨市特别布置的展览馆，我们队指派了我与袁桑次仁、阿旺仁青三人。参观过程中经管教同意，我接受了一名记者的采访，记者问我对毛泽东一生的功绩如何看待，我回答，毛泽东经过艰苦的革命斗争建立了共产革命政权，对汉族人民及其整个国家的命运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实事求是地说，他对藏民族制造巨大动荡，由於在西藏极端推行这一革命政权的错误政策，结果造成了史无前例的悲剧，上百万人直接或间接成为专政对象，遭受了惨死饿死或像我一样打入铁牢的悲惨命运。另外，西藏的数千年文化根基、历史文物、数千座寺院，毁於一旦。这一切根源应该说与毛泽东有直接关系。因此，我对他的评价是他对建立国家政权上有功不可没的一面，也有对待少数民族肆意祸害的一面。

返回监狱后，我在办公室召集的体会交流会上说出了同样的话，其他二人也跟我大同小异地谈了自己的认识体会。对此管教边觉说：“要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来总结毛泽东的功过，用偏执的观点进行评价是不正确的，批评纠正的同时不能抹煞其丰功伟绩，一般定论是七分功三分过，如此才是正确的评价。”

不久，从美国来访的夏查儿先生来参观扎基监狱时，特意在医务所接见了，他询问了我的年龄、籍贯、前后入狱原因等基本情况，我如实一一作了回答。但事后一两个犯人仅凭个人猜疑制造谣言，说我赞扬监狱生活，赞美共产党，说了不符合事实的谎言。这些话传到拉萨市民中间，引起了各种流言蜚语。其实犯人见外国人这是监狱特别关注的事情，少不了管教、翻译等四五个人监视陪同，绝对没有单独谈话的机会。我不可能当著他们的面，一改常态说出颠倒客观事实，有违良心的话，制造谣言的人无论居心何在，总该尊重我置个人安危和得失於不顾，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信仰，由此大半辈子蹲在了中共铁牢的这一事实吧？

某一天，监狱总务室扣押了一封从瑞士寄来的一封信，据说此信是通过扎基监狱的地址寄给我和洛桑丹增的，上面有我们的名字，还有回信用的邮票，但干部没有把信交给我们。所以不知道是谁寄来的。

### 二十三、三名老囚有幸获假释； 拜礼佛祖又见到生母

时值严寒冬季，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四日，大雪纷飞的礼拜五下午五点左右，本队管教把我和图登朗追、次旺大爷我们三名老囚突然唤到办公室，问我们在拉萨有没有亲戚，以及他们的地址。我们以为准许我们去探亲，并没有想到要释放。因为，我的刑期是十年，距离满期还有三年多时间，这期间又没有减刑过，所以，认为没有释放的可能。天黑之后狱方通知我们打包行李，换掉囚服穿上自己的衣服。我这才相信，今天他们将释放我们这三个老囚出狱。我们正打包换装时，狱友们拿了一瓶酥油茶，有些人还拿著哈达为我们贺喜，但被管教呵斥离开，只留下了茶。走出内院大门后，狱友们不顾喝斥，纷纷到大院与我们握手拥抱道别，随即我们被带到会议室，早有自治区司法厅的朗噶科长正在等著我们。他对我们说：“党和政府决定释放你们了，不过不是正式释放而是假释，所谓假释按照国家法律是对罪犯进行监外执行监视改造的一种措施，所以，你们目前依然是监控对象。你们每人对今天获得的假释有什么

感想？今后在社会上准备怎么做？当场写一份书面报告交上来。”我便写下今天获得假释心里特别高兴，今后在社会上保证不再犯事。朗噶科长看后说太简单了，要写详细一点。重写的第二份报告：我在党和政府以及上级领导的关怀下，我们今天获得了假释，对此表示由衷地感谢！今后在社会上一定谨慎做事，严格管理自己的行为。但朗噶科长说还是不行，太笼统了。於是写了第三份报告：感谢党中央、国务院以及司法机关的各位领导！在你们的关怀下，我们今天才获得了假释，得到了重归社会生活的机会，心里感到无比高兴。将来在社会上绝不再惹事生非，坚定地与大多数民众同走一条大道，与坏人坏事坚决划清界限。朗噶科长细细看了一遍仍觉不妥，不过他说实在写不好的话，那就只好如此凑数罢了。接著在座的几个领导中的一位站起来对我说：“由於宗教信仰是自由的，所以你身为一名仁波切，今后到寺院时应该规劝那些年轻僧人们要严格守戒，专心学佛，同时要进⾏爱国守法教育，任何人绝不能搞煽动教唆。”接著他对图登朗追说：“你以前是大昭寺的僧人，以后大昭寺的领导安排什么工作，你一定要努力完成。”此后，让我们单独在一间房子里待了两天，第三天连早饭还没来得及吃，就把我们带到办公楼

大门前的空地上，法院的人当著西藏电视台记者和部分领导的面，向我们宣读了决定假释的法律文件。法院的人再问我们重返社会后会不会把共产党多年进行的教育抛之脑后，继续顽固坚持以前的反动立场，或者从此放弃西藏独立的旧观点，争取新的前途和人生目标。我回答说，放弃西藏独立观点不是换掉旧衣服那样简单，不过我保证从此为了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的共同利益，我会跟大多数人民站在一起，绝不会做出有害社会秩序和人民利益的坏事，这一点请你们放心，谢谢！

假释后，离开警察虎视眈眈的长期监控，与前来接应的亲戚回到拉萨，据说图登朗追回到大昭寺后，寺院领导以没有名额为由把他赶出了寺院。虽然，政府官员明明许诺可以返回原寺，可是，结局还是言而无信将他扫地出门。这既令我们顿感失落又切齿愤恨，也因对社会和生存前途的绝望，而当初愿意和谐融入这个社会的热情顿时消失的无踪了，从心底对这个没有我们生存地位的社会既感到陌生，又有更多的怨恨。在绝望哀叹之余，忍气吞声地寻找栖息之所，变成了我们这些毕生精力投入在抗争上的政治犯们需要面对的残酷现实。

我与亲戚到大昭寺朝拜释迦牟尼佛，繁华而簇拥的巴廓街既有转经叩拜的虔诚信徒，更多的是五颜六色匆匆而过的人流，汉族、尤其是戴著白帽的回民更是人群的主流。从前熟悉的藏式房屋均已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汉式楼房，沿街两旁吆喝叫卖声，交杂著众多乞丐的乞讨声。我们跟著朝拜人群排的长队终於拜见了释迦牟尼佛，当时侍僧从坛位上给了我一条哈达和几个水果，当面见世尊法相时想起狱中难友，一时心潮起伏，不禁流下了泪水。随后朝拜莲花庙时，该庙侍僧安多隆多赠给我一尊莲花生尊者佛像，还献给我一条哈达。

当天心情特别舒畅，朝拜大昭寺之后再来到小昭寺朝拜世尊佛像后，上密院理事们给我敬哈达并招待了午饭，之后与自己的亲戚曲尼卓玛一同回到她的家。释放后的最大一件心事是尽快见到年迈的母亲。因此，第二天一大早租了一辆车子直奔老家朱茜。车子在柏油路上风驰电掣般地一眨眼就到了朱茜谷下游，在前面树林背后依稀可见的村庄就是朱茜村，车子瞬间把我送到了村子里。只见老母已经白发苍苍老态龙钟，行动也比从前迟缓了许多，她一见到我，紧紧抓住我的手，眼里禽满泪水，久久无法言语，稍后才问：“这几年真的到内地学习去了？”因为，亲属们怕老母承受不了，一直到

现在对她隐瞒了我坐牢的事，只说到内地学习。我擦去她脸上的眼泪，岔开话题与亲戚们彼此寒暄问候，他们随即打酥油茶、做饭，桌上摆满了丰盛午餐。

在家待了六天后便返回了拉萨，若赛社区区委书记群培把我叫去说：“你现在只是假释，所以平时的行动和言论要尤为谨慎，并且以后要去探亲时，应该请示社区委得到社区委员会的许可。”九月的降神节前夕，社区通知我不要出门有人将来找我。到了下午派出所约我去谈话，他们说：“国际佛教协会的一些人想见你，他们询问的任何问题，你要实事求是地回答，不能胡言乱语，同意吗？”我对他们说，由衷感谢国际佛教协会如此看得起我，但我不想见他们，因为说实话，有可能会得罪政府，结果自己又会遭殃；说假话又违背良心。所以，最好不见。可派出所的人说不见不行一定要去见，而且让我坐进他们车子的前坐，他们几人坐在后座直接开往拉萨饭店。客人们在饭店等著我们，见面后彼此问候寒暄，他们中间其中一位是法国人，一位是意大利人，还有另一位不知是哪国人。他们问我坐牢原因、刑期等问题，我一一作了回答，尤为关注地问我监狱里有没有宗教信仰自由？我说宗教信仰自由简直是奢谈，一旦发现经书、佛珠、达赖喇嘛法像，一律会没

收销毁，并遭到惩罚。又问我监狱伙食怎么样？我说政府拨给犯人每月三十五元人民币，但从中付给犯人的只有五元，其余的要抵消粮油柴等，甚至犯人自己种的蔬菜也要付钱。如果没有亲属从外面提供帮助，单靠监狱伙食我可能早已离开了人世。他们还问我，参加抗议政府的僧尼们从各自的寺院是自动离开的，还是政府赶走的？我说参加抗议的多数僧尼都是有相当佛学知识的人，因此，寺院没有开除的理由，确切地说寺院是在政府压力下，才把他们赶出寺院的。

我们离开饭店返回途中，派出所的一名汉族警察问我为什么不回寺院？我说我们一行人都已经从寺院请退了，所以，我也同样没法待在寺院里。他说：“你的问题我们可以出面交涉，你可以直接住进寺院。”我说同伙都请退了，唯独我一个人没有理由待下去。此后不久派出所又唤我到所里交代说：“你现在属于假释期，所以阶段性的思想状况，以及社会上的情况要定期前来登记汇报。”我说，自己没有任何值得回报的新思想。另外，自己是个不爱出门的人。所以，社会上的情况一概不知道，定期前来汇报只会是老生常谈，要不干脆再关回扎基一次性处理算了。对此他们没有什么反应，但后来派出所和社区保安还是频频来巡视，对此实在很烦

人。

一九九五年的藏历年即将来临时，我想返回朱茜老家跟老母一起好好过这个新年，由此向社区委请示批准后返回了故乡。藏历初一那天朱茜村所有村民身著节日盛装，端著切玛和青稞酒逐户拜年，祝福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祝愿老少健康幸福，札西德勒！初三的太阳刚从东山升起的时候，每户都在各自房顶煨桑敬神，祈祷四方神灵降福护佑，之后纷纷在房角插上了藏民族特色的五彩经旗。整村披上节日盛装一般，被迎风飘动的彩旗所笼罩，增添了富有鲜明特色的藏历新年气氛。转眼七天的假期即逝，我又返回了拉萨。

然而，我的母亲在这年去世了，与亲戚们共同料理了老母的后事。对自己恩比天高的母亲尽己所能地举行了所有法事和强烈的祷告。

当时自己迫於生存的处境下，不得已向哈达旅社提出了请求安排一份工作的申请。朱巴合作社根据我的情况安排了一份侍理佛像和佛堂的工作，每天有十元工资。这份工作对我再合适不过，既清閒又能从事佛事活动。就在此时，欧盟分会的一个代表团在哈达旅社会客

厅召见了，当时陪同的有社区书记兼合作社主任群培和外事及派出所的人，询问的话题依然是有关坐牢的情况。最后他们问我：“你有个亲戚在意大利，他要求我们替他向你表达慰问，你想不想前去探望他？”我说，我倒是很想去见这位多年失散的亲人，可中国政府不会让我出国的，我在此处遭受过常人难以承受的苦难，直到目前依然是监控对象，处境比坐牢稍微好一点而已。我们会晤的约定时间是十分钟，最后我用英语感谢他们特意来看我，以此作了道别。那时，我的户口问题虽然市委和宗教局开具了同意迁移若赛社区的证明，但巴廓街委员会书记旺堆多吉拒绝落户，他训斥我尽管人在社会上，但依然是罪犯身份，没有享受公民待遇的权利，事实上就是个罪犯。最终通过多方求情，好不容易冲破他的阻挠勉强落户了。

漫长岁月往事如流水  
历经酸甜人生坎坷路  
成就辉煌灿然此一生  
笔录式地无欺做表述

一生的各种经历如同备忘录能想到的事宜都大概

做了记述。再次要说明的是，在监狱期间遵照哲蚌洛色林的策瓦嘛呢仁波切教导，从下密院格西阿旺朗杰足前接受了《生圆次第论》初中上的要义口授，当然是避开其他犯人悄悄聆听的。当时他还对我说：“即便将来需要替汉人做事，也千万不能偏离秉持我所传授的造福众生的根本理念。”文革中期，上密院堪仁波切洛桑班登有一次悄悄对我讲：“至今你没有污蔑亵渎嘉瓦仁波切（达赖喇嘛），这是很了不起的。谁对自己的上师不敬，否则，结局将会很悲惨地堕入地狱的，你应该要继续坚持。”我一直牢记著这两位佛学大师的教诲，常反思西藏这一名词概念就像一棵树，尽管外表已经枝干叶枯无以为继，但它的根依然还在，并时刻蕴育著生机。由此觉得自己一生的付出，和一路血泪足迹都是有价值的，值得自豪的。

然而，我们用毕生精力所追求和期盼的，想转变西藏根本处境的真实目的，现在依然处於迷茫状态，依然无法预测何时才能实现。由此，身为藏人积极争取本民族的合法权益，与个人前途和切身利益有著直接的关系。本人在有生之年将会继续抗争，争取民族权益，继续不顾风险地向联合国、向国际组织、向全世界发出呼吁。

## 二十四、意欲为全球民众造福； 该关注弱势藏人处境

### 附录：宇鲁仁波切呈联合国的公开呼吁信

尊敬的联合国秘书长及其有关官员，您们好！

我今天不是从复杂的历史角度向您们陈述是非原由，而只是代表全体藏人呼吁联合国尽可能地予以体恤关注藏民族目前的高度危机和藏人不公的生存处境，冒失之处，请予谅解！

其实西藏问题提请联合国关注的呼声这不是首次，因此我这次呼吁也可能会石沉大海杳无回音。尽管如此，就因为您赋有神圣使命和无与伦比的声誉，扮演著其他任何国家和政府无法替代的角色。所以，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坚持正义立场，不受经济军事等势力的干扰，关注全球弱势群体的疾苦并秉持公正原则予以解

决，既是我们的殷切期盼，也是成立联合国的初衷和宪章原则。

就因为您赋有这一神圣使命，所以，西藏问题一天不解决，我们会天天呼吁，我们会坚持认为您不理睬藏人的呼吁是有违您的理念和声望的。至今藏人为了合理抗争付出过许多人的生命代价，与此同时，藏民族千年历史遗产及其难以估价的历史文物遭到了摧毁。尽管这些不是藏人在胡言乱语危言耸听，而是至今有活生生的证据可以证明的事实，但您有可能是慑於中国的淫威以及屈服於相关的利益，而在国际舞台上只字不提藏人呼声的做法，实在令势单力弱的藏人痛惜和遗憾。事实上这是对正在灭绝人类的一个优秀民族和优秀文化遗产，正在摧毁人类的一个独特自然环境的暴虐行径，孰视无睹坐视不管的行为，其结局将会成为人类历史演变中的一个难以挽回的罪过，会遭到后代们的强烈谴责。

中国共产党统治西藏以来为了在西藏巩固其政权，凭藉强大的军事实力镇压藏人的合理抗争，侮辱贬斥藏人的独特宗教文化和民俗习性，推行残酷的歧视性政策，剥夺藏人的宗教信仰自由、言论自由、行动自由。这些暴虐行径可以由全体藏人作证，尤其是已故和

健在的政治犯们更是活生生的人证。对此恳请您发挥自身独特的作用，不要只是考虑大国的利益或屈服第三者压力，多为弱势民族的危难处境著想。我翘首企盼著您，能以刚正不阿的姿态来匡扶正义，不负众望地履行自己维护公平正义的使命。

您可曾知道，您在担任联合国秘书长期间，我因为呼吁本民族权益被打入铁牢受尽了折磨，拉萨被军事戒严，许多同胞在残酷镇压中丧失了性命，遗憾的是我们没有看到您们的任何行动和反应。就目前而言，藏人的日常活动完全被桎梏在暴力压制之下，一旦对当局的骄横行径提出批评、披露、呼吁改正或进行抗议，一概视为反革命分子、危害国家安全分子、分裂主义分子或颠覆国家政权分子，不由分说地扣上各种罪名予以打击关押。包括我在内的成千上万的藏人尝试过这一暴政铁拳的滋味，目前还有上千藏人在西藏各地监狱里以这种罪名遭受折磨。

自中共佔领西藏至今，半个世纪的残酷岁月里，联合国不曾拯救过一个藏人的性命，没有拯救西藏文化和特殊环境的任何纪录。反而联合国颁发的人权宣言小

册恰恰成了中共司法机关对藏人指控罪名的证据，阅读传发这个小册会判处有期徒刑。比如，哲蚌僧人阿旺佩琼被判刑并关押在扎基监狱的判刑证据只是这个小册子，类似案例不胜枚举。这说明什么呢？作为安理会成员国之一的中国，自己签名颁发的人权宣言莫说是在全世界监督执行，就在自己本国尤其在西藏始终视为犯法的违禁刊物。仅此一点可以看出中共当局对藏政策的残酷性，藏人的人权状态处于何种状态。这种蛮横悖逆行为既是对联合国维护人权举措的极度蔑视，也把我等欲告无门的弱势民族逼向了绝望的深渊。

中共明目张胆地敢在西藏推行如此有计划的暴虐政策，首先是对公理的蔑视践踏，也是对全世界的有恃无恐，是联合国自始至终曲意求全藐视藏人呼声的恶果。导致西藏问题的既不是天灾等其他原因，而是中共侵略铁蹄踏入西藏国门，恃强剥夺西藏在历史上的独立地位和藏人自由造成的结局，是侵略、掠夺、压制、破坏等性质的问题。

尽管，西藏处境日益衰退越发令人堪忧，但藏民族坚忍不拔的毅力和凝聚力永远不会被摧垮，面对再艰险的处境藏人决不会放弃抗争自己地位的权利，这是藏

人的核心权益。因此，不管国际局势发生何种变化，藏人寄予联合国的希望永远不会放弃，寄予各国政府关注解决西藏问题的希望也永远不会放弃。

一直以来，中共当局极力掩盖在西藏推行的种种野蛮暴行，大张旗鼓地宣传西藏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何种巨大变化，藏人如何在自由享受幸福生活等等。利用这种夸张的政治宣传，企图转移世人的关注视线。其实藏人这么多年浴血抗争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机场铁路和修房筑路，这些表面环境的改造怎么可能体现藏人的幸福和自由呢？藏人所争取的是管理自己地方的真实权利，要改变目前日益被排挤、被边缘化的不公平处境，要拥有实实在在的社会地位和权益，要拥有主导本民族地区，并按自己意愿改造发展的权利。

由此，我今天提请联合国官员们，请求改变现在对西藏问题的认识立场，本著实事求是的态度成立专案调查小组对西藏展开实地调查，当然前提是要消除中共当局的阻挠，要保证调查对象的安全。如此一来，您们才会看到广大西藏人民的真实处境和愿望，半个世纪里藏民族的传统文化、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遭到毁灭的过程和恶果，以及刻不容缓的危机处境。到

## 宇鲁一生的奋斗足迹

---

时候您们能看到剥开宣传面具后中共真实的面孔，会让  
您们大吃一惊。谢谢！

谨此

顿拜！

宇鲁·达瓦次仁

於二000年三月十二日，圣地拉萨

## 二十五、极拥戴达赖喇嘛宗旨； 立字据禁止供奉‘道结’

贡唐仁波切曾开示：

外在如同声闻乘行显温和，  
内修境界定见瑜伽二次第，  
显密妙道无违相辅成益友，  
胜者洛桑佛（宗喀巴）之教法愿兴盛！

以上述揭颂作为诀窍，恭敬遵循，并在自己的日常宗教生活中极力得到实践。关键在行为上坚持的重要原则是，敬信三宝，安立因果报应，不信世间神祇。与此同时，如同所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些在整体生活中极力得到实践。

当今，西藏社会一些热爱本民族的有识之士对格鲁派内部是否能够同心同德，团结一致感到怀疑。也有人可能指出本人在保守思想影响下仍然供奉“道结”护法。诚然，这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以负责的态度，坚持正确的立场而为之。无疑，他

们的动机非常好。本人全心全意也同大多数民众所关心的方向一定能走到一起的，这就是我的真实本性，我相信也从这里我能够找到一条正确的路子，并对此充满乐观和信心。

无可争辩，从前我是一名供奉“道结”护法的人，并对此曾呈献过我的生命。然而，那是因年幼无知，不谙世事，忽视客观，是非不清的情况下，供奉“道结”护法，从而受到牵连的。

如今，在达赖喇嘛尊者的卓越领导下，懂得供奉“道结”对格鲁派教法危害极大。因而，第五世达赖喇嘛明确认定“道结”为邪愿厉鬼；赤钦·阿旺乔丹<sup>35</sup>等格鲁派高僧大德们曾严格禁止供奉它。同样，第十三世达赖喇嘛也禁止供奉“道结”。尊者达赖喇嘛（第十四世）经过多年对“道结”进行观察研究，再加根据上述这些宗师的授记等，从各方经过慎思明辨后，认为供奉它对西藏政教事业弊大于利。最后，断然决定禁止供奉“道结”。尊者对这方面做出的部分指示，有幸本人得到后经过认真阅读，结果这如同黑夜中的明灯，茅塞顿开，深受启发，从而使我毫不犹豫地弃暗投明。这

---

35 赤钦·阿旺乔丹（1677-1751）：西藏杰出的佛学家，格鲁派一代宗师，第五十四任甘丹赤巴，出生于安多宗喀，今青海省化隆县境内。

也是我人生中的一大转折点，是如何指定人生方向，或者说这似乎是如何对此生做出总结的重要环节。在这个问题上，要明确自己的立场不仅对此生，而且对下一位第六世宇鲁仁波切的前途和命运都有直接关系，事关重大。本人自放弃供奉“道结”后，不但与此撇清关系，而且在监狱多年的艰难岁月里同共患难的狱友为主的亲朋好友等面前宣称，本人遵循达赖喇嘛尊者的指示，放弃供奉“道结”，这已体现在自己的生活实践中，并认为这是一件值得感到自豪和鼓舞的大事。同时，本人放弃供奉“道结”的另一个原因是，如同佛陀教授：“比丘与智者，当善观吾语，如炼截磨金，信受非唯敬。”此偈陀铭记于心，古圣先贤之精神，晚辈所化得以发扬。希望对此要以认真，正确的态度，为符合佛教教义而做出了更大的努力。

本人曾经历唯物主义无神论社会和唯心主义有神论社会，在这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若建立实有的客观法理论，就要以正确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面对，认为它是建立这两个不同理论的重要基础。而且，这符合唯物主义，也符合佛教哲学理论，对此本人有了一定的信念。

以正确实事求是的原则基础上，尊者达赖喇嘛对供奉“道结”问题做出了明确严格的启示。从此，本人便彻底放弃了对“道结”的供奉和焚香祭祀。禁止供奉“道结”后别说本人因此遇到任何麻烦，甚至一丝恶梦都没有出现过。相信这离不开尊者达赖喇嘛的恩德和加持力。自此之后，立誓宇鲁仁波切的所有转世将不会再供奉“道结”，并开始付诸实施。但是，这里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我的立场只是本人不供奉“道结”而已，却不会对别人解说要不要供奉它。因为，这看来似乎在政治上对西藏内部的团结带来不利。这一问题此前曾对尊者也做了禀报。

如今人到晚年，除了与佛陀教法之外的无意义的琐事均被断除之外，在维护本民族尊严的基础上，高举正宗格鲁派大旗，继承和发扬宗喀巴大师创立的圣洁教法，为西藏政教事业不受蔑视，自始至终紧跟领导西藏人民的伟大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更加坚定不移满腔热忱地为西藏卫国利民事业发挥余热。

早在一九五九年，为了西藏的政教与民族大业而参加抗共战役。平时如同保护自己的眼球一样，所受持的比丘戒律，在拉萨小昭寺释迦牟尼佛足前按戒律仪

轨，依然选择了舍戒还俗。如今要舍弃与西藏政教对立的“道结”，这对本人来说是件区区小事，算不了什么，禁止它绝不含糊，并对此将会针锋相对的。以第五世达赖喇嘛为主的历代达赖喇嘛中，第十三世达赖喇嘛特别对本人恩重如山。故此，许多高僧大德都严厉禁止供奉“道结”，本人对此更由衷表示遵循。

另外，经历这么多年的牢狱艰难岁月，便养成一个习性，无论私事公事都会做得扎扎实实，有始有终，这也是我做人的原则。所以，今天我在总结自己的人生经历的同时，想说明从此生（称呼“伊黎”改为“宇鲁”）开始称宇鲁以来，为了使从前供奉“道结”的阴影不影响此后的历代宇鲁（仁波切），本人对“道结”的看法通过这本自传坦率地表达出来，希望西藏社会能够了解我的真实观点。或者也可以这么说，这是我在“道结”问题上迷途知返，悬崖勒马的证词。

如今，西藏政教事业面临危机存亡时刻，全体同胞应该要精忠团结，为卫国利民贡献力量。因供奉祸国殃民的厉鬼“道结”，反而投靠仇敌中共，把西藏政教大业推向火坑，把西藏民族推向苦海，从中获取中共提供的那微不足道的财物，或成为其政治工具，这实在太齷齪卑鄙了。坦率地说，本人根本不想见到这种人，甚至一听到这种人就从心底深处产生仇恨的情绪。也许这

是因为本人接近五十岁的岁月里饱受中共难于忍受的折磨所致；其二，在这漫长的岁月里，西藏许多铁骨铮铮的爱国人士在我眼前被中共逮捕监禁，血腥折磨，或者被屠杀等。在这里我作为这些英烈灵魂的证人，活在世人面前，见到这种人感觉会舒服吗？另外，知道西藏境内许多寺院和难以计数的珍贵文物被毁坏，其真正的黑手是中共。

在这种经历唯物主义者统治的艰难岁月里，本人在雪域留下的人生足迹无论现在和未来都无法抹去，更无法抹去的是我的尊严。如果我的言行与尊者达赖喇嘛的思想相违背，那么，我的大半人生在中共牢狱受尽难于忍受的折磨，这些都付诸东流，也显得毫无意义了。

根据上述所有经历，此生此世我的所有言行无论何时都没有违背过尊者达赖喇嘛的旨意，认为这便是此生的价值和意义。一九五九年，舍戒还俗，脱下袈裟，手持武器参加抗共战役的那一天开始，我的原则和人生目标是为卫国利民奉献一切。同时，本人对佛陀如云八万四千法蕴之教义作为行动基础，按西藏先贤赞普为政教事业指定的正确方向，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同时，在维护西藏民族的尊严和利益的基础上，由衷立誓，如同文殊拈主宗喀巴大师之发心宏愿，尽心竭力奉行不渝。这既是从前之誓言，也是今天的决心。

## 附加一 依据佛典词语； 提防弊端恶习

（以下是宇鲁·达瓦次仁仁波切于1985年在《西藏大众文艺》第二期发表有关西藏语言文化方面的文章）

多麦学者根敦曲陪先生所著的《白史》对有关西藏语言文字方面有这样的记载：“我们应该如何根据佛法专用名词和佛典用语那样，对整个西藏的语言文字也得到统一认识，如；一部佛教典籍上自阿里下至多麦，所有地区的藏人一般都能领会其意。”

另外，当今部分边地人对卫藏（拉萨）话和别名等，这些与字典和经典相结合的规范词语却随心所欲地用汉语来替代。这样，再过一段时期，无疑西藏通用的语文将被毁坏的支离破碎，面目全非。同外来语搀杂混合在一起讲，其结果各地区间便难于用藏语沟通，各讲各自的语言。语言变异会影响行为，最终导致西藏民族和国土四分五裂。

如果这种不伦不类的新言语流行全藏区，届时浩

如烟海的佛教经典谁都难于读懂，最后必定会成为无用的东西。所以，人人都要提防这种弊端恶习。

各位有识之士！我们具有如此优秀的语言文化，却以藏语不够用的心态去使用其他民族的语言，与藏语掺杂在一起讲，这种现象随处可见，如；明明知道言者和听者皆为藏人，可是，言者在讲藏语过程中掺加汉语，还自以为是，毫无自知之明地显示自己有学问有能力的样子。这种行为实在太可笑了，其实这是对自己优秀文化的一种轻视和亵渎。所以，请大家还是谨慎为妙。

## 附加二 对患难之交留遗书； 竟坐化四日便圆寂

这位大师被释放后，撰写完成历经七十七年的人生自传，并亲自把自传稿件全寄给西藏境外，使之这位大师毕生的丰功伟绩不只是停留在人们的口头传说，而今天显豁地出现在文字出版的传记里，并呈献在广大读者面前，足以成为一本纯洁而大义凛然的爱国英雄史册。

这里宇鲁仁波切在临终前对患难狱友有何嘱托，以及在举行遗体火化仪式等过程中发生哪些出乎意外之事，均有这位大师的患难狱友，原甘丹寺僧人嘉玛·达瓦索朗于2005年流亡印度后，从头到尾，原原本本地讲述给本书编辑后，附加到这本自传结尾。

嘉玛·达瓦索朗被释放后，因从前他与宇鲁仁波切交往甚深，可谓同生死共患难的刎颈之交。宇鲁仁波切贵体欠安直至圆寂，达瓦索朗一直都在他身边，这期间仁波切心智很敏锐地再三讲述了有关西藏近代史中，第五世达赖喇嘛对西藏政教事业建立的丰功伟绩等

史记。临终前，仁波切还把自己先后储存下来的薪金共九万四千元人民币，分别做出安排，并供养以下寺院，以及需要办理的一些其他事宜等一同做出了手记，最后托付给达瓦索朗了。

对上密院供养二万元人民币；三大寺分别供养五千元人民币；墨竹仁钦林寺院供养一万元人民币；迪庆密宗寺供养一万元人民币；噶日寺供养五千元人民币；曲桑寺供养五千元人民币；达仓日瓦堆寺院供养三千元人民币；觉摩隆寺供养二千元人民币；下密院供养八千元人民币；印度甘丹寺供养一万元人民币；登卡寺供养一千元人民币。

上述所有事宜均圆满完成后，这位大师于藏历第十七绕雄铁蛇2127年12月3日，星期三，公元二零零二年元月十六日，伴随着神奇征兆安然离世，并坐化<sup>36</sup>四日。

大师圆寂后，遗体准备运往甘丹寺按佛教仪轨进行火化。举行火化仪式时日等相关事宜都得到确定后，达瓦索朗到甘丹寺，请求该寺僧众前来参加遗体告别仪

---

36 坐化是佛教用语，谓修行有素的人，端坐安然而命终。也就是佛教徒修行达到某一境界的展现，亦称坐脱立亡。

式。当然，得到僧众的承诺，并在同一天由达瓦索朗在该寺几位僧友的帮助下，在附近古巴日山顶搭建了焚化灶台，为来日举行遗体火化仪式准备完所有相关事宜后，当晚便急忙返回拉萨，又招募了几名举行遗体火化仪式时的帮手。

公元2002年元月21日，藏历12月8日早晨，达瓦索朗和六名狱友、色拉寺四名僧人、逝者生前的三位拉萨老同乡和两位出家胞弟等，凌晨四点一同将遗体从家园运到拉萨八廓街。呼出意料的是，在那里早已恭候的民众，人人含泪，口诵祈愿经，有的手持哈达，有的手持供灯，还有的手持熏香，为这位毕生献给西藏政教和民族事业的杰出爱国大师做最后告别。看到此景此情，达瓦索朗等心潮澎湃，百感交集，内心久久无法平静。

遗体在大昭寺广场用车运往甘丹寺。抵达甘丹寺后，日前准备的所有事宜已发生超乎意料的变异，甘丹寺驻寺中共干部小组对该寺下达强制命令，所有僧侣不准参加宇鲁·达瓦次仁遗体告别和火化仪式。

最后无奈之下，达瓦索朗和六名狱友、色拉寺四名僧人、逝者生前的三位拉萨老同乡和两位出家胞弟

等，在甘丹尼荣山口对亡灵举行祭祀后，遗体运往古巴日山顶。那天，在举行火化仪式时，对在场的人感到意外和震惊的事又发生了，甘丹寺主任南捷大师不顾驻寺中共干部的监视和威胁，暗中派遣两位诵经师和他的两名弟子到山顶，代表甘丹寺来送别这位杰出的爱国大师最后一程。此时此刻，达瓦索朗等在场的所有人士对这一出乎意料之事，万分感动。无论如何，遗体火化仪式还是这样井然有序地开始了。

第二天，火化后的骨灰带到拉萨，着手准备建造安置骨灰的银塔。不久银塔建造亦竣工。

2002年4月22日，藏历3月9日，宇鲁仁波切之银制灵骨塔迎请甘丹寺……







Handwritten text in Chinese characters, likely a diary or journal entry, written on aged paper. The text is dense and covers most of the page.

1941年12月12日 星期日 晴  
上午九时 乘火车由平遥赴太原  
下午二时 乘火车由太原赴临汾  
下午六时 乘火车由临汾赴侯马  
下午九时 乘火车由侯马赴运城  
下午十二时 乘火车由运城赴三门峡  
下午三时 乘火车由三门峡赴洛阳  
下午六时 乘火车由洛阳赴郑州  
下午九时 乘火车由郑州赴徐州  
下午十二时 乘火车由徐州赴蚌埠  
下午三时 乘火车由蚌埠赴南京  
下午六时 乘火车由南京赴上海  
下午九时 乘火车由上海赴香港  
下午十二时 乘火车由香港赴广州  
下午三时 乘火车由广州赴海口  
下午六时 乘火车由海口赴三亚  
下午九时 乘火车由三亚赴海口  
下午十二时 乘火车由海口赴广州  
下午三时 乘火车由广州赴香港  
下午六时 乘火车由香港赴上海  
下午九时 乘火车由上海赴南京  
下午十二时 乘火车由南京赴蚌埠  
下午三时 乘火车由蚌埠赴徐州  
下午六时 乘火车由徐州赴郑州  
下午九时 乘火车由郑州赴洛阳  
下午十二时 乘火车由洛阳赴三门峡  
下午三时 乘火车由三门峡赴运城  
下午六时 乘火车由运城赴临汾  
下午九时 乘火车由临汾赴太原  
下午十二时 乘火车由太原赴平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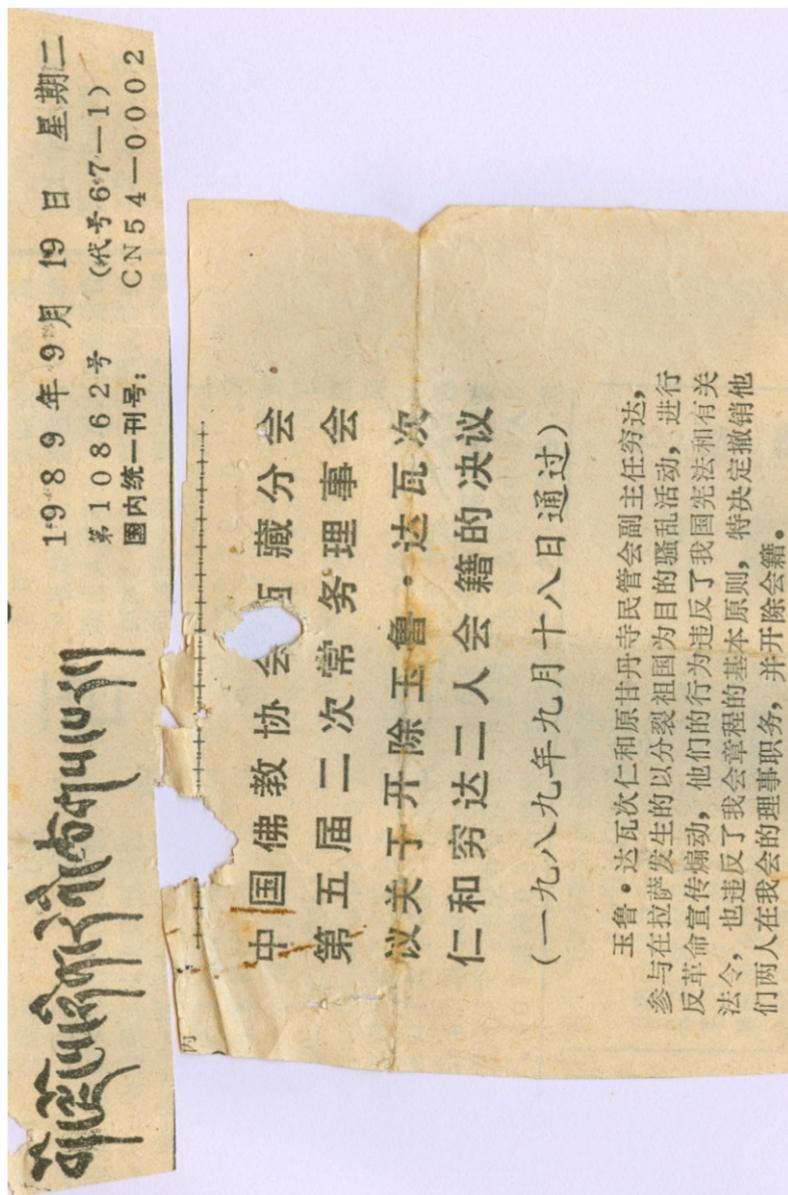












## 雨洛·达娃次仁等四名 罪犯依法获假释及减刑释放

**本报讯** 11月6日，正在扎基监狱服刑改造的罪犯雨洛·达娃次仁、土登朗珠、次旺班丹和穷达依法获假释及减刑释放。

雨洛·达娃次仁、土登朗珠、次旺班丹三人在服刑期间能认罪服法，有悔改表现，并能服从管理。穷达在服刑期间基本认罪、表现较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71条、72条的规定和“坦白从宽”、“给出路”的政策，监狱管理机构报请法院核准，依法给予雨洛·达娃次仁、土登朗珠、次旺班丹和穷达四人假释、减刑释放。

雨洛·达娃次仁等四人表示：对政府的宽大释放表示感谢，回归社会后，要拥护共产党，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公民。

(陈大荣 杨辉平)

宇鲁达瓦次仁仁波切





年轻时期的宇鲁仁波切





